

# 燃灯者（增补版）



越胜带着那段异常的历史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是个险恶的时代，唯因此，友情来得特别真，特别重，那是个贫苦的时代，倒仿佛因此，人不得不有点儿精神。越胜心里，这段历史浓重得排解不开，唯在这种历史感的簇拥下，他笔下的人物才那样饱满。

——陈嘉映

无声者的声音，自觉者的觉悟，主音外的雅歌

中国文史出版社



北大周辅成

## 版权信息

书 名：燃 灯 者（增补版）

作 者：赵越胜

出 版 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4

版 次：1

ISBN：9787503474712

定 价：42.00

装 帧：精装

开 本：32 开

纸 张：胶版纸

页 数：288 页

字 数：200 千字

责任编辑：金 硕

本书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 目录

|                         |     |
|-------------------------|-----|
| 《燃灯者》(增补版) 序.....       | 7   |
| 《燃灯者》(增补版) 自序 .....     | 11  |
| 辅成先生.....               | 17  |
| 一 .....                 | 18  |
| 二 .....                 | 22  |
| 三 .....                 | 32  |
| 四 .....                 | 41  |
| 五 .....                 | 57  |
| 六 .....                 | 64  |
| 七 .....                 | 71  |
| 八 .....                 | 78  |
| 九 .....                 | 91  |
| 十 .....                 | 101 |
| 十一 .....                | 112 |
| 十二 .....                | 123 |
| 后记 .....                | 139 |
| 聊与梅花分夜永 ——辅成先生百年祭 ..... | 144 |

|                            |            |
|----------------------------|------------|
| <b>读神与缺席——为志扬文集而作.....</b> | <b>163</b> |
| 一 .....                    | 164        |
| 二 .....                    | 168        |
| 三 .....                    | 170        |
| 四 .....                    | 174        |
| 五 .....                    | 180        |
| 六 .....                    | 184        |
| 七 .....                    | 187        |
| 八 .....                    | 192        |
| 尾声 .....                   | 199        |
| <b>若有人兮山之阿 .....</b>       | <b>202</b> |
| 关于顾圣婴与友人通信（一） .....        | 202        |
| 关于顾圣婴与友人通信（二） .....        | 219        |
| <b>骊歌清酒忆旧时 .....</b>       | <b>237</b> |
| 一 .....                    | 237        |
| 二 .....                    | 245        |
| 三 .....                    | 251        |
| 四 .....                    | 255        |
| 五 .....                    | 259        |
| 六 .....                    | 263        |
| 七 .....                    | 269        |
| 八 .....                    | 273        |

|                 |     |
|-----------------|-----|
| 附录 读《燃灯者》 ..... | 279 |
|-----------------|-----|

# 《燃灯者》（增补版）序

周国平

越胜平生最爱有四，曰音乐、书、政治、朋友。把政治列在其中，实在勉强得很，他不过是作为一个草民，只在也只想在台下喊几声罢了。朋友聚在一起，他常慷慨评点时局，疾恶如仇。他真正所爱的是正义，但正义乃一抽象名词，和其余具体名词并列未免抵牾，我只好政治一词代替。

其实，音乐和书两样，他也只想在台下。音乐不用说，不管发烧友到什么级别，明摆着今生不会做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了。书这一样有点奇怪，他嗜书如命，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却总是十二分地抵触出书，写了文章传给朋友一读，就此了事，从不肯结集出版。在所爱的四样中，他好像认定

自己的位置是第四样，做音乐的朋友、书的朋友、正义的朋友，在前三样上都无意登台亮相。

若干年前，在朋友们鼓动下，他终于同意把正在传阅的几篇文章结集出版，那便是初版的《燃灯者》。我为此甚感惊喜，这个倔头终于让了一步。现在的新版，内容做了调整，共五篇文章，除一篇外都是写朋友的，同时又通过写朋友写了音乐、书、正义。其中，周辅成点燃了他对书和正义的爱，唐克点燃了他对音乐的爱。由这些文章，我们看到的既是他对朋友的赤忱之情，也是他精神生长的心路历程。

在所写的人物中，我和周辅成先生略有交往。1995 年，先生到巴黎，我也在那里，同住越胜家中。1997 年和 2000 年，我先后两次随张雪到朗润园拜访先生。2005 年，先生出面息讼，我应召去见先生一次。在先生家里，先生拿出我的书，赞誉有加，我当即惭愧万分。我出了一些通俗的书，没有多少学问，一直不敢献丑，怎么想得到先生自己买了，还仔细读了。先生对我厚爱，但在息讼一事上，我拂了他的好意，令他伤悲，我深感歉疚又无奈。先生每次谈话，声如洪钟，激情澎湃，正气凛然，哪里像一个耄耋老人。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在先生的血管里流着的始终是年轻人的热血。

先生是热情的，也是寂寞的。最后一次见面，先生赠我



一册书，竟是一个打印的文集，我心中一痛。参加先生的追悼会，看到的场景相当冷清，我心中又一痛。晚年之作无一家出版社肯出，追悼会无一个北大官员肯到场，先生真是寂寞极了。可是，在这样一个只爱金钱和权力的时代，爱智慧和正义如先生，寂寞就是必然的了，这正是先生的光荣。

哲人已逝，读了书中《辅成先生》一文，方知我对先生了解得太少太浅。文中引述的先生许多话，何等睿智，何等痛快。我本来是可以有许多亲聆教诲的机会的，却因为疏懒而错失了。

在增补的文章中，有越胜为张志扬文集写的序，其实仍是借作序写人。志扬也是我的老朋友，而我们的结识也是通过越胜。1983年末的某日，越胜兴冲冲给我看一篇文章，是读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的感想，署名墨哲兰。后来知道，这是志扬的笔名。文章完全不像一篇读后感，倒像是一颗积聚了巨大能量的炸弹，你能感受到一种备受压抑的汹涌激情，因此文字很不顺畅却有异样的冲击力。我看了技痒，越胜嘱我回应一篇《月亮和六便士》的读后感，于是我写了《人性、爱情和天才》。这差不多是我写散文的开始，志扬一定想不到，我是受了他的刺激才开始写散文的。其后在不同场合和志扬见面，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沉默和温和，他仿佛生活在一个自己的精神城堡里，他人难以进入，沉默是他的防卫，温和是

他的致歉。

自初版以来，越胜的这本书广受赞誉，已被视为记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代知识分子交往的经典之作。所以，最后我想对越胜说：既然你已经开了一个头，索性就继续下去，从此在出书一事上不要太倔了。我的无私的理由是，好文章就应该让更多的人读到，你不能只给我们这几个老朋友吃偏灶，而对许多你不认识的文化美食家的精神饥饿无动于衷。我的自私的理由是，你的清高给了我们这些文章不如你却挺乐意出书的人很大压力，使我们觉得自己像是俗物似的。再那么倔，于义于情都说不过去吧？

## 《燃灯者》（增补版）自序

燃灯人，当你手摩我顶，静似奔雷，一只蝴蝶正为我，  
预示一个石头也会开花的世纪。

——周梦蝶

《燃灯者》初刊已愈四载。书出版后，有许多朋友喜欢。大家向往我在书中纪录的老一代学人的风范，感叹追怀他们远去的背影。以此知中华文脉未绝，三千年衣冠风物，不会泯灭于几十年风卷沙埋。

此次续编问世，补入《骊歌清酒忆旧时》《若有人兮山之

阿》《渎神与缺席》三篇，都事涉五十年前那场浩劫的记忆。我在整理这些篇什时，汉娜·阿伦特的名著《黑暗时代的人们》常常浮现心中。我极爱书中的这段话：“人性原本有它自然的生长。但在遭受迫害的强力下，受害者会彼此接近，使他们之间的距离完全消失。从而产生一种温暖的人际关系……如果这种关系能顺利发展，它会培育出一种稀有的仁厚和至善。它是生命里的源泉，只要活着，就有欢乐。”我们这些经历过黑暗的人，确实体会过人性的坚韧。唐克兄弟在革命喧嚣中的琴声，志扬兄弟在单身牢房中的思考，顾圣婴“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决绝，都如深埋灰烬的炭火，明亮灼热。日月不夺燭火之明，无数微弱的生命之火，亦将照亮弥天黑暗。

最初我讲述燃灯者的故事，并没有想把它公之于世，那是一次私人写作，为把那些瑰宝留给自己。周先生教诲我三十多年，志扬与我三十年彼此砥砺，唐克唤醒少年心中的渴望……都让我心存一份感恩。正如史怀哲所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深深感谢那些燃起火焰的人。我们受其所赐，就应向赐予者表述我们的深谢之情”。

书中记述的都是寂寞之人。或大隐于市，或身后寂寞。但寂寞本是哲人常态，知识人的本份，艺术至深的境界，幻想者的归宿。《燃灯者》初版曾有幸获南方报系 2012 年度散

文大奖。在获奖感言中，我曾对燃灯者的寂寞有如下思考：

班达用 *clerc* 而非 *intellectuel* 来命名他的名著《知识人的背叛》，因为 *clerc* 一词的本意是守护神圣秩序之人，在中世纪被用来称呼神职人员。在我看来，这个神圣的秩序就是人类的终极关怀和普适价值，不管它是来自神恩还是自然法的规定。这个词近于我们先人典籍中的“士”，经典儒学中的士是大道的守卫与传播者，士“志于道”，士“从道不从君”。班达所论的这类知识人，应该执着于不计功利的精神追求，言说更高价值的存在，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评鹭世界的狂乱，断称“我的王国不在此世”。

这个“不在”绝非冷漠放任、寄意旷远，而只是不把思考的疆域囿于某个“现在”，因为或许这个当下此时已丧失了存在的必然性，无论其外表多么煊赫，它也只是横亘于空间，持存于时间。这类知识人所言说的东西，虽不囿于“此世”，却更深地植于人类存在的厚壤。他们像抓紧海底礁岩的锚，一任海面波涛汹涌。他们的职责是持守，他们的武器是语言，他们的境遇是寂寞。

这寂寞的言说却有它无尚的尊严，君王威权欲以势相夺，知识人却借天地之声一叩洪钟，使寂寞发为大音。唐雎一士之怒，以“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力抗秦王，反

至未来的始皇帝“长跪而谢”。彭皮尼骄傲地告诉凯撒，您可以给人民以公民权，却不能给人民语词。这堂堂正声捍卫着精神和语言的尊严。

语言也会经历厄运。人一旦为奴，心便遭桎梏。朗吉努斯早告诉我们“奴隶偶或有其他才能，但奴隶却没有一人能成为演讲家”，因为“辩才的源泉是自由”。不过，我们仍能眼见无数词语堆砌着，无数印刷品流布着，无数聒噪震响着，但这些只是语言的躯壳，言说的精魂早已流离失所。言说不再是心灵交流的工具，思想自由的载体，爱与美的表述，而成为隐蔽的暴力，以威权的蛮横和说教的空洞遮蔽了人的本真生存。这诉诸暴力和虚假的语言，只适宜培养奴才，也只适宜奴才使用。奴才的语言没有尊严，它靠卖弄耻辱获取快感，以俳优的谄笑博取权势的赏识，一有机会，它们便会把民族连同它的语言一并拖入深渊。

中华先人素有对文字的崇敬，《文心雕龙》开首就是“文之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径直把文看作与天地同生共体。回首先秦诸子的雄辩，大汉赋者的壮阔，魏晋名士的飘逸，盛唐诗家的浑涵，两宋词人的旖旎……，数千年中华民族的精神多存于这些灿烂的文字，是华语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盛衰荣辱。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学习语言，像手指之于键盘，步履之于薄冰。心灵感受音乐，手指让钢琴鸣唱，理

智知道危险，感觉却寻找立足。在此学习中，我们常涉足贫瘠之所，荒原上会站满欢呼的人群。贫乏的心灵觉不出贫瘠的语言，壅塞于途的闲言、高台之上的喧哗，往往会被视作丰裕的明见。终于，轻肥的言语遮蔽起苦寻的真知，像波舒哀所言“我想给你们的肉体创造其精神，谁知你们连精神都充满肉欲”。

让肉体焕发出精神，这是教化的责任。苏格拉底视为终身任务。教化必需启蒙，点亮灯，让光投射到远处。所以康德说“教育便是面向未来”，他指出，我们首先要有善好的观念，然后让受教者相信，尽管困难重重，这个善好是可以实现的。他问道“如果现实社会中人人撒谎，诚实就只是幻想吗”？燃灯者们恰恰在此，以自己的学识，修为，友谊和献身精神，实践着教人趋向善好的活动。在士林凋残、斯文扫地的年代，他们高贵的人格便是那盏放在灯台上的灯，“照亮了一家人”。因为他们，我们才不至陷入只见人群不见人物的空虚。因为他们，我们才不至在黑暗的荒原上载歌载舞。诗人朱赢吟咏道，“你点亮了灯，我才开始恐惧黑暗”。我想接着说，正因为体会到此一恐惧，我们才奋起争取光亮。

2016 年复活节于巴黎





# 辅成先生

美德都是庄严宏大的。

庄严，在实质上与慷慨一致，

在形式上与勇敢一致。

——托马斯·阿奎那

我受教于辅成先生始自一九七五年底。当时我是北京“小三线”兵工厂一个开磨床的小青工，整天猫在怀柔深山沟里。而辅成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我与先生天南海北，两不搭界，怎么会有了师生缘分？其中故事要从头讲起。

—

一九七五年六月底的一个早晨，车间书记戴五正师傅到车间来，悄悄告诉我，昨天厂里接到通知，今年有一个去北大哲学系读书的名额。我一听，心直跳，这正是我朝思暮想的事啊。戴师傅说，碰到几个厂里中层干部，都说，肯定是你们车间小赵去了。20 世纪七十年代初，毛泽东指示“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各个单位闻风而动，纷纷成立“工人理论队伍”。

随后就有六本书的书单：《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还有《共产党宣言》。我是车间工人理论小组组长，负责给师傅们辅导这些马列著作。六本书中《反杜林论》和《唯批》是哲学著作，在那些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工人师傅看来，这些纯粹是天书。但是理论学习的形式绝不能缺。于是每周都有半天经典著作学习时间。我在台上讲，师傅们在台下睡，真可谓“聒噪与鼾声齐飞，唾沫与涎水同

流”。也有几位从五机部机关下放到厂里的干部，文化程度比较高，有兴趣听我的辅导，常常给点儿鼓励。所以说起要送人去北大上学，便想到了我。

经过一个多月的基层推荐，领导讨论，最后的结果是我“名落孙山”。找戴师傅问究竟，他同情地告诉我，在我的人事档案中，有记大过一次的处分，所以政审没通过。

这事得从前一年夏天说起。

工厂宿舍对面山崖下有一深潭，潭水清冽，是个游泳的好去处。酷夏午休时，我们常在潭中嬉水。厂里的小兄弟都是北京来的七〇届初中毕业生，自小穿惯三角泳裤，到山里依然如故。山村里的农民小伙下河都穿及膝大裤衩，三角泳裤在他们眼里等于赤身裸体。偶有村儿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从旁经过，我们这些人就有了调戏的嫌疑。那天中午，厂里的弟兄们又去游泳，有几个村儿里的小伙儿就站在河边骂。我正躺在岸上晒太阳，听他们用怀柔土话骂得有趣，便学着他们的腔调和水里的哥们儿开玩笑。大家嬉笑一阵，谁也没当回事儿。

下午上班时，我刚走到厂门口的水泥桥上，路旁猛冲出几条壮汉，扭住我双臂，大喊：“就是他，学俺们农民，带队部去！”边喊边扭着我往村里走，当头便碰上了来上班的众弟

兄，拦住问究竟，言语冲突间便动起手来。村儿里的小伙儿固然身强力壮，但不如工厂的弟兄身手敏捷，交手片刻，已见有三两农民倒地不起。在壮汉的夹持下，我挣扎着抬起头，见“发小”嘉浩正从山坡上飞奔过来，身边又钻出小个子李志刚，上手推胸，下脚使绊，扭着我胳膊的壮硕青年便跌入河中。厂头儿跑出来劝阻，但人仍越聚越多，混战一团。大约半个小时战斗结束，有几个农民弟兄不知被何人下狠手，板儿砖拍昏，急送怀柔县医院。

这下子事闹大了。沙峪公社报怀柔县，怀柔县报北京市，定性为“破坏工农联盟的集体斗殴事件”，市委责成市机械局严肃处理。于是召开全厂大会，厂长高凤岐宣布给我“记大过”的处分。我不服气，找厂长理论，高厂长一席话让我哑口无言：“厂里给受伤的农民赔偿，轻伤 800 块，重伤 1600，你赔得起吗？”结果档案中就装进了记大过处分书，从此成了个“底儿潮”的人。这次推荐上大学，档案就发挥了威力。知道政审没通过，我彻底绝望。在中国，档案就是一个人的命根儿啊。想想今生怕是再无出头之日，心里郁闷到极点。

盛夏时节，山中雨水充沛，林木绿色逼人，冬天干枯的溪流又喧腾起来。河道曲折处，水石相激，静夜远闻，隐隐若有歌吟。年轻时人不经事儿，心情苦闷便意志消沉，坚持多年的读书计划也停顿了，常与好友瓦宁携薯干酒半瓶、鱼

皮豆一包、手风琴一架，徜徉林下溪畔，抚琴放歌。一次，薄暮时分，俩人高卧青石之上唱得正酣，忽见一条两尺青蛇窜出密草，随琴声婀娜起舞。不知几次夜半扶醉而归，戴师傅严斥我放浪形骸。但我仍不知歧路而返。

九月初，弟兄们见我终日闷闷，便提议去登慕田峪长城散散心。清晨出发，踏着朝露，沿崎岖小径登山。道旁杂花缭乱，野香醉人。秋梨、山楂、苹果，艳黄、殷红、青紫相间，织成满眼的斑斓。一行人穿行林中，手脚并用攀岩，中午时分，古长城已在脚下。三十几年前的慕田峪还不是旅游点，古城墙大半坍塌毁损，一身岁月的苍凉，静卧在褐榻翠衾之间。登山顶烽火台眺望，远天紫纱轻幔，若沧海浩渺。峰峦间雾霭纠缠，如群岛隐没波涛间。长城随之起伏，分割关山一线。

京畿一带本是古幽燕之地，想陈子昂登台“念天地之悠悠”处就在近旁。在这天地雄阔浑涵之间，我身心如经大涤，止不住鼻酸眼涩。前几日尚觉性命攸关的失败，今日看来，不过鸡零狗碎。世界何其美好，人生何其诱人，少年心事岂能囿于尺寸得失。于是，向群山顶礼，欣然下山归去。

回到厂里已是晚饭时分，戴师傅急匆匆地在食堂找我，把我拉出买饭的队列，说有好事。厂里又有一个上学的名额，

市机械局要办一个专职哲学进修班，老师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这次不用再讨论，就让你去，你小子可别给我丢脸。我喜出望外，忙不迭地谢他，随后窜出食堂去找我的小弟们。当晚大家把这个月的菜票全凑出来买了散装啤酒，狂饮一场。月底把全部家当扔上一辆“大解放”，我一路烟尘地回到了北京。

## 二

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上午十点，一群来自北京市机械局各个工厂的“理论骨干”集合在德胜门城楼下，一辆大轿车把我们送到清河镇小营原北京市机械学校。我们的哲学进修班就办在这里。全班约四十余人，年纪最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大概就是我了。由于我们都来自工人阶级队伍，学校便没安排学工、学农、学军等活动，只是读书。课程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自然辩证法、中国

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经典著作选读。学习时间安排得很满，大课后分组讨论，也有单独的阅读时间，可以静心读书。

一九七五年，社会政治气氛紧张，清河小营倒真成了世外桃源。学校周围是大片农田，晚饭后，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总要漫步绿野，谈古论今。班里同学大都根红苗正，属于热爱毛主席、“志壮坚信马列”的一族。我们几个人就稍显异类，常品评时政、交流消息、关注上层异动。青年人说话口无遮拦，一次散步时，大谷放言，“《人民日报》上登的东西，百分之八十是假的”，此言竟被人告发，甚至成立专案组，调查我们这个“小集团”。

按照课程安排，十一月份要开西方哲学史课了。教马列基本原理的陈楚余老师说，西哲史要由北京大学的“权威”来讲。说起“权威”，就让人联想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我却偏对这类人有好感，觉得既是“学术权威”，不管是什么阶级的，必定是有学问的人。

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我们经典选读课的重点。后来知道真弄哲学的人，没人拿这书当严肃的哲学著作，在当时却被奉为经典。无论如何，这部书毕竟涉及身心关系、时空概念、意识与知觉、认识与存在等哲学基本概念，所以总想把它读通。何况列宁在批判波格丹诺夫、马赫、

贝克莱时，涉及了西方哲学史的重要范畴。顺藤摸瓜，也会探到有价值的知识。比如在讨论先验论时，必然牵涉到康德。我那时正死啃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的译文佶屈聱牙，读来读去不得门径，总觉如坠雾中。听说有“权威”来给我们上课，心中就有企盼。

十一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班主任韩老师走进教室，很郑重地告诉大家，今天西方哲学史开课，请北京大学周辅成同志给大家上课。片刻，进来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先生。他就是中国伦理学界的泰山人物，北大哲学系的周辅成教授，那时公开场合都称“同志”。

先生中等身材，微胖，身着一件四兜蓝制服棉袄，已洗褪了色儿，有点儿发白。脚穿五眼灯芯绒黑棉鞋，头戴一顶深棕色栽绒双耳棉帽，步履轻捷，无丝毫老态。先生走上讲坛，摘下棉帽放在讲台上，露出短发皆白。白发不甚伏贴，有几簇支立着，先生也不去管它。我好奇，以往心目中的“权威”，大半和“高帽儿”、“挂牌”、“喷气式”有关，但见眼前这位老人温文尔雅，便仔细观察。先生长圆脸，肤白皙，丰颊阔额，眉间开，目光澄澈，鼻梁高，鼻尖略收，唇稍厚，下颌浑圆，表情开朗安详。

先生开口讲话，普通话中有川音，说受学校领导委派，



来向工人师傅汇报学习心得。又说马恩和列宁本人都精通西方哲学史，所以要学好马列原著非有西哲史知识不可。几句简略的应景话讲过之后，先生从一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中拿出一黄旧的厚本子，里面密密地夹着一些纸条。

先生打开本子，转身开始板书——古希腊哲学，第一节，米利都学派与希腊早期朴素唯物论思想。先生讲得深入细致，旁征博引。每引一条文献，先生都会站起来板书。有时会把整段引文全部抄在黑板上。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指出米利都学派的要旨是以物质性的存在来推断世界的构成。对米利都学派三哲，先生给阿那克西曼德的评价最高。先生以现存残简和哲学史家所论为据，指出阿那克西曼德已经开始用抽象的语言表述存在的单一性、万物的运动性和对立面的冲突。先生提醒我们注意，这些看法在初民的原始意识中，是以神话和诗歌来表现的。在这个意义上，米利都学派是第一批哲学家。

在先生的引领下，我惊异于希腊人的奇思睿智。先生只手为我们推开一扇窗，它面对着蔚蓝色的海洋。先生娓娓的讲述让我兴奋，希腊先哲的智慧令我神往。这群人物，既是沉思冥想的先哲，又是嬉笑玩耍的孩童，像泰勒斯，为了向人证明哲学家如果愿意也能挣钱，他预计来年橄榄会有好收成，事先包租下全城的榨油机，而大发利市，尽管他声称，

他的乐趣并不在此。

教室里极安静，同学们都在认真记笔记，只听见纸笔摩擦的沙沙声。先生每要擦掉前面的板书，总会停下来问，同学们都记下了吗？然后用力抹黑板。板擦上的粉笔灰沾满双手，先生便不时地轻拍双手，但总也拍不净，有时想轻轻掸掉身上的白粉，反在蓝棉袄上又添白印。先生连续讲了一个半小时，屋里很暖，先生又穿着厚厚的制服棉袄，加上不断板书，渐渐地额头上有了汗意。先生不经意地用手去擦，不觉在自己的额头上留下一道淡淡的白痕。我坐在教室后面，远望着先生勉力的样子，心里隐隐被某种东西触动，是什么？一时也说不清。以后在与先生的漫长交往中，才渐渐悟出一点儿。

课间休息时，先生去教研室稍歇，随后便回到走廊里燃起一支烟。那时先生吸烟，一个人站在袅袅轻烟中，有点落寞的样子。同学们忙着对笔记。我素来不大重视笔记，关键处记二三笔提示了事。见先生站在那里抽烟，便想过去搭讪，心里头打着私下请教的小算盘，想或许能把读书不通处拿来就教于先生。心里犹豫着，脚步却朝先生挪动。那时我烟也抽得凶，下意识地兜里掏出烟，似乎有点儿向先生借个火儿的意思。

先生大概看穿了我的把戏，反迎着我走来。表情有点严肃，却很和蔼地问，今天讲的有什么地方不清楚吗？我赶忙回答不，没有，我是想问您一些问题，但不是关于希腊哲学的。先生有些不解，今天不是刚开始讲希腊哲学吗？你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是关于康德的。先生喔了一声，似乎扫了我一眼，我觉先生眼中精光一闪。这时几个同学也走过来和先生说话，谈的是今天课上的内容。休息时间一过，同学们回到教室，先生又开始讲课。第一天的西哲史便以米利都学派的三哲之一，阿那克西米尼同质不同量的宇宙构造说结束。同学们鼓掌致谢，我当然鼓得最起劲儿。先生向同学轻轻一躬，便走出教室。

我们随后拥出教室下楼准备吃饭。见先生站在楼前台阶下，正等车送他回家。我快步趋前向先生招呼，先生说你刚才要问的问题今天来不及谈了，下周来上课，你可以把问题写个条子给我，我看看准备一下再回答你。我惊奇先生的谦谨，对我这么个“基本上是文盲”（父亲语）的毛头小子的问题，先生还要准备准备？后来才知道这是先生一生修学的习惯。车来了，我顺势拉开车门，扶先生上车。午饭时，几个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都很兴奋，大谈先生的课。班长庆祥摇头晃脑地说，看看，这就叫言必有据。确实，我们这些心在高天而不知根底的同学少年，这是第一次亲炙高师。先生

的课让我自识学海无涯，工厂里混出来的那点不知轻重的小得意实在浅薄。

过一周，先生又来上课，第二讲从赫拉克利特一直到巴门尼德。先生有意把这两人放入一个单元，这样可以结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赫拉克利特的赞扬来反观巴门尼德的思想。先生认为赫拉克利特实际上是把人当做自然界的一部分来观察，可以称得上是个自然的一元论者。他从自然界的变动不居推论世界本质是永恒的变易，我们可由此推广至人类社会也充满了变易。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是这种变易的表现形式。当时我理解先生是想借此打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以符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陈述的原则。

课间休息时，我把准备好的字条交给先生。我的问题是因读列宁的《唯批》而起。那时毛泽东的《实践论》是读哲学的日修课，在辩证唯物论的真理论中，实践标准是至高无上的。列宁在《唯批》中却认为实践标准并不是绝对的，它永远不能达成对真理的完全证实。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若从康德哲学论，《实践论》中所谈的实践之为真理标准仍属知性范畴，它不过是知性运用范畴统一感性材料的过程。而列宁对实践标准绝对性的保留却与康德界定理性认识能力相通。既然实践之为感性活动不能绝对判

定真理，康德的物自体就有了存在的理由。

这个想法在当时有点大逆不道。但难道不正是先生讲到了哲学的爱智本性吗？就算因无知说错了，想先生也会宽容。先生看了一下我的问题，说你读书很仔细，这个问题几句话说不清楚，下次我带些材料给你，有些问题书读到了自然就解决了。先生的这句话让我受益终生。后来读书治学每逢难解之处，就想起先生的话。

那天课程的第二部分先生讲巴门尼德。先生用英文念出巴门尼德的名字，重音放在第一和第三个音节上。在第一个音节上还带上点儿化音，听起来很特别。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种读法。后来读西哲史，对巴门尼德的称谓总是随了先生的念法。先生很看重巴门尼德的思想，虽然也批评他的僵化的唯心主义存在观，但却告诉我们巴门尼德在哲学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他对存在的解释开启了本体论的先河。

先生的讲课激起了我狂热的求知欲。从前以为自己还是读了几本书的，在厂里小兄弟之间也有点卖弄的资本，一不小心也拿自己当了回事儿。听了先生的课，才知道自己简直就是一张白纸，至多上面揉出了几道褶子。于是痛下决心要刻苦读书。可那时候，找书难呀！就先生讲过的这些内容，背景知识就涉及希腊历史、文化史、人物传，哪里找去？清

河镇上有个小饭馆，是我们常去喝酒的地方。对面是个新华书店，进门一股子土味儿。陈列社会科学书籍的架子上就那么几大色块：深蓝——马恩全集；鲜红——毛泽东选集；深棕——列宁全集；土黄——斯大林全集；暗红——马恩选集。一次和同学在小饭馆喝完酒出门乘兴进了书店，翻了半天，找出一本康德的著作《宇宙发展史概论》，算是难得的收获了。

又到先生来上课的时间了。现在每周就盼着听先生的课。先生很快将希腊哲学梳理了一遍，跟着开始讲授罗马哲学，卢克莱修、琉善一路道来，让我如沐春风。那天课间休息，先生在门口朝我招手，我急忙走过去，见先生从他那只黑色人造革提包里拿出一本书，说康德的著作不好读，蓝先生的译文也不好懂。大约是前次他问起我读了康德的哪些书，用的谁的译本，我便如实讲了。先生轻拍手里拿着的那本书，说这本书讲得清楚，译文也顺畅些，你可以读一读，有问题再讨论。我接过书，厚厚的一册，书页有点黄，是斯密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倬然译，商务印书馆出的。我谢过先生，回到座位上翻看，突见书中夹着一张纸条“供工人师傅批判参考”，心头一紧，才意识到先生授我此册是冒着风险的。

一九七五年，“文革”已经气息奄奄，但正因其将死而愈见凶险。先生这一代人被肆意凌辱二十余年，校园中也多见

弟子反噬恩师的孽行。我与先生仅几面之缘，片刻交谈，先生便将这属于“封、资、修”的书籍授我。这绝非先生对我这个毛头小子青眼有加，而是我提的问题引先生“伎痒”，那是久违了的“思想的快乐”。先生夹个纸条来遮人耳目，却掩不住几十年矻矻求真的一瓣心香。后来年岁渐长，阅历略丰，才明白那些真正投身思想事业的人，大半有犯难而上的勇气，正如苏格拉底宁死也要对弟子讲完最后的思考。当海德格尔深悟到“思想之业是危险的”时候，他绝想不到中国的运思者面临的是双重的危险：理念与人身。

一九四九之后，紧追苏联，院系调整，改造大学，以致大雅无作。及至“文革”，校园皆成战场，师生半为寇仇，荼毒心灵，夺人性命，一至斯文涂炭，为华夏千年所罕见。先生心中寂寞啊。碰到能谈及学理的机会，先生便不愿放弃。后来读到先生写于一九三八年外敌入侵时的文章《中国文化对目前国难之适应》，更明白先生的举动是他毕生信念的反映。先生说：“古代希腊人虽然一个也没有了，但只要人类还存在着，他们那些寄托其理想的活动力之文物，流传下来，就会给我们后人以莫大的启示、鼓舞和慰藉。我们很可感觉到几千年前的人类精神文化，那些天才的灵魂与人格，与我们息息相关，并对我们殷切关照。”

我把先生授我的书认真读了，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理数有了粗浅的了解，但对先验辩证论一节总觉模糊，以为康德论述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总有扞格不入的地方。越读书，问题越多，课下我向先生表露了这个意思。一次课后送先生下楼，先生突然说，你有时间可以到我家里来，这样可以多些时间谈谈。说完递给我一个旧信封，是别人寄给他的信，上面有地址“北京大学朗润园十公寓 204”。先生说你可以在周末不上课时来，我总是在家的。我极喜能有机会再聆教诲，便把这个旧信封仔细收好，心里盘算着哪天去叨扰先生。

### 三

一九七五年严冬，临近年关的一个晴朗寒冷的周日下午，我敲开了朗润园十公寓 204 的门。

朗润园在北大东北角。进北大东门，沿未名湖东侧北行，过小石桥行百余米，便有一组楼群兀立。楼不甚高，红砖砌就。严冬时节，楼之间衰草枯杨在寒风中瑟瑟颤抖。进楼门，



玄关处较常见的苏式建筑进深略宽，暗暗的。楼梯拐角处，堆放着一方大白菜，靠墙有几辆破旧的自行车。204 号是二楼左手的单元，暗褐色的门上有几处破损的痕迹。

敲门片刻，门轻轻开了，一位中年妇女当门而立，体态停匀，头发梳得净爽，一副南方妇女精明强干的样子。她就是先生的夫人，我后来一直称师娘的。师娘说话声音极轻，说“周先生在等你”。师娘在我面前都是这样称呼先生的。我进门，扑面一股暖气，夹杂着饭菜香。门厅甚暗，未及我眼睛适应光线，先生已从对面的一间屋子里走出，连声说欢迎欢迎，便引我进屋。这是先生的客厅，但大约同时住人，两只简陋的沙发，上面套着白布罩子。靠墙有张大床。后来才知道，“文革”起时，先生这套四居室的单元竟同时住过三家人。而我去时，仍有一户与先生同住。住房条件够恶劣的。

我刚落座，先生就忙着倒水。茶几上的圆盘里放着一罐麦乳精，一瓶橘汁，是那种需要倒在杯子里稀释了喝的。我想这是当时中国民间能见到的最高档的饮料了。后来知道先生爱喝咖啡，但七五年很难找到咖啡，先生大约就用麦乳精中加入的那点可可来替代。我忙起身，接过先生冲好的那杯热气腾腾的麦乳精，请先生坐下。心想就我这么个工厂里摸爬滚打的糙人，居然要喝麦乳精，先生太客气了。

先生随便问了几句家常，知我母亲原来也是清华的学生，便说，那我们是校友，将来有机会去看看她。我忙说家母在清华拿读书当幌子，革命为主，属于不务正业。先生笑了笑说，她那才是正业哩。话入正题，先生说，希腊罗马哲学一个月四次课就完了。时间短，内容有限，你要有兴趣于哲学，怕还要多读一些，因为它是基础。我可以告诉你要读哪些书，我这里还有几本参考书，你看了，有问题再谈。我便把年内要来北大哲学系读书，没来成的事简述了一下，大约表示了有心向学的意思。先生注意听了，便说，这不是坏事，真到北大哲学系里你就读不了书了。他们很忙，就是不忙读书。倒是你现在这样好，时间集中，可以专心读书。

先生说，要读希腊哲学，先要读希腊历史。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要紧的。我那时只在商务印书馆出的《外国历史小丛书》中读过介绍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小册子。希罗多德的名字从未耳闻，便问先生可有他的书。先生说有，过一会儿找给你。先生随即就讲起了希腊城邦的结构、社会等级、公民与奴隶、雅典与斯巴达的特点。不用讲稿，娓娓道来，条分缕析，启我心智大开。我拿出准备好的笔记本，仔细记下先生所述。先生说，这些都在书上，我给你提个头，你倒是读书时要多记笔记。

先生又问我，可曾读莎士比亚的戏剧。我一时反应不过

来，不懂先生何以从希腊一下子跳到莎翁。便嗫嚅道，读过，但不多，只《哈姆雷特》《李尔王》等几部。也巧，上初中时，班上有一姚姓同学，住炒豆胡同安宁里，其父供职中央戏剧学院，他家中有一《莎士比亚戏剧集》，是朱生豪的译本，我曾借来胡乱读过一些。先生说，初中生，十三四岁，读不懂的。现在可以重读。我问先生莎士比亚和哲学有何关系，先生提高声音说，莎士比亚的戏全谈人生哲学，比哲学家高明得多。先生又说，一等的天才搞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歌德、席勒。二等的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作诗，做不成只得回到概念里。三等的天才只写小说了，像福楼拜。说罢大笑，又补充说，我这是谈天才。而我们这些读书人至多是人才而已。若不用功，就是蠢材。那时先生讲的话我不全明白，只觉得这里有些东西要好好想想。后来读了先生一九四三年的力作《莎士比亚的人格》，才明白先生治学是以真、善、美的统一为人生与思想的最高境界。先生以为，莎士比亚“具有一种高越的人格，他用他的人格，能感触到真的最深度”。

我对先生说莎士比亚的书不好找，又说到家里有一套“人人丛书”的英文版，是家母“革命”之余学英语时用的。家母的同学刘正郊先生是英语权威，曾编《英语常用词辞典》。他住在南锣鼓巷政法学院宿舍，时来家中走动，我曾听他用

浑厚的男中音朗诵过这套书中的《哈姆雷特》，据说他是“标准牛津音”。先生大喜，说那就直接学读英文原版。我说我的英文程度太低，读不懂的。先生沉思片刻，坚定地说，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学英语。不懂外文，学不深的。将来你要读的书大多是外文的。

现在回想，不知先生为何认定我会去念外国哲学。一九七五年，“文革”未完，我二十来岁一个小工人，英文大字不识一升，而先生似乎先知先觉，已经看到国家要大变了。

谈了许久，不觉已近黄昏。先生起身说，找几本书给你，先开始读起来。便引我出客厅，左拐推开了一扇门，进屋是一条用书架隔开的走道，狭窄得很，将能过人。书架后靠西墙一张硕大的书桌，黑色漆皮磨损得厉害，无漆处透出原木色，已磨得油亮。这便是先生日常含英咀华、纂言钩玄的地方。先生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递我，记得有希罗多德的《历史》，汤姆逊的《古代哲学家》，和一本有关苏格拉底的书，似乎是柏拉图的《申辩篇》，译文半文半白。

先生嘱我，希腊哲学家中最要紧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自他而来。坐在先生书桌旁，见高至屋顶的书架，上面摆满了书，高处还放有几函线装书。后来才知道先生得空也谈中国哲学，曾专论董仲舒、戴东原。先生书

桌对面靠东墙放着一张单人床，顶头有一架书，都是外文，其中一套，暗红色皮面，烫金书脊，极厚重地挺立在书架中央。我过去用手摸，听先生淡淡地说，“那是《康德全集》”。先生语出，我摸在书背上的手似乎触电。从未想过与先哲如此接近，竟至“肌肤相亲”。我与先生相对无言。夕阳正沉在未名湖上，一缕金光入室。刹那，这狭窄局促的小屋显出辉煌。

离开先生家已是夜幕初垂。清冷的天空有几点寒星。天酷寒，我却浑身灼热，心中兴奋满溢。不为他事，只因先生授我一席话，借我几册书。以往，多少渴望冀求，晦暗不明地蜷曲蛰伏心中，而今先生的智慧和学识点亮烛火，通浚阻塞，唤醒了一个青年的精神生活，让他懵懂的内心世界疏朗清明起来。

一九七五年的最后一天，几个同窗好友约好在三里河三区的朋友家中相聚，一起送旧迎新。那天喝了不少酒，唱了不少歌。在一九七六年来临的一刻，我与好朋友走到木樨地，沿长安街东行，在凛冽的寒风中畅谈。我给他讲先生让我读的书，他谈写作的心得，一再强调我们写作的功底太差，要好好想想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当我们回到他家时，已是晨曦微露。就这样，在纯真的友谊和对未来的憧憬中，我们迎来了一九七六年第一个清晨。

几天后，收到先生一则短函，说七日他要进城看望朋友，约我晚上在萃华楼饭庄与他见面。我心中有点奇怪，先生为何要约在饭馆见面。后来次数多了，才知这是先生的一个习惯。萃华楼饭庄在灯市西口和锡拉胡同之间路东。门口是几级很宽的台阶，玻璃门上挂着洁白的纱帘。我按时赶到，推门进去，见先生已在店堂深处入座。我急趋前，问先生为何约我至此。先生说他在城中看完朋友正是该吃饭的时间，上次的话没说完，正好可以见面，吃饭说话两不误。我很少在饭馆吃饭，少年时曾跟着一些大小“晃儿”去过莫斯科餐厅，边看那些张狂男女吹牛“拔份儿”，边低头猛喝奶油红菜汤。最喜欢就着抹了黄油果酱的方面包，喝甜腻腻的樱桃酒，喝着喝着觉得自己常佝偻着的瘦弱身躯竟壮硕起来。对先生讲了这些，先生笑笑说，莫斯科餐厅也曾去过，但那里“太高大了”，人在里面有点不合比例。此外，也太吵闹了些。我四面打量一下这个餐厅，才觉得这里清静，大小适度，适合先生这种儒雅之人。

先生点了菜，等候着，便开始问我上次拿的书读了没有。我告他先读了汤姆逊的《古代哲学家》，因为先生嘱我希腊哲学还要多看，所以先读有关希腊哲学的综述。先生马上说，汤姆逊的这本书水平不高，他是想用历史唯物论观点看希腊哲学的发展。但有的地方太牵强，没有说服力。其实我已经

注意到先生读这部书时在天头地脚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对这部书的论述方法多有指责。先生说你只需从这本书得一线索即可。希腊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他多有忽略，比如苏格拉底，他几乎一字不提。柏拉图的《申辩篇》你一时还不能领会。我要告诉你，读哲学第一步就是读懂苏格拉底，他是哲学家们的哲学家，这一点你要用心记住。看先生严肃的样子，我岂敢不用心记。

先生以为，苏格拉底所使用的方法是所谓“精神接生术”，就是要人不是先思考哲学，而是先哲学地思考。前者是以哲学为对象，后者是以哲学为生活。以哲学为生活就要对社会中的问题取一种哲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最宝贵的知识是“知己无知”，自己的各类定见都可能是错误的。若有人告你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你先要怀疑这宣扬者的道德，因为他在说着一些他并未深思过的东西。何谓真理？何谓标准？但这并不是相对主义，因为它不涉及对某一具体结论的定评，只关心你是如何获取这些结论的。

先生说，张扬人的精神生活的神圣性始自苏格拉底。人的精神生活要以寻求“善的知识”为目的。同样，教育的目的也在于使青年人学会探求善的方法。一个好的政治家就是懂得以善为治国理想的人。他曾谴责那些僭主“用装满货物

的船只而不是用道德充满城邦”。先生特别强调，苏格拉底要做普通人的朋友，而不做权势者的辩士。先生又说，希腊大哲可分两类，体系型的，如亚里士多德；诗人型的，如柏拉图。但苏格拉底超于两者之上。柏拉图写对话录，亚里士多德写形而上学。先生佩服亚里士多德而喜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教诲了亚历山大大帝，真做了帝王师。柏拉图推崇“哲人王”，这点苏格拉底知道了会不高兴。因为他是信奉平等对话的人，而不要称王，哲人王就不会对话了。先生笑柏拉图自奉苏氏嫡传，却未学得真髓。

我聚精会神听先生讲，同时记着笔记，几乎没动筷子。先生却边说边吃，毫不在意。猛然发现我面前的饭几乎没动，便说该课间休息了，先吃饭。我狼吞虎咽吃完了饭，便抢着要去付钱，先生拦住我说，你才挣多少钱？我们两人比，我是 rich peasant（富农），你是 poor peasant（贫农），便自己去付了钱。那时我是二级工，挣三十九块八大毛，先生的教授工资大约有两百多块。从此先生和我去饭馆见面，总是先生付钱。

离开萃华楼，天大黑了。我陪先生到地安门，便分了手。先生乘 7 路无轨去动物园换 32 路回北大，我乘 5 路汽车去德胜门换车回清河。赶回学校，校门已关，翻墙进校，悄悄溜回宿舍，躺在床上把先生所讲在心里回述一遍，结果再难



入睡。朦朦胧胧似乎睡了，觉得有人推肩膀，睁眼一看，同屋的守法站在我的床边，两眼含泪，哽咽着说：“越胜，周总理去世了。”那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的清晨。

## 四

周恩来的追悼会开过了，邓小平含泪致悼词，毛泽东没有出席。会后出现了京城百姓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一幕，那一刻我也在场。

班里的同学决定去天安门广场给周献一个花圈，表达悲悼之情。在那时，人们都认为周代表着党内正义和道德的力量。他的去世，使未来中国的政治变化更晦暗不明。当局已有各类禁令下达，老师也来班上劝阻，但我们坚持要去，学校并未强行阻挡。记得是杨晓明大姐找来的大轿车，袁懋珍大姐领着女同学扎起花圈，几位朋友商量着起草了悼文。在天安门广场凛冽的寒风中，全班同学宣誓，要以周总理为榜

样，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离开广场后，我们几个人在南长安街北口康乐食堂吃饭，祖卫情绪悲愤难抑，伏桌痛哭。几个人酒后放胆，大骂阻挠人们悼念周的那些左派。只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叫“四人帮”。

在这个激动不安的时刻，我一直没去先生家听先生教诲。二月初，春节过后，先生来信约我在康乐餐厅见面。康乐餐厅是家有名的餐馆，原先似乎在王府井一带。后来渐渐大众化了，成了普通的大众食堂，搬到了交道口十字路口西北角上。不过名声仍在，先生大约是因了这名声才约我去那里。北京的二月初，天寒地冻，刚在餐馆坐定，外面就下起雪来。雪花漫天飞扬，霎时间街宇皆白。天黑了，餐馆里的雾气在玻璃窗上蒙了一层白色的柔纱，透过它，能依稀望见外面雪花围裹着昏黄的街灯飞舞。

周恩来去世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格外诡谲。稍有知觉的人都知道，搏杀在即。但鹿死谁手殊难预料。先生这时约我见面，当然不是为了教我康德，他是心中不安。诗云：“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中路。”先生心中的“君”就是国家大事。而此时京城内小道消息满天飞。先生听到不少传闻。他知道我消息渠道多，便总把听到的消息告我，核实一下是否可信。

和先生东拉西扯了一会儿，先生很小心地从他的制服棉袄口袋中掏出一张红线横格纸，上面有他手抄的温庭筠诗《经五丈原》：

铁马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

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

先生递给我，说别人告诉他，这是周恩来在去世前抄给毛泽东看的。“象床宝帐”指被打倒的老干部，谯周指中央“文革”中的左派。其实，有关这首诗的传闻我早就听说过，在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就有人传抄，我读到它是由一位朋友抄给我的，用的是几可乱真的欧体正楷，那时他正苦临欧阳询的《九成宫》帖。但我确定先生所听传闻并无根据。同时流传的还有一个完全相反的说法，说这诗是毛泽东抄给他身边人的。“下国卧龙”、“象床宝帐”都是他本人自诩。所谓“空寤主”是指他费尽心力培养的接班人前途叵测，而最终谯周一类投降派会得势。联想一九七五年评《水浒》、批宋江投降派，而周恩来已被江青骂作投降派，所以说这诗是毛抄给他的亲

信的，倒更像。

我将此分析给先生听，先生连连叹气。那天和先生吃饭，气氛沉重。先生不似往日谈笑风生，显得心事重重。我少见先生如此，问他，他叹息道，国家如此下去怕有大乱啊。我当时年轻，并无先生那么深刻的危机感。其实，政党权争本与百姓无关，林冲手刃王伦，关大宋百姓何事？伯尔上校与汉密尔顿决斗亦不干扰美国公民的生活。

饭后，走出餐馆，雪已停了。街上少人行，清冽的寒气扑面而来。抬头见冷月高悬，夜空如洗。餐馆门前就是7路无轨电车，我要送先生上车，但先生说还早，“再走走，谈一谈吧”。先生喜说“再谈谈，再谈谈”。每逢此，我当然从命。我怕先生受寒，叫他放下栽绒帽子的护耳，再戴上口罩。先生笑了，说那就既不能听，也不能说，你是要我又聋又哑啊。怕冰冻雪滑，我便在靠马路一侧轻扶住先生，先生抬起脚说没关系，我的鞋底钉了胶皮，不滑的。果然，见先生那双五眼黑棉鞋底上钉了一层轮胎。

我们西拐，沿着鼓楼东大街，顺大经厂、小经厂一路缓行。刚下的雪松松软软的，走上去嘎吱嘎吱响。

街上几无人迹，偶有电车缓缓驶过，导电杆滑过电线，留下悠长的泛音，像巴赫“G弦上的咏叹”。车过后，晃动的

电线鞭打着路旁老槐树的枯枝，枝上积雪簌簌落下，洒在先生肩头、帽顶上。先生并不知觉，不时挥动一下那根黄藤手杖。

在这静谧的雪夜，我伴着先生行走在玉洁冰清的世界里，不再理会四围黑暗的逼迫。已记不清具体谈了些什么，但肯定不是哲学，多半是交换对国是的看法，对未来的估测。不知不觉已走出两站多地，到了鼓楼墙下。怕再晚了耽误动物园的 32 路车，我硬让先生上了车。电车开动之后，先生举起手杖向我晃了晃，就坐下，随着电车启动的呜咽声远去了。

那天回家，半夜心不安，怕先生滑倒，怕先生没赶上末班车，怕……早起急忙投了封信给先生，问个平安，那时先生家里没有电话。问声平安，要靠 4 分钱邮票。两天后收到先生的信，短短的，说“雪夜漫步京城，心情大好”。

三月间，也去先生那里。但后来查看当年的读书笔记，竟不见先生授课的内容，只记有先生指示我读的一些书目。想必三月里见面都谈国是、政治了。四月六日早起，大谷在班里悄悄告诉我，昨夜警察和工人民兵出动，血洗了广场。当晚，学校通知各班同学都去食堂听重要新闻，在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中，我们知道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行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下台了。我立刻想到此

刻先生必然心焦。他一直预感要出大事，果然就来了。心里计算着快点去看看他。那几天，课基本停了。大家都要讨论学习新精神，表态、声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分子”。但实际上，讨论学习成了关起门的牢骚会。我瞅个机会就溜出学校去了北大。

想象着先生会很关注政局的大变动，正准备着倒给他一些新听说的小道消息。但先生出人意料地平静，说天安门广场他去看过了，人心向背已明，我们要等着看好戏。先生的书桌上摆满了一摞摞的书，书中插满了手抄的卡片。先生正在忙着案头工作。先生平静地说，学校正布置新的运动，这次批邓是重点。总有人会跳出来的，系里“文革”积极分子多得很。走近书桌看先生摊开的书，是《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集》，里面夹满纸条，纸条上注着一些书名和页码。先生见我不解，说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了配合反修、批判人道主义编写的资料集。书是他编的，序是他写的，但仅限内部发行。先生说这些年他又发现了许多资料应该补充进去，但重印这部书绝无可能。只是觉得工作总是要做的，得空就自己动手做。边说边苦笑道，也算个娱乐吧。在这黑云压城、风雨满楼的时候，先生却回到书桌，重伴青灯古卷。我一下想起，袁世凯称帝后，风雨凄迷，鲁迅在京城绍兴会馆中抄嵇康：

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

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

但先生所做，其意义却远超过伤时自悼。先生所披编者，是人类所共尊的一点人道之光。希腊先贤中，先生极尊梭伦。正是梭伦，在僭主庇西斯特拉图尚未得势时，警告追随他的“群众”：“你们真是重视奸徒的言行，跟着狐狸走。”在他掌权之后，又是梭伦说：“僭主政治尚在准备之中时，较易阻止它，当它已经成长壮大，要去除它则是更光荣伟大的职责。”随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中，在平静中继续作诗指出雅典人的过错，“是你们给了僭位者力量，让自己沦为卑贱的奴隶”。先生踵武前贤，在四围的黑暗中，持守着人性与人道的圣火。

我翻看这书，里面尽是我所不知的先哲名言。读几段，不忍释手。先生见我喜爱，便走到书架上拿出一本崭新的书，说，我这里还存有一部，送给你吧。并在扉页上题字“送给越胜同志，周辅成于朗润园”。这是先生送我的第一部书，却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书。

后来我知道，它不仅仅影响我一个人，而是影响了一批有志于学的青年学子。天予就曾对我说过，先生编的这部书

是让他“翻烂了”的书。

先生在书的序言中写道：“二十世纪的人性论与人道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十九世纪的继续。不过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却更为壮大，影响也更广。这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苏联的斯大林，提倡集体主义，后来他的对手便以人道主义来补其缺点。至于西欧的社会主义，几乎全部大讲特讲人道主义，这也可算是时代的特点。”对我党所擅长的意识形态批判稍有记忆的人都应该知道，“文革”前夕，在阶级斗争的震天杀声中，先生敢讲人道主义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时代的特点”，敢直指斯大林的名字，提出“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该是何等的胆识。

一九七六年七月，京、津、唐一带天摇地动。许是十载“文革”戾气上动天庭？许是屈死的冤魂大放悲声？毕竟天地一怒无人能阻。只恨苍天不恤孤贫，又夺我中华无辜百姓几十万性命。那一段，社会似乎停摆，学校也停了课。我整天东游西逛，身上的书包中总装着先生赠我的书。先生授书给我时曾告我，皮科的《论人的尊严》是文艺复兴初扬时的重要文献，是人道反抗神道的宣言。先生还说，爱拉斯谟的思想在人文主义兴起中意义非凡。《愚人颂》是一部需要反复读的书。他借愚妇之口对社会的讽刺批判拿到现在来看都不过时。先生在书中收《愚人颂》二万余言，看得出先生对此



书的重视。

八月初，京城到处都在建地震棚。学校工厂内存有角钢、木方等材料，机械班的老齐、老穆几个哥们儿就拿来又锯又焊，盖起了号称“抗十级地震”的棚子。其实学校早就没人了，盖好也少有人住。那天我和祖卫去看老齐盖的棚子，随后就溜进了教学楼。地震之后，近十天没进过楼。站在教室里，见景物依旧，只是人去楼空。课桌讲坛上积满了灰尘，没有了往日的笑语欢声，没有了先生讲课的川音。我默默看着，有点伤感。祖卫突然唱起歌来：“在那金色的沙滩上，洒满银色月光。寻找往日踪影，往日踪影已迷茫。”歌声优美悲伤，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突然，我极想去看看先生，不知他的地震棚盖得如何。说走就走，从清河直奔成府。

先生的地震棚盖在离朗润园不远的一片空场上。那几日传说还有大余震，所以不让在楼里待。人们只好栖居在地震棚里。我顺着各式各样的地震棚找过去，见先生坐在一把折叠椅上，一手拿着扇子不停地扇，一手拿着本外文书在看。见我来了，先生极高兴，起身说出去走走。一边抱怨地震棚里根本睡不好觉，说他夜里会溜回家睡，否则震不死也得累死，索性由它去吧，极达观潇洒的样子。

沿未名湖向朗润园走，见十公寓楼旁的东墙上有一个大

豁口，好像是地震后墙壁毁损留下的洞。先生说可以从这个豁口直接走到校外，便领我踩着乱石钻出豁口。谁知墙外有道小沟，不深，但有近一米宽。我正想下到沟里扶先生过去，未及回头，先生竟一纵身跃了过去，身手颇矫健。可着实吓了我一跳。毕竟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哪儿经得起这般躲闪腾挪。先生却全不理睬，落定就向前面的田野走去。

我们一直向北，过一条小马路就进了圆明园。那时，圆明园不大有人去。福海是一片荒芜的芦苇荡，湖边阡陌交纵，杂树乱生，园内鸟啾蝉鸣，风清野静。可能在地震棚里憋屈久了，出外走动，先生兴致极高。我们信步漫走，我恭听先生随意讲评。过大水法残迹，先生指着倒在地上的拱形门楣说，烧园后很久，这东西还立着，后来是咱们自己人给拆了。

先生又讲起火烧圆明园的经过，当年英法联军点火前在城内发告示，说为英法使团中被清廷虐待死的官员报仇。告示一发，就有刁民与太监勾结。英法联军捡了几处点火，火一点起，内奸们就入园大掠。为掩盖痕迹，掠一处，点一处火，致使大火蔓延不可收拾。这园子是外寇烧一半，内奸烧一半。

先生讲起项羽烧阿房宫。照《阿房宫赋》所讲，阿房宫要胜过圆明园，但照样“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先生说，阿

房宫这把火实际上是秦始皇焚书埋下的火种。秦始皇焚书坑儒，读书人便离心离德，认秦为“暴秦”。秦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就是逼读书人昧良心说假话。章碣诗说：“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可是刘项手下读书人很多。所以，又有袁宏道说：“枉把六经灰火底，桥边犹有未烧书。”有未烧的书，就有读书思考的人。先生又说，其实这把火一点就是两千年。英法联军能欺中国之弱，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立了功的。

地震前，我曾把我们哲学班写的中国哲学史讲义呈先生过目，先生始终未置一词。现在回想，这部讲义跟着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思路走，其粗陋、荒疏想想都吓人，先生实在无法评点。此时先生倒略谈了一点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想法。先生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墨、法、兵，各逞其能，是我们最有创造力的一段。而后，秦焚书，汉定一尊，中国思想兴衰就随当权者意志，独立思想很少见了。

先生感叹，“礼失求诸野”都难。就算林下泉间有遗贤，要么默默终老，要么抓去杀头。先生问我是否读过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我说这些名篇曾背过一些。先生说嵇康“七不堪”、“二不可”，推脱得够干净了。最后司马王朝不容他，不管你隐还是不隐，一样杀头。有思想的头脑都砍了，民族还能有什么创造力。“礼失求诸野”？恐怕朝野都一样，只剩

乡愿腐儒而已。

没听先生这么悲观地谈论中国思想，一时答不上话。后来读先生论中国思想的著述，发现先生原本是相信“儒分朝野”的。或许文化革命大扫荡，把先生最后一点寄托也吞没了。没想到先生竟说，他们那一代思想保守，经过太多运动，都成惊弓之鸟了。中年一代是搞运动出身，读书时间不多。倒是你们这些“文革”中长起来的年轻人可能会做点事情，思想上没框框，敢想敢说。先生的希望让我惭愧，心想自己倒是敢说，但大半是胡说，倒是没框框，可也没规矩。跟先生说了，先生说书读到了就不是胡说了。

说到读书，我就请教先生，爱拉斯谟的《愚人颂》指东说西，扑朔迷离，不好抓住重点。先生说，愚妇的话有时需要从反面理解，她是正话反说。先生又点拨道，《愚人颂》三大主旨：立身人道、宣扬宽容、批判专制。立身人道就是相信人性都是共同的，在共同人性之下，冲突都可以通过对话、妥协来解决，不像路德那种宗教极端分子，凡事非拼个死活。这就必须学会宽容。要争取宽容的环境，就非反抗专制暴政不可，因为专制暴政是人性和宽容的死敌。爱拉斯谟借愚妇之口说，那些道貌岸然，反对别人感官享乐的人，只是为了自己“独占快乐”，又痛斥那些不贤明的王者是“可怕的扫帚星”。还借愚妇之口大赞“无知”，说那些自以为是的极端分

子，“本来自己是头驴，却以为自己是雄狮”。先生说文艺复兴时代诸贤人中，爱拉斯谟最近苏格拉底。后来读爱拉斯谟的传记，发现他果然崇拜苏格拉底，称之为“神圣的苏格拉底”。

地震后有十几天，京城不见太阳，终日灰蒙蒙，闷热蒸人。但那天与先生在圆明园散步，却倍感清凉。不是天气变化了，而是听先生谈古论今，心里觉得畅适。先生还教我，读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东西，不能忽视那一时期的艺术。说丹纳的《艺术哲学》可以一读，那里资料不少，傅雷译笔也佳。可惜他“文革”一起就自杀了。先生说他有朋友和傅雷很熟，知道他的死是让人逼的，而逼他的人现今正坐着高位。说罢黯然。

在圆明园走走、说说、坐坐，不知不觉已近黄昏。先生说找个地方吃饭吧，反正家里也开不了火。我坚持要走，不打搅先生，先生却执意不放，说吃好饭上楼把丹纳的书找给我。于是随先生沿北大校园外墙走了一会儿，到了南门外的一个饭馆，随便吃了点东西就送先生回家。

进了家门，天尚未黑，先生很快找到了丹纳的《艺术哲学》。我随手一翻，见书里天头地脚有许多先生的批注。读先生用过的书，顺便读先生的批注，仿佛听先生讲课。先生又

走回书桌，拉开抽屉，拿出一叠纸，说这篇东西你可以读读。请人译了，但没有收入资料集。我接过手，见是手稿，极工整地誊写在方格稿纸上，是拉波哀西的《自愿奴役论》。先生嘱我一定保存好稿子，读完还给他。说仅此一份，没有副本的。我小心地把稿子放进书包。先生见我放妥帖了，又说，托尔斯泰是流泪读这文章的。我悚然。

回去展读这篇手稿，一连串的句子敲击心扉。

拉波哀西劈面就提出问题：“我只想弄清楚，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乡村，这么多的城市，这么多的民族常常容忍暴君骑在自己头上。如果他们不给这个暴君权力，他原不会有任何权力。”况且这个暴君“多半来自全体人民中间最胆怯和最软弱无力的人。这种人并不习惯于真正上阵交锋，倒是习惯于比武场耍弄花招。他不但不能治理别人，就连他自己也是由百依百顺的妇人来侍奉”。

在拉波哀西看来，要想改变这种受奴役状态甚至不需“战而胜之，只要国人都不愿受奴役，自然不战而胜。不必剥夺他什么，只要不给他什么就行了。国人无须为自己做任何努力，只要自己不反对自己就行了”。因为从根本上，“是你们自己使他变成现在这样强大，为了造成他的伟大，你们不惜牺牲生命。他唯一的优势还是你们给了他的，那就是毁

灭你们的特权。只要决心不再供他驱使，你们就自由了……只要不去支持他，他将会像从下面抽掉了基础的庞然大物一样，由于自身重力塌陷下来，就会被砸得粉碎。”

然而，拉波哀西却绝望地看到：“人民丧失了理解力，因为他们再也感觉不到自己的病痛，这就已表明他们是奄奄待毙了。甚至现在的人，连热爱自由也觉得不自然……人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自由，所以要唤醒他们把自由收回来，是困难的。他们甘愿供人驱使，好像他们不是丧失了自由，而是赢得了奴役。”拉波哀西分析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他们的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继，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做自然状态。竟然从来不愿意看一看自己的遗产证书，以便弄清楚他是不是享有了全部遗留给他的权利，人们是不是从他自己身上或者他的前辈身上剥夺了什么东西。”

拉波哀西断言：“暴君没有爱过，而且也不会爱任何人。友谊是神圣的名词，是一种神圣的感情。只有正派人才能建立友谊，也只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友谊才会发展。它不是靠恩惠，而是通过正直的生活才能维持下去。”拉波哀西呼吁：“让我们行事善良吧，不论是为了我们的良心，不论是为

了对美德本身的热爱。我深信，在上帝看来，没有比暴政更可恶的东西了。上帝会在来世单独给暴君和他们的走狗，准备下特殊的惩罚。”

放下拉波哀西的文章，心绪难平。先哲对自由燃烧着的渴望，对人之为人的权利与尊严的捍卫，打动着，也困惑着我。我从未经历过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冒险，也从未意识到从公民政治权利的角度上看，我们根本就是奴隶。更没有想过，这奴隶地位是我们每日欣然乐在其中的。意识到这点，有痛苦，有无奈，但更想知道为什么。想此文对托尔斯泰的震动，便觉我们与先哲之间心曲相通。从先生不及一年，但渐渐明白，我们的心灵蒙昧昏暗，我们的热情虚骄盲目，很容易被人鼓动起来去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文革”初起，我尚年幼，但也曾羡慕过哥哥的同学们手提皮鞭，耀武扬威的样子。由仇恨浇灌的心田最适合生长致命的毒芹，只有自由与博爱的乳汁才能养育高贵的人格与优雅的心灵。

我给先生写信谈我的心得，先生回信说，做奴隶不可怕，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而沦为奴隶的情况时常会有，但记住不要自愿做奴隶。读书思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沦为奴隶而不知。先生对此点的警觉与反省坚持不懈，九一年先生在印度寄文章给我，先生说：“过去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好好地爱它，让它少受阴影的干扰，有负于它。更令人痛心的是，我



们竟然也随着阴影活动，做了它的顺民、奴隶、帮凶，有时自己还和他们一起，觉得自己了不起，自鸣得意，真是可怜可悯，又可耻！”先生这样一个淳厚之人竟如此痛责自己，他内心的深觉，我们晚辈能不悚然？！

一个月后，毛泽东离开人世。再一个月，“四人帮”也下了大狱。一股莫名的欢乐席卷中华大地。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秋天里的春天》寄给先生，先生来信鼓励我这篇初中生习作，又说，尘埃落定，你应该读书了。

## 五

一九七七年底，社科院面向社会招收社科研究人员，经父执介绍，我递交了几篇论文，竟得哲学所领导首肯，过了年就去哲学所报到。先生知我到哲学所工作，很高兴，说哲学所的专业图书在国内首屈一指，特别是有购书外汇，每年可以购国外书刊若干，能够随时了解国外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先生说仅为此就应该好好庆贺一下，约我去他家吃饭。

一九七八年，时值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校方给先生配了一套新房，在北大西门外蔚秀园。“文革”中先生在朗润园一直与别人同住，起居读书皆不方便。当时有人劝先生不要离开朗润园，说再坚持一下，别人总会搬走的。但先生太盼望能有一方自己读书的清静天地，故坚持要搬家。大约在三四月间，我去了先生新居。当时楼刚建成，路都未整修好，楼前水泥管、钢筋、灰土烂泥，一片狼藉。

先生新居在一楼，敲开门，先生神情愉悦地引我进屋。我祝贺先生乔迁之喜，先生笑答，不是乔迁，是被扫地出门。想想先生是无奈才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朗润园，我也有些伤感，毕竟那里才是我开启智性之航的港湾。回想与先生促膝窄室，四周典籍环绕，听先生谈古论今，那熟悉的氛围，甚至气味都如在身边。我本天生怀旧之人，在这陌生的新居里，有点不适应。真是新房子，屋里满是油漆、水泥、沙灰的味道，打搅了旧有的书香、往昔的静谧。幸亏那两把旧扶手椅还在，见之如遇故人。不过先生在这里，等几日，书香自会归来。

先生问起我进哲学所后的工作，我告他正在随刘青华先生学做哲学期刊资料的主题分类。先生说你可借机大量浏

览。我告先生其实还难见真学术，大量文章属拨乱反正之作，仍在清理四人帮的思想。先生自然又问及我读书的事儿。自先生一九七五年底命我攻外文，七八年时我已能对英文原著粗通文意。先生说你能读原著，便要选几部耐读的名著来读。现在你还不到广泛浏览的时候，所以要读得少，读得精，像希腊哲学，伯奈特的《希腊哲学史》是要读透的。先生指点我说，这部书哲学所图书馆一定有，但也许借的人多，若你借不到，我从北大图书馆找来给你。

遵先生嘱，我找来这本书读。这确是一部博大精深之作，特别是对苏格拉底的阐述独有所见。他强调苏氏提拔精神生活，集宽、智、勇于一身的求真精神。先生以为伯奈特讲哲学家从人格着眼，梳理精神气质与学理探求的关系，很高明。在先生的引领下，我常在所里图书馆流连，果见群书沓来，目不暇给，眼界为之大开。

20 世纪七十年代末，解冻之始，玄冰渐融，开始有了西方古典音乐、中外名著面世。也上映了一些外国影片。其中有一部日本片子，它改编自日本女权主义作家山崎朋子的纪实作品《山打根八号娼馆——底层女性史序章》，记述日本世纪初贫苦女性被迫漂流东南亚为娼的史实。这些被称作“南洋女”的底层民女，或被骗，或被卖往南洋为娼，受尽折磨凌辱，多数人死而无归。由于影片涉及南洋女的卖春史，影

片中有些妓院的场景和暧昧的镜头，所以上映后引起一些卫道士的不满。

那天我在所里资料室看资料，碰巧翻到几封有关《望乡》的群众来信，其中有些言辞激烈，大骂影片“诲淫诲盗”“腐蚀青年”，声称毛主席他老人家地下有知会死不瞑目，等等。用语极粗鄙、狂热、刻毒，能感觉“文革”阴影不散，余孽犹存。更可怕的是他们要求立刻禁演此片，并组织专门机构重新审查各类文艺作品，判定香花毒草。当时严家其先生在资料室，我把这些东西给他看，也谈了我的看法。严先生赞成我的观点，要我写篇文章来辩驳，说他会送给《光明日报》，因为当时《光明日报》是思想解放的先锋。

我连夜写完了文章，由于文章涉及道德问题，题目就定作《〈望乡〉的伦理学》。第二天交严先生看，他提了几点修改意见，我便请他共同署名。我是新人，为尊重严先生，请他署名在先。严先生谦谦君子，说文章是你写的，我只是提了点意见，你当然是第一作者，说着拿笔把稿子上他的署名改到了后面，就拿着稿子走了。两天后文章就在《光明日报》上刊出了。几天后我收到了先生的信。

先生祝贺我发文于《光明日报》，说你这是第一次发文章于正式报刊，希望今后能多有议论公之于众，同时鼓励了我

的文章，说这是一个很要紧的论题。先生感叹几十年来道德学说荡涤一空，人们只谈阶级而不谈伦理。虽说社会有阶级区分，但善恶标准却是不移的。善恶是人内在品质的表现，并不依人的社会地位来评定，更无涉于个人所操何业。先生引《礼记》中语“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

先生说，你谈《望乡》的伦理学，实际上是谈妓女的道德。这看似悖论。妓女在世人心目中总和道德沦丧相连。妓女这个名词似乎就是道德败坏的象征，但谁能说妓女就没有道德？先生说，谈妓女的道德人格，古今中外并不罕见。古有唐人白行简的李娃，清人孔尚任的李香君，今有陈寅恪的柳如是，外国有萨特的丽茜，《望乡》中的阿琦婆。她们都是心中有大义大爱的人，贫贱屈辱中不失善良与自尊。倒是那些高居人上的帝王领袖常常是大恶之人。在中国古有桀、纣，今有“四人帮”，在外国古有尼禄、卡利古拉，今有希特勒。先生说，权力、地位并不带来善。权力只在弘扬和实现善时，才是有道德的。可惜世人常以地位、权势、金钱来衡量价值，判断善恶，结果把肆无忌惮的罪恶当做伟大来崇拜，实为大谬。那些大受崇拜之人正不知做了多少大恶，人们却依旧闭着眼睛朝拜。这实在是扬恶抑善的人世大悲剧。先生援引《孟子》：“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与先生几年交往，在言谈话语、往来书信中能感到先生心中的炽热。凡论及时政、品评人物、阐发学理，总着眼于家国兴亡、善恶扬抑、大道存废，偶谈及“文革”中对读书人的摧残羞辱，炽热便化为幽愤，指斥群邪若金刚怒目，大异日常的温文尔雅。此时真如子夏所言，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先生苦恼于讲坛之上难谈真学问，而奉承时尚、照本宣科又必致谬种流传。这个矛盾常常撕扯着先生那样不肯全盘输诚的老一代读书人。陈寅恪先生哀叹“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先生亦有同悲。在先生看来，“文革”不仅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同时也败坏了社会道德生活，而这动摇了立国之本。先生长期致力于道德哲学，对此乱象有较他人更刻骨的体认。先生以为拨乱反正主旨在于收拾人心，而我却以为要在制度上脱胎换骨。与先生争辩，偶有言语过激，先生也不以为忤，总是静静地听我陈述，若觉我乖谬过甚，先生的救治也是引经据典，或示我以必读之书。

此次先生来信，指评我的文章，也随带教我 Ethics 与 Moral 在用法上的细致差别。我本对道德哲学所涉甚浅，却提笔妄谈伦理学，先生抓住此点，让我一窥门径。

一九七八年初夏，有位同窗好友想报考北大哲学系，开

始复习功课。我一直忙于调动工作，未及准备，现在受他鼓舞，也想一试。七八年十月底，先生体检时发现尿蛋白偏高，怀疑肾脏有问题，入住北大校医院检查。我去医院看先生，见他精神很好，似未把这病当回事。见先生依旧谈兴十足，便和先生谈起我想报考的事。先生想了一下，口气肯定地说，我看你不必报考大学本科了。先生说，中国大学之前的教育是没有哲学一科的。哲学系本科生入校要从头学起，都是上基础课。你已经有相当基础，再从头学起有些浪费时间，不如直接报考研究生。当时的政策允许有同等学力者直接报考研究生。先生的话让我兴奋，但因不知其中深浅而有些犹豫。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你能行！”

先生说我行，自然就要一试，便问先生取何专业方向。当时从先生读哲学史较多，便问先生是否报考西方哲学史专业。先生不赞同，说读思想史是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打基础，专做某一哲学史流派的题目容易限制自己的眼界，成为“专家的专家”。先生说研究题目还是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找吧。至于报考何处的研究生，先生的意见是不必报考北大，因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都是起步不久，哲学所的条件可能更好些。前不久我浏览国外现代哲学时曾对阿多诺的《音乐哲学》有兴趣，后又被马尔库塞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批判后现代社会所吸引，听先生讲要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找题目，

心中便定下了法兰克福学派为研究题目。一九七九年初便报考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杜任之先生的研究生。随后，几个月闭门不出复习功课。待考取之后，因杜先生年事已高，身体不适，便转在徐崇温先生名下读法兰克福学派，同时继续随辅成先生读西方古典。虽不在他门下，但先生仍视我如弟子，开始新一段收获甚丰的读书岁月。

## 六

入读研究生院之后，我只去了趟哲学系所在的十一学校，便不再露面。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没有自己的校园，上课要借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舍。像我这样家在北京的同学除了看着课程表去师大之外，真是自由自在。当时除了专业课，我选了英语提高班和宗教系的课，曾去听赵复三先生讲基督教。念研究生三年，基本上是泡图书馆。除了所里图书馆就是北京图书馆。当时的北图在文津街，紧贴北海西岸，是明玉熙



宫旧址，屋宇恢宏肃穆。进大门，穿过条石漫地的庭院，沿汉白玉砌就的台阶拾级而上，跨过厚重的古铜色门槛入厅，一股馥郁的书香扑面。高大空旷的阅览室内，一排排笃实古朴的长桌，一把把宽大舒适的圈椅，一盏盏黄铜绿罩、柔光泛泛的台灯；黄昏时分，夕晖透过高高的花棱窗泼洒到光洁的水磨灰地砖上，绘出规则的花纹，宁静、温馨，坐久了便有微醺。

先生有个习惯，每个月初都要到北图来查阅新书目，借阅一些北大图书馆没有的资料。自我开始读研究生，先生便提议每月选一天在北图见面。先生说我在读书学习中碰到问题可以在北图查书解决。同时可以“见面谈一谈，然后找个地方吃饭”。这个约定持续了两年左右。没有特殊情况，我与先生每月初都会碰头，直到我的学位论文答辩结束。许多要读的书都是在北图借读的，例如杰伊·盖的《法兰克福学派史》，哲学所和北大图书馆都未入藏，是先生用他的个人借书证从北图借出来给我读的。

那时办理北图的个人借书证需要一定的级别。记得当时哲学所有一张北图的集体借书证，需要借阅北图馆藏时得请所里图书馆出面借，很不方便。先生有一张北图的个人借书证，可能是教授的待遇。所以每次在北图见面，我会请先生为我借我想读的书。一天先生听人说起，党的某级领导干部

可以在北图办个人借书证，而且因为首长忙，借书时不需本人出面，有联络人可以代办。先生说你可以当你父亲的联络人。我大喜，原来只知有内部购书证，现在知道还有内部借书证，于是请父亲单位开了介绍信，由我充当联络人，在北图顺利地办了一张个人借书证。当我把那个深绿色塑料皮的借书证放进口袋时，便觉山川日月一身藏了。

每月享受随先生出入北图的快乐。有时我到晚了，见先生已在阅览室伏案工作，桌上放着一摞书，桌边靠着那支黄藤手杖。先生聚精会神地翻阅抄录，偶尔会起身到目录柜去查卡片，动作轻快敏捷，那支手杖被冷落，倚在桌边，有些失意的样子。与先生轻声打个招呼，就去查阅自己的资料。各自工作到中午，还掉书，一起走出图书馆去吃饭。通常沿文津街向东，过北海大桥，绕着团城围墙走到北海南门外的仿膳小吃店用餐。我读研究生后工资涨到五十六块一月。但先生仍坚持由他付账。经我力争，先生同意轮流付账，但几乎每次他都执拗地说上次是你付了，这次该我了。结果我大约从来没付过账。

一九八一年初春，依惯例与先生在北图见面。先生说景山西街新开了一家粤菜馆，名叫大三元，今天完事后可以去尝尝。傍晚时分离开北图，沿文津街老路往景山西街。三月春浅，太液西岸新柳初黄，和风轻拂，柔条依依。北海在“文

革”中曾做了公仆们的私家园林，而今重新向民众开放，也是政府的一份恩德。上得北海大桥，天上飘起绵绵雨丝，北京春雨后特有的那股土腥味扑鼻而来。蒙蒙雨雾中，见左手琼华岛上朱墙金瓦掩映绿丛。不远处，故宫角楼黄昏独立，寂寂似有幽怨。

过三座门儿进景山西街，大三元酒家坐落在路东一个古色古香的院落内，门口国槐树下立着一个菜单的招牌，倒是前所未见。我一眼看去，菜单上多为5元至10元一道菜，觉贵得离谱。想当年我们在清河小馆喝酒，滑溜里脊、银丝肉也不过5毛钱。没想几年后竟见到十倍价格的菜。我对先生说此处忒宰人，不知京城穷书生尽是打秋风的。先生说偶一为之，尝尝粤菜也未尝不可，便非要进院。我想这次肯定又是先生付账，这么贵的菜让先生破费太多，便执意不肯。先生拗不过我，只好作罢，但心有不甘，唠叨说：“一顿饭也吃不穷人。”我挽着先生胳膊，半拉半拽地带先生出了景山西街，沿着筒子河向沙滩走。河边宽宽的人行道旁满栽丁香、迎春、榆叶梅，浅紫、亮黄、深红杂错。薄雨渐止，嫩芳新濡，淡香四弥，初暝暗染。我与先生缓行在早春的温馨里，虽迥异于一九七六年初踏雪深冬的凛冽，但先生教我爱智求真，立身以仁的宗旨却一如既往，无丝毫改变。

一路行来，我向先生讲起近来读批判哲学的心得。讲到

马尔库塞在分析后现代社会对人的控制时，借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特别是用弗氏的本我、自我、超我分层结构来讨论社会文化问题。先生便问我是否注意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说白氏的理论中也谈过自然的、人文的、宗教的三级结构。他的核心概念“内在掌控”（inter check）其实也是心理学的用法。白璧德也把人格分为“高尚自我”（higher self）和“卑下自我”（lower self）。在谈到宗教问题时，白璧德有个“原我”（ordinary self）的概念，认为原我被高尚自我所控，就产生宗教感。而弗洛伊德把宗教感归因于超我投射（projection）。虽然两个人用的术语不同，但意思却有相近处。先生仔细想想说，他不记得白璧德曾谈起过弗洛伊德，虽然他们差不多是同时代人。白氏也曾抨击镀金时代的物质主义，这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单维社会的批判有相似处，似乎是同一问题的不同阶段。

先生说白璧德在中国影响很大，吴宓先生和《学衡》同仁对白是顶礼膜拜的。要思考二十世纪前半段的社会文化思想，白璧德值得一读。先生特别讲到白氏对大学教育的看法，说白氏最反对教育有“进步”一说。他以为教育就是要“保守古典”，大学教育必须是人文的，连科学训练也不能脱离人文观照。真有趣，马尔库塞本人也有类似看法。先生说这不奇怪，自希腊以来的思想传统大抵不脱窠臼，后来的科学至

上主义是走偏了。对现代文明的反省总还是要回到古典中去找资源。

先生又讲到吴宓的往事。他与吴先生私交甚笃，称吴先生为老师，其实他们是亦师亦友。翻阅《吴宓日记》，见多处提及先生。先生曾几次撰文谈吴宓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解读吴先生诗作。先生指出吴宓的理想是“向上迎接理想，迎接至真、至善、至美”。而叹吴先生道之不行，一生蹉跎。先生总结说：“吴先生的不幸，在他个人，最后也只能把自己的浪漫主义化为他的道德理念学（moral ideology），把他的爱化为宗教精神，以安顿自己的生活。这是不幸的命运安排，但也是既悲且壮的安排，求仁得仁，有何怨尤！”

后来我才明白，先生谈吴宓，其实也是谈自己，谈他们那一辈读书人。他们浸淫于中国古典，又漫游于西方精义，从来就抱着打通两造、消泯畛域的雄心，也就是以求无分东西的普世价值为最高理想。在先生看来，是人则要用自由意志、自由选择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凡有理想高悬则必会在自由与必然、道心和人心上有冲突。不过，这种冲突的解决，恰恰要在求自由、求理想中实现。这是个神圣的任务。先生说“人类若无自由，不过是一架被动的小机器”。

先生分析吴宓何以独赏柏拉图的《裴多篇》与《理想国》，

说：“两者都是要证明纷纭世界之外还有一理想世界，这是‘一’。如果以这个‘一’或理想为基础，可以在繁杂的人世困乱中，寄托人的灵魂，在那里可以有和谐静穆，可以安身立命，也是人类最后要实现的目的。当希腊雅典已经由盛而衰而亡，群情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柏拉图的理想虽然来得太迟，无补于实际，但以后西方人民每每以此为理想，造成中世纪和近代的文明。”先生何不想实现此一理想？然一代淳儒，命运多舛，夙愿不遂，人皆凋零。但先生亦深知“求仁得仁，有何怨尤”。

谈话间已走到沙滩，在老北大红楼旁边胡同里找了个小馆，随便点些东西吃。先生在饭桌上写下几部英文书名，都是有关新人文主义的，其中有白璧德的《卢梭与浪漫主义》《法国批评大师》，说这些书北图都有，很容易借到，要细读了才知道新人文主义与批判理论究竟有何异同。大体上看，本世纪西方知识分子关注人文、艺术、道德问题的，都对工业文明有所警惕。二战之后反思现代化更是热门话题，但其中视角各不相同，都反思现代化，却有相反的结论。

走出饭馆，天已全黑，华灯初上，京城春夜的味道真迷人。听先生一席指教，有春风风人自沉醉的感觉。陪先生上8路汽车，在地安门换7路无轨，像一九七六年的冬夜一样，先生挥挥黄藤手杖就远去了。

## 七

一九八二年三四月间，我开始准备学位论文。那时我读完了国内能找到的马尔库塞的著作，对他的理论有了大致的了解。我认为他虽然是以新马克思左翼著称，但骨子里承继更多的是德国古典哲学浪漫一派的血脉。以我当时所能见的资料，尚无人这样定性马尔库塞的学说，所以我准备了一份提要，陈述我论断的理由，和先生约好，去向他请教，希望先生能判断一下我所准备的有关德国古典哲学、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的材料是否扎实。

到先生家，见他正在安一架新的咖啡机，是那种用沸水直接冲磨好的咖啡，通过纸袋过滤的新式机器。见我便兴致勃勃地说是唐君毅先生的家人托人从香港带来送给他的。先生与唐君毅先生青少年时就是至交，抗战时期曾一起和牟宗三、程兆熊编刊《理想与文化》，先生曾回忆起：“我们几位

手无寸铁的书生，想借此表示我们为民族奋斗的决心……当时大家心中都想起宋代学人张横渠在抗金战争时期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以及西方费希特在德国国难时期《对德意志国民的讲演》的故事。我们都感觉到不能都去喊抗日的宣传口号，还需在本岗位上做些踏实的哲学建设工作。”

先生对我说那时一起编杂志，常常挑灯夜战、通宵达旦，困了就喝浓咖啡。他喝咖啡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先生边说边摆弄咖啡机，一定要尝尝这新玩意煮的咖啡好不好。忙活了一阵，咖啡机终于嘶嘶地响了，片刻，淡淡的咖啡香便弥漫在屋子里，阳光正爬进窗子，三两方光影漂浮在咖啡的香气中，缓缓地游动。

先生倒好两杯咖啡，便像往常一样，坐在那只老沙发上，头向后仰，靠在沙发背上，左手在扶手上轻轻叩击。我坐在先生右侧，拿出笔记本说，上次和您谈起准备论文中的几个问题，想听听您的意见。先生微闭双目，缓声说“请讲”。我知道，每逢此时，就是先生要集中精力认真听而且长考的时候了。

我刚一说出题目，先生就笑了，说浪漫主义的题目最难讲，“它太浪漫了”。海涅有海涅的浪漫主义，白璧德有白璧



德的浪漫主义。有十篇文章可能就有十种定义，你给自己选了个最麻烦的题目。我说虽然麻烦，但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梳理各家之说能得其大意，况且不是求几何定理，要精确到一丝不苟。思想文化批判总是取其一般特征。先生点头说，这自然是对的，就看你对一般特征抓得准不准。我说像笛卡尔和卢梭，虽然都以概念、推理论思想，但区别极明确。这种大特征是抓得住的。以此看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就有话可说。

我以为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给人的审美艺术活动以突出地位。他在讨论审美艺术问题时，给自己规定了任务，要证明在美与真、艺术与自由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表明他要完成德国古典哲学和浪漫主义文学早已提出的任务。他要在康德、黑格尔、席勒奠定的坚实基础之上，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重建审美新秩序，以对抗后工业社会的“工具理性”和“现实原则”。这个秩序正是诺瓦利斯“兰花幽谷”中的秩序。他要以“自由游戏”作为无压抑文明的标志，以卸载现代文明强加在人的心理上的“多余压抑”，使心理和生理上的愉悦统一于诗的王国。他要让古希腊的神祇，爱与美的象征俄耳甫斯、那喀索斯代替后工业文明中的英雄——政治强人、商业大亨、运动明星、社会名流，使人成为独立的、审美的、有尊严的自由人，而不再是一群傻乎乎的、患有成

长延缓症的追星族。

我列举了所使用的各种材料，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家、浪漫主义文学家的著述，有关浪漫主义专题的论著，欧洲十八、十九世纪思想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史实。先生认真地听着，当我谈到“自由游戏”概念时，我引席勒《美育书简》中的话：

“在美的国度里，人们彼此只作为自由游戏的对手显身，这里唯一法则则是把自由贡献给自由。”

先生便问我，席勒的自由游戏概念出自何处，我答出自康德。先生很严肃地说，既有前因，你绝不该忽略，引征材料要尽量溯其源头，这是个方法，也是个原则。先生原则两字说得很重，让我脸红。先生随后说，我看你对康德《判断力批判》读得不细，其中第九节专论游戏概念，你要回去再看看。我忙点头。

我接着谈到马尔库塞不仅极赞赏康德以审美活动为联接知性与理性、自然与自由的枢纽，更认为这种枢纽功能意味着提高感性地位以反对理性暴力，最终要摆脱理性压抑性的统治，使人通过审美活动开拓人与社会的另一维度。

先生说这种讲法已经远离了康德。在康德那里，三大批判无高下之分，各司其职而已。三大批判的核心就是一个“人”字，以人为中心，考察人的认知能力、道德诉求、自由意志，

最终目的就是人。在这个出发点上可以说马尔库塞仍在德国思想传统中。从他的论证方法、思想资源、价值评判上看，你说他是个浪漫主义者，我想是站得住的。特别是他总谈美是自由的表现形式，这和席勒是一致的。先生说席勒的理想除了写在他的美学论文里，更多的是写在他的诗里，你要去读他的诗，毕竟席勒作诗人比他作哲学家更有地位。遵先生嘱，回去读席勒诗集，读到这样的句子：

诗引领漂泊的人

走出陌生的他乡

重寻天真单纯

重回幼时茅庐

摆脱冷酷的枷锁

在自然怀中温暖安眠

这简直就是马尔库塞的论文《审美之维》的诗意表达。真感谢先生指点迷津。

先生又问我，你认为马尔库塞这一派对现实的意义在哪

里。我答至多表示一种信念坚守罢了。我对理论改造现实的可能根本就极悲观，尤其是后现代社会的整合力，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边缘化了，绝不可能有启蒙时代的哲人那样大的号召力。先生笑了，说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就是“丧家犬”。又说读书人不为世用并不可耻，倒是读书人当了权势的帮凶才不光彩。我问先生论文题目是否可以叫《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的浪漫主义骑士》，先生说论文题目你要听导师徐崇温先生的意见，我对论文不发表意见。又问先生能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先生说只要杜老和徐先生请他，他当然参加。

回家之后我又反复思考先生的问题，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何在？这在论文中是极重要的一块。思考的结果记在笔记中是这样一段话：“建立无压抑的文明，在现存理论框架中看，确实是个幻想。马尔库塞本人颇明了这点。因而，若想走向他所指引的无压抑文明，大半不能靠脚而要靠头，或者干脆靠心。想起这点真让人悲从中来。但午夜时分，一支烛光也能为踟蹰暗夜的旅人燃起一丝希望。朝霞纵然绚丽，但那要待晓雾四散，而并非人人都能等到清晓莅临的一天。因此不管天光大开，还是烛光掩映，清醒的灵魂总守候着，只要有人守候，就总有破晓的可能。怕就怕我们都沉睡了。守候于幽夜是一种幸福，正如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一样。”后来我把它写入文章寄给先生，先生回我信说：“愿与你和朋友们共同守

候。”

一九八三年读到贺麟先生的文章《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贺先生说：“周辅成先生在一九三二年写了《康德的审美哲学》（《大陆哲学杂志》一卷六期），……周辅成先生是研究西方伦理学的，周先生曾‘惋惜中国尚不曾有介绍康德的美学的文字’，自告奋勇写了这一篇文章。周先生的介绍相当详细，全文共分两大部分，一是批判力与悟性和理性的关系，一是审美判断之批导。这是我国对康德美学思想最早较有研究水平的文章。”我才知道先生是介绍康德美学入中国的开山之人。

我问先生为何从未向我提起，也未叫我读他论康德的文章，先生淡淡地说，那是五十多年前写的东西了，不一定有价值。我坚持向先生要，他挺不情愿地从北图复印了一份给我。我仔细拜读先生的文章，虽然行文风格是五十年前的，但先生对康德美学梳理之清晰，解说之明确，总体把握之贯通，以我当时所见中文文献，尚无人能及。老一辈学人学风真淳厚。像这种开创性的工作，不过是做过便完了。能与先哲对话，能有成果惠及后人便达初衷，其余世间名利皆淡然处之。这种淡泊雍容，来自浩然之气的涵养，来自古卷青灯的陶冶，来自“大道如砥”、“德不孤，必有邻”的信念。先生已点燃烛火，又约我们同守暗夜，小子岂敢怠惰。

## 八

一九八二年六月，我要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先生应邀担任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那天先生早早就到了哲学所，我在走廊里遇见先生，觉先生今天的样子有点特别。后来才意识到先生特意着了装，显得格外整洁肃穆。我趋前问候先生，他很严肃地点了一下头，就进了现外室，答辩就在这里举行。答辩过程中先生问了我两个问题，记得有一个就是有关康德所论“无目的的目的性”。我回答得大致正确，其他先生也问了一些问题，所幸未出大错。

随后我便出去等候。再进房间，见各位答辩委员面带微笑，就放了心。杜任之先生宣布我的论文通过，我向各位先生鞠躬表示感谢。所里派车送先生回北大。见先生上车，想起七五年底在清河小营机械学校送先生上车的情景，不由百感交集。

论文答辩结束不久，我便起程去武汉，为即将在庐山召开的全国现代西方哲学讨论会打前站，办自武汉至九江的船票。上山前在九江烟水亭旁的小酒馆与周国平和苏国勋大哥喝酒，望窗外蒙蒙雨雾中兀立的点将台。相传赤壁之战前，周瑜曾在此演练水军。上庐山后，忙于会务，得暇与朋友们遍游庐山名胜，甚是快乐。一日，与魏北陵、徐友渔、国平、苏大哥，步行二十余里去访三叠泉。返回时已是暮色四合，山风渐起。向晚的天空蓝水晶般纯净，几颗早到的晚星倚着绮云，平添几痕绚丽。远山云雾缭绕，影影绰绰，几人正踏歌徐行。苏大哥突然指着远山说，那是五老峰，山下就是白鹿洞书院，明天我们会去参观。我心一动，想起南宋淳熙年间，朱子在此升坛开筵、门庭兴旺的情景，不免心往神追。

接近庐林宾馆时，天已全黑，在黑黝黝的松林中行走竟看不清路，几人相呼着在林间小径上摸索。不经意间，眼前豁然一亮，庐林湖已飞临身旁。润玉般的湖水静卧秋夜，岚气幽幽，摩挲秋水。湖畔烟雾缥缈，修竹袅立，伴微风簌簌纤歌。凉夜已深，皎月破云，寒星数点，清辉散落。几人似闯入画中，皆收足敛声，不敢搅扰这人间仙境。待回到宾馆，躺在床上，仍未从刚才的梦境中回过神来。又想起一早起来要登五老峰，游白鹿洞，不免辗转反侧，很久未能入眠。

读史知道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的“白鹿国学”是中国最

早的书院。书院者，读书、答辩、慎思、精进之处也。选一方山水清幽之地，奉一套求真悟道之理，聚一群心向大义之人，延几位德高饱学之师。行如朱子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所言：“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南宋淳熙六年，朱子任南康太守，踏勘书院旧址，以为“观其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踪著书之所”。便主持修复，招收门生，登坛讲学，白鹿洞遂成理学圣地。

我读中哲史，对朱子一直有好感，觉他论道明通，平易晓畅，绝非道学面孔。不过读先生论戴东原的著作，却见他力斥理学，极赞戴震所言“人死于法犹有怜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其实先生扬戴抑朱也有其不得已处，对朱子亦有回护。先生认戴震所反对的宋明理学“基本上是指清代的统治阶级所了解的程朱哲学”，又痛诋清际文字狱之残酷，这其中的婉转，倒要向先生好好讨教。今天在白鹿洞拜朱子，要想好回去如何向先生“交代”。

书院的大门并不煊赫，上有李梦阳题匾。据说古时门外大道边曾立有石刻“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我们的先人倒是重知识轻地位的，而今却尽入渔樵闲话了。进门便有清凉之气扑面，寻清风起处，是自后山奔流而下的一道清溪，溪边



巨木参天，阴翳匝地。溪中有巨石数块，其上有朱子手书“枕流”二字。向左拐，进一庑廊，皆石刻，中有朱子手泽，和李梦阳五言绝句。诗境清幽笃静。进朱子祠，向朱子顶礼。随后转入白鹿洞，有后人凿石鹿，殊粗糙。

四面游逛，随意观览各处楹联，大多陈词滥调，忽见明人周相所撰一联，“二李读书看白鹿，书中得几分，白鹿中得几分；三贤讲道对青山，道外无一事，青山外无一事”。觉得有趣，多看了几遍，暗记住了。进文会堂，见朱子手书“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峰泉交映，智仁独得之天”。想到底是朱子，出手就是不凡。出堂下阶，沿明溪缓行，听水声潺潺，似鸣素琴，真可一洗尘心。不知朱子名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否得自于此。跨过几块卵石，便站到“枕流”石上，想既为“枕流”，便当曲肱而卧，于是便横卧石上，仰望白云苍狗。

古希腊，柏拉图建立了雅典学园，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吕克昂学园。正是在这些学园中，希腊哲学蓬勃生长。这学园大抵便是我们古时的书院了。有趣的是，希腊哲人讲学论道也要寻个清幽怡人之处，在《斐德若》篇中，柏拉图记下了苏格拉底与斐德若的谈话，“在梧桐树的浓荫下，四肢舒展，躺在青草地上，夏日的凉风轻拂，把脚放入清泉，一阵沁人心脾的凉爽，用芳香的青草作枕，斐德若，来吧，我就躺在

这儿，你来读你的文章吧，在这仲夏的温暖中”。再看朱子对白鹿洞的喜爱，中外大哲所思所感冥冥契合，在精神的至高处，何来畛域！

书院、学园中研习之道的优越处是讲辩结合，有讲有问，有答有辩，文意互发，疑义相析，攻防之中，道理渐明。因为只有自由辩论最能激发思维的活力。想自一九八一年西安会议，结识陈嘉映、朱正琳，相约每月一次的黑山扈讨论会，一年多来确觉思路大开，学力渐长。此次庐山聚会，他们未到，让我惋惜不已。见嘉映业师熊伟先生兴致勃勃地游览白鹿洞书院，心中忽发奇想，若辅成先生亦在此地升坛讲课，该多么有趣。那时我辈友朋、学子机锋相夺，义理相搏，如君子之射，“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这个向往存我心中多年。一九八九年与正琳、嘉映、友渔、国平、阿坚、苏炜诸君筹划《精神》杂志，特设“学园”栏目，想收各家争辩于其中。可惜风云突变，这理想未能实现。一九九二年与陈力川去梵蒂冈博物馆，却见到这理想坚不可摧地存于拉斐尔的《雅典学园》中。大师随心所欲地把他尊崇的哲人，不分门派，不论年代，一网打尽在他的巨作中。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联袂而下，宽袍飘飘，如天神下奥林庇斯山。再看学园中群贤毕至：放浪形骸的第欧根尼，思考流变的赫拉克利特，定“在”为“一”的巴门尼德，万“有”

归“数”的毕达哥拉斯，色诺芬、普罗提诺、伊壁鸠鲁……最后大师自己也侧身其中，聆听论辩。在拉斐尔心目中，人类的精神生活尽在雅典学园中了。

学园、书院，思想者的家园。

下山回京，庐山带给我的激动尚未平静，急匆匆去看先生，要给他讲的故事正多。自一九八〇年起，先生开始主持新成立的北大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先生毕生致力于伦理学，但在几十年里，有谁听良心细弱的呼声？现在伦理学能登堂入室，先生很高兴，也极关心国内学界的各种动向，我向他介绍了会议的情况，记得还带了几份会议论文、简报给他。

在和他聊起白鹿洞书院时，我说先生虽不喜欢程、朱，但白鹿洞书院实在是个好地方。先生马上严肃起来，说朱熹是真儒，儒家的好东西，朱熹挖掘光大了许多。南宋时外敌威胁，讲儒学的人都能体会得到。讲理学也是讲心灵的力量。王守仁的心学是继承这点的。我说戴东原批理学，先生是赞成的。先生大笑起来，说，你说的是我那本论戴震的小书吧。他的思想我确实很喜欢。我在清华读书时，就听说王国维可惜戴的哲学思想不受重视。其实那时我就很注意他。这本小书是我五六年写的，那时候让我们学艾思奇的哲学，分唯心、唯物两条阵线。戴东原的哲学是朴素唯物论，所以就写了他。

那种书容易写。

先生又说，戴东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永远替老百姓说话，其实我在书里还是发了一点牢骚的。我说清代文字狱之残酷史无前例，想的就是几年来各种批判就没停过。满人入关后对汉人中的读书人很警惕，像吕留良，死了还要掘墓剖棺，后人、学生都不放过。过后再细读先生的书，果然能见出先生运笔立论处处用心良苦。先生说：“戴震生当文字狱最厉害的时期，他反抗现实的文字是表现得很曲折婉转的。虽然如此，但我们一读其文章，立刻就可以感到他对当时统治者有极沉痛的愤慨，比如他说‘在位者行暴虐而竞强用力，则民巧为避而回遁矣。在位者肆其贪，不异寇取，则民愁苦而动摇不定矣。乱之本，鲜不成于上，然后民受转移于下，莫之或觉也’。”

先生以为，这是戴震思想的中心，归乱源于统治者，而人民是受害者，这表明了戴震的人民立场。其实这是先生观察社会、评判是非的一贯角度。在平民与权势、卵与石之间，先生总是站在平民一边，站在卵一边。

话头一撂，我便把在白鹿洞记下的那副对子念给先生听，想请先生参详。先生说，朱熹讲道心人心两不分，天地人心两不分，陆九渊讲“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到王阳明那里，

更是心物一体。这副对子是明人所撰，看来是心学之徒。不过里面已经有些禅的味道。王阳明的心学本来就得益于佛学，我看这上联是说悟道不只在读书，青山白鹿都有道心。下联是说心中之道与身外青山本为一事。朱熹有个重要的思想，理在物与在身是一回事，这就是理一分殊，格物致知的最高境界就是达于至理。

这副对子写得不错，我觉先生解的也好，便记了下来。先生自嘲说，今生未去过白鹿洞书院，枉为读书人，又提起王阳明曾亲往白鹿洞格物致知。问现在可有王阳明的遗迹，我答似未见，只是书院大门上的匾额是李梦阳所题，他和王阳明是同时代的人。先生便说，明前七子是要搞“文艺复兴”的，文必秦汉，诗宗盛唐，一时左右文坛。我把记下的李梦阳的五言绝句呈先生看，诗云：“登山眺四极，一坐日每夕。行看夜来径，苔上有鹿迹。”先生看了片刻，便起身走到书架旁，翻检出一叠复印材料，说歌德有首诗和这意境有点相似。随即便翻到一页递给我，是《游行者之夜歌》，宗白华先生译的：

一切山峰上

是寂静

一切树杪中

感不到

些微的风

森林中众鸟无音

等着罢你不久

也将得着安宁

这诗我曾读过梁宗岱先生的译文，他译作《流浪者之夜歌》，两公译文各有其妙。梁先生在诗后加有一注：“一八三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歌德快八十二岁了，距他逝世日期仅数月，他一鼓作气直登伊门脑旧游处，重见他三十八年前写下的诗句，不禁潸然泪下，反复沉吟道：‘等着吧，俄顷你也要安静’。”经先生提醒，再对读两诗，发现果有意境相通之处：皆是独登峰巅，寂静寥落，鸟声无闻，鹿影不现。惟歌德诗苍凉沉郁，梦阳诗空灵清缈，物色仿佛，而心境相异。

看先生授我的这叠复印件，是一部叫《歌德之认识》的书，它是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所编。翻看目录，作者、译者皆为一时之选。有冰心女士的诗，宗白华先生的《歌德之人生启示》，贺麟先生的《歌德处国难时之态度》，辅成先生的

《歌德对于哲学的见解》，唐君毅先生的《孔子与歌德》……顿觉眼前云蒸霞蔚。看先生撰写的前言说：“今年国难期中，临歌德逝世百年纪念日到来，国人们对此纪念是如何地热闹，证明我国人在物质困苦里还没有失却对精神价值的欣慕。”

我真不敢相信这部书竟完成于外敌入侵、国脉危急之时，这要何等的毅力和定力。我问先生，战乱之中您还想起要编这样一部书，而且能印出发行？先生正色答道，好不容易啊！当时巴金在上海问了多家书店，都不肯印，是宗白华先生送到南京朋友处才得印行。那会儿人心惶惶，谁会在意歌德，我们几个青年人却觉得越在危机时才越要向歌德致敬。那时知道日本人也纪念歌德，我们便想表现一下中国人的能力。我给文化界的朋友、师长写信，几乎所有人都回信支持，好热烈。先生用四川话讲出“好热烈”时，刚才低回的感叹顿成昂扬的自豪。

看先生皓首低垂，热切翻书的样子，我暗问自己，可曾有先生这种对精神价值坚韧不倦的“欣慕”。

在庐山时就想向先生请教书院和读哲学的关系，我拿白鹿洞书院和宋明理学说事儿，和先生开玩笑说，大学的哲学系应该统统取消，改成书院、学园。想读哲学的人去投奔各处书院，各位先生自筑杏坛，哲学自会精进，再有个诸子百

家时代也未可知。先生笑答，国家不给书院出来的学生发文凭，他们靠什么吃饭？柏拉图办雅典学园时，伊苏克拉底就嘲笑他，教出一群只会抽象推理的呆子，是只知爱智慧却不懂实行的空论家。他自己办学校收费很贵，却保证学生能学到实用本领，将来好混世界。柏拉图绝看不起他的一套，骂他唯利是图，说他教的修辞、辩术那一套不过雕虫小技。

我回先生说，朱子倒和柏拉图相通，“非徒务记览，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是白鹿洞学规。朱子要他的学生以讲明义理为求学目的。先生说其实务实入世与求纯知的界限并不绝对，柏拉图的学园也要教人做政治家，教人治国之道，还要当“哲学王”呢！顾宪成、高攀龙立东林书院，除了孔孟曾颜之外就是尊崇白鹿洞学规。他们本来就是要继承朱子学脉的，对王阳明都有不满，以为他的心学走偏了。从学理上讲，他们的志向就是保持儒学正统。东林党的主要人物，像杨涟、左光斗、黄尊素，都是信理学的大儒，一旦入世，就把自己的儒家信念、道德操守带到行动中。和魏忠贤斗，是性命相拼啊。杨涟被锦衣卫折磨得体无完肤，最后是铁钉贯脑而死。左光斗被拷打得几无完形，也不低头。真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

先生说，这些理学信徒们平日谈经论道，似与平民百姓无甚关系，想不到他们一旦挺身抗恶，百姓竟以死相助。苏



州数万市民上街，对抗来抓捕东林党人的锦衣卫，真是正气鼓荡。孔子讲“礼失求诸野”，我看这就是了。后人修五人墓，张溥作《五人墓碑记》，就是把中华民族的真精神留下来。我看这也就是儒家的真精神啊。“文革”中“破四旧”把五人墓砸烂了，那是断自己民族的血脉啊。

先生讲至此，摇头痛惜，眼中似有泪光。我竟一时没有追上先生的思路。以前胡乱读史，对魏阉暴虐，厂卫横行的史实不过一带而过，并未深思。苏州市民义愤群集、痛殴厂卫，而后又有周文元等五义士“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对此我当然是极为崇仰，但从未以先生所谈之真儒精神来思考。张溥曾问：“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先生竟以为这就是“礼失求诸野”的明证。先生心中的礼，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之真儒之礼，是由“守死善道”而出的一套行为规则。

以此观之，苏州市民皆守礼之民，苏州之地为礼仪之邦。而“文革”之中，砸五人墓，辱先烈遗骨，当此时，华夏已为鬼域，子民皆成暴徒，此中华命脉危殆之象。

听先生情绪激昂地大谈东林党，我从白鹿洞带回的道外

青山的闲逸，一下子被淹没了。我突然意识到白鹿洞书院绝非仅是鸣泉素琴、朗月清风的世外桃源，先人讲纯思至理，也包含着坐言起行。华夏儒生并非皆是追名逐利、献媚邀宠之徒，舍生取义本是题中之义。讲道也意味着护道、殉道。不参透两方，谈何了解儒学？自己的感觉太过轻浮，还要沉下心来，重读古典，深入思考才是正途。

向先生谈了我的感想，先生教我说，中国哲学中，理学的情况比较复杂，入清之后，批它的人很多，有一个原因是清朝大捧理学，又兴文字狱，让一些读书人心怀不满，借批理学来发泄。所以读朱熹要读点明史，特别是晚明史。晚明多次禁书院，但禁不住，这里就有朱子思想的力量在。先生叫我先读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朱长祚的《玉镜新谭》。说如果再有时间，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要细读的。黄宗羲是东林子弟，他父亲黄尊素的死让他思考了许多问题，多有真知灼见。

和先生分手时，他意味深长地说，在一九七六年之前，“谈明史是很危险的”。

## 九

一九八二年底，先生搬回朗润园了。这次占据朗润园半壁江山的人搬走了，先生终于收复失土，所以特别高兴。这两三年，先生全力以赴，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这又是一桩奠基性的工作。以往谈西方伦理学，多是跟着阶级斗争的路子走，常常材料不明却上纲上线，宏论大发，结果是无根游说充斥。先生想抓住机会，提供一些真实材料，让谈西方伦理学的人有所依凭。先生说这也算是正本清源吧。前些年曾从先生处借阅过他编的上卷。那是因为先生教我读莎士比亚时，要我注意莎翁对英国伦理学家的影响，特别是沙甫兹伯利和赫起逊。当时先生就说这部书的下卷已准备多年，不知何时能编出以成完璧。

从先生写的编者前言中知道，上编编成之日是一九五四年，正是我出生的那年，而第一版印出时已在十年之后了。编这种名著选是吃力不讨“巧”的工作。虽说有范本在前，但要厘定标准、规依体例、剪裁文章、推定译名、校改讹误，都是细碎繁琐之务。仅以我读过的上卷而言，八百多页一大

厚册，自古希腊至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涉及重要思想家近五十人，著作六十余种。编者下的是笨功夫，对后学却是功德无量。

一九八三年七月酷暑，几天前和先生约好去看他，顺便还几个月前借走的《新旧约全书》。那时《圣经》不好找，先生说读国学要通“六经”，读西学要读《圣经》，授我他常用的那册旧和合本，包着白色道林纸皮，已被先生翻阅得起了毛边。我知这是先生常在手边浏览的书，便抓紧时间粗粗读了一遍，想着赶紧还先生。

约好下午两点半到先生家。但偏巧头天晚上在黑山扈嘉映那里聚会，与友渔、正琳、苏大哥几人聊得高兴，一夜未睡，沿着京密引水渠散步，在月影星光下“喳”歌儿，从贵州小调一路唱到贝多芬《自然神的赞美》。天亮后仍不愿散，接着聊，一直到中午。那时年轻，“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心中满是激情，眼中全无人物，寂静中偶有一曲飞起，不知是何，已然泪流满面。真是一个纯思、唯美、真爱的年代。当时嘉映已决定赴美读书，我调侃他不能免俗，他只是狡猾地笑着，顾左右而言他。中午和嘉映分手，便去朗润园赴先生的约。

从黑山扈骑车到北大，不过二十几分钟。到了北大看时

间还早，怕打搅先生午休，便在未名湖畔拣个树荫坐下读书等候。

谁知一夜兴奋，加上天热蝉噪，竟在湖畔的轻风中睡着了，猛醒过来已是下午三点。天啊，迟到了，起身便往先生家跑。待拐弯离了湖边，却迎面碰上了先生。他老人家正匆匆下小石桥，向东校门方向走。下午三点，骄阳似火，先生走得急，身上宽大的短袖老头衫几乎被汗水浸透，贴在身上，额头上满是汗珠，从白发间淌落。我上前拦住先生，问他为何当此酷暑仍下楼。

先生见我似大松一口气，说已经三点了，见你仍未来，想前几天有学生与校外孩子冲突，学校发通知，加紧门卫，不得让闲散人员随意入校。所以想你被拦在校外了，便下来看看。我真是羞愧难言，不过是自己睡着迟到，却害先生烈日下奔走。先生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万一中暑，我罪莫大焉。急忙扶先生回家，先生却若无其事的样子，反对我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陪先生到家，屋里甚凉爽，一架电扇轻轻送着凉风。师娘埋怨先生，对他说不会进不来的，他不听，非要去看看。我忙给师娘赔罪，都是我的不是，下回不敢了。

进先生书房，见书桌上整整齐齐摆着一摞复印件，上面

有先生手写的几页稿纸。问先生，先生答是《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已全部完成送商务印书馆了，这是副本。我极为先生高兴，这件工作从一九五四年上卷编迄，至今已经快三十年了，终成完璧，是学界大幸，亦是后学大幸。

先生神情愉悦轻松，说放下这副担子，可以优游岁月了，又说今天我还有“新式武器”给你看。见先生那张老书桌左侧靠墙处新放了一个架子，上面摆着一架双卡磁带录音机，是当时国内颇走红的一个型号“夏普 575”，左右声道各有一大一小两个喇叭，放在先生桌上显得挺气派。先生告我这是 stereo，又说旁人告他这是市面上最高级的机器，边说边向我演示只要同时按下 record 和 play 键，就可以转录磁带，有人在旁边说话也不怕，没有干扰的。一听先生说就知道老人家不明白麦克录音和内置线路录音的区别。在音响器材方面，我自信比先生所知略多，便给先生解释录制磁带的基本方法。先生也不理会，只是得意有了他的“新式武器”可以借磁带来自己复制。

和先生处久了，便愈觉老人家无论腹笥多么宽广，修养多么丰厚，都会时时“倒空”自己，他永远敞开着，不带任何成见地听取意见，汲取知识。这在先生那里是自然而然，毫无刻意的。在先生意识里，没有“功成名就”这类玩意儿，求知之于先生，如呼吸之于生命。先生很早就知道我对古典

音乐很用心，说他也极喜欢听，“文革”前有重要的演出他都会到场，还回忆起曾有一段当局和知识分子的蜜月期，那时有节目，学校会派车送老先生们去。不过自打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就难再有这种“恩泽”了。“文革”之后，古典音乐被划归封资修黑货，都扫地出门了。和先生谈起音乐演奏的各种版本问题，先生大感兴趣。说以往听音乐只关心曲目，没注意过演奏中的不同诠释，要我给他找些范例。“有事，弟子服其劳”，先生的这个要求正是我可以效力的地方。因为那会儿，我正跟着郭建英兄满北京“跑片子”呢。

建英有个作曲家朋友，供职于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该厂音响资料室有“外汇指标”，可以从图书进出口公司购外国音乐资料。可惜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不熟悉国外音乐资料，对该购何种曲目、哪个演奏版本心中无数。这位朋友就请建英帮忙选购。这对我们不啻发现一座金矿。建英提出帮忙的条件，买了新唱片让我们先录一道。用他的话说，叫“先开槽”。通过这个途径，我们转录了许多第一流的演奏。我给先生复制了一些精选的曲目和演奏。有时就把建英复制好了的磁带直接送先生复制。每次拿了磁带去，先生总要立刻复制，又不肯使用快速复制程序，说会破坏音质。所以送两盒 90 分钟的磁带，就会在先生家盘桓几小时，边听边聊，听先生谈天说地，真是快乐。

一次建英告我，他手里有一版极好的《法斯塔夫》，是卡拉扬指挥，Gobbi 和 Schwarzkopf 领衔演出。我知先生喜欢这个戏，便告先生我们的“虏获”，先生说他也要一份。不记得因为什么原因耽搁，我一直没空去北大，先生竟来电话催问，想听这个版本的急切心情像个年轻人，俨然已经成了我们发烧友队伍中的一员。建英当时正在北大读研究生，我便请他上学时给先生送带子去。

建英去先生家送了带子，还和先生聊了许久，回来告我周先生真有意思，说无标题音乐总听不大亲切，喜欢听歌剧，因为有词，听得明白。我们喜爱先生的天真谦逊。建英说当然不是先生听不懂，是先生自谦啊。其实先生爱音乐是有所本的。一次和先生聊起音乐在希腊的地位，先生说苏格拉底都梦想当音乐家呢。先生是在讲《斐多篇》中苏格拉底所说他多次梦见自己应当去从事音乐活动，制作和演奏音乐。甚至当他以为他所从事的哲学就是最伟大的音乐时，又被那些梦所困扰，最后竟认定自己应该去从事通常意义上的音乐。他甚至用竖琴与和声的关系来讨论灵魂不朽的问题。在先生看来，哲学和音乐在其根本处是相通的，一个读哲学的人是不能不听音乐的。

过了一段时间再去先生那里，见书桌正面也摆上了架子，放满了录制的磁带，大约有两三百盒。除了我和建英为他录



制的，他自己也搜集了不少。先生最感兴趣的仍是歌剧，尤其是以莎翁戏剧为底本的歌剧，逢此必收，版本颇全。威尔第谱写的《奥赛罗》《法斯塔夫》《麦克白》都有二三个版本。但直到我把玛丽亚·卡拉斯演唱的《奥赛罗》《麦克白》送到先生手上，他才真满足了。当时我甚至对先生说，能唱出莎翁悲剧感的唯卡拉斯一人而已。先生将信将疑。我手里有一版 EMI 公司出品的卡拉斯演唱威尔第悲剧唱段全集，建英对此评价极高，我便为先生翻制了一套。先生听后感叹说，卡拉斯就是当代的塔尔玛啊！

在莎士比亚的传奇剧中，先生最爱《暴风雨》。在先生的文章《莎士比亚的人格》中，极推崇普罗斯彼罗深厚的宽容精神。以为自此，莎翁的人生哲学原理、行为的最高规范便是“直接诉诸于人”。但对贝多芬受此剧影响谱写的《d 小调钢琴奏鸣曲》（op 31 N° 2）却觉听不出门道。先生自己分析说，许是对《暴风雨》一剧读得太熟，心里装了太多的定见，不自觉地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找，反而迷茫了。我便谈了自己的感想以就教于先生，说贝多芬在作品中表达的是他读《暴风雨》的感受和思考，用音乐这种极具体又极抽象的形式表现出来，不太可能有具体的对应，例如哪个乐句表现了沉船，哪个乐句表现了爱情、复仇、宽恕。先生回应说，听音乐也要心无定见，才好体会。其实，贝多芬在一八〇二年写下的

《海利根镇遗书》中已经提到，他盼望在他死后，能与世界宽恕和解，与此同时，他创作了被称作《暴风雨》的 d 小调奏鸣曲。他对申德勒说，要理解这部作品，“去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这绝不是巧合，先生从《暴风雨》中读出的“出自深心之中的诚恳之念”——宽恕和解之道，必敲击过贝多芬的心弦。

在先生看来，莎翁在他的《暴风雨》中告诫我们：“凡是一个人都与我们同样，即使他犯了错误，只要有醒悟，我们都有义务来回报自己的充分宽容……他已从对自然的幻想与对人的过分要求转变为对人类缺点的哀怜。”我以为这正是贝多芬在 d 小调奏鸣曲中所要宣示给人们的。先生自然是懂贝多芬的。智慧与仁慈的心灵在彼此呼应着。

一次和先生谈歌剧，先生说威尔第谱写的莎士比亚最得其精髓，因为他也是个农民，是从乡下进城的，他从龙科莱村去米兰，莎士比亚从斯特拉特福去伦敦。起初我不太明白先生的意思，后来反复读先生论莎翁，才明白为何卡莱尔会说，“我们宁肯交出一百万个我们国家培养的英国人，也不愿意交出这个斯特拉特福的农民”。先生以为，莎翁的人格来源，“第一他是平民，因此能对人的各方面的生活都体验过，都了解。第二，他是真实的平民，故不为世俗的矫揉造作的生活所欺所蔽。虽为女王嘉许，虽结识贵族甚多，但毫不受

其影响，能够独自超越。第三，他是自得的平民，故虽受苦，但不绝望，不激愤，依然冷静”。

先生拈出“平民性”来标定莎翁的人格基础，因为先生一贯以为，平民性是普遍人性的基础，正是在这一点上，先生认定威尔第和莎士比亚在人性上是相通的。事实上，威尔第这个龙科莱村的农民，这个常独坐农舍、眺望荒野的天才，心中最尊崇莎士比亚，称莎翁为他的“教皇”。他不仅为莎翁戏剧谱写了《奥赛罗》《麦克白》《法斯塔夫》，心中还酝酿着《哈姆雷特》《暴风雨》《李尔王》……他的《弄臣》实际上是对未能谱写《李尔王》的一个伟大的补偿。

先生爱莎士比亚，把他当做知心朋友，甚而“总觉他是一位亲人，一个慈母，他不像父亲那般责我们的过失，却像母亲一样为我们的缺点原谅，还要亲切地问一声‘你这样怕过得不舒服罢’”。

在先生面临人生低谷，想高蹈海外时，莎翁的人格抚慰了先生苦闷的心灵。先生看这个人格平易、深厚、丰饶，如同四季时序的幻化多姿。“春时，在他的人格召应下，有如人在树荫下，一望四野碧绿的田畴，你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梦幻，产生自然爱，充满人间生活的喜悦，配以热情，加以幽默，如此整个宇宙都像在欢迎你。”“夏日，天空晴朗，偶见

薄薄浮云，远远传来断续的蛙鸣，不禁使我们心弦颤动。夜间明月下，再来一线萤火奔流，我们便不免梦幻人生。”“秋天来了，就像我们出了峡口，任我们的生命如何奔放的人，到此也要稳打桨，慢慢摇了。”“冬天的雪，风一来，人类的什么情感、欲望都显得收缩了。生活没有昔日的活跃，差不多凝固起来，真像一个冰房。”与四时交替相伴，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在世界大舞台上各逞其能。初春的凡伦丁、盛夏的法斯塔夫、霜秋的哈姆雷特。最后，在冬日的宁静中，斐迪南向米兰达唱出了热烈而凄婉的尾歌：“只要在这牢房中能见到这女郎，地球的每个角落让自由的人去受用吧。这囚室已让我觉得很宽广。”

在先生看来，莎翁对笔下的众生，只让其上台亮相，谢幕下场，任其喜怒哀乐，生死浮沉，却不道德评判。但是他从人性的深度去了解人，剖析人，却是一无形的“最深刻的道德批评”。先生治伦理学，是把莎翁笔下的人物性格、道德行为、善恶分野当做了研究标本。如歌德所言：“莎士比亚已把全部人性的各种倾向，无论在高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描写得竭尽无余了。”先生则认为：“随着莎士比亚当学生走了一生。及到书本一丢，我们该说，我们了解了人。”

记得我受教于先生之初，先生就教我读莎士比亚。先生要循着莎翁笔下的人物的踪迹，直探人性幽深的秘府。后来

先生授我他的《自述》，先生说：“这时候，我在学哭，也在学笑。但哭笑都学得不好。我羡慕莎士比亚对法斯塔夫的笑，羡慕达·芬奇所画《蒙娜丽莎》的超善恶的笑。同时也向往托尔斯泰听完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和读完法国拉波埃西的《自愿奴役论》后的哭。但我要学他的，怎么也学不到。不过我仍要哭笑。”这是先生剖心析骨之言啊！



一九八三年十月，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讲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思想理论界极为敏感，一闻风吹草动，立刻寻找此次谁是挨整对象，或扑过去咬几口，或避之唯恐不及。没想到这次锋芒所向竟是个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异化”。“异化”的背后是人道主义，而挨批的对象竟然是前“文化沙皇”周扬。批判他的人说精神污染是个现实政治问题，周扬关于异化问题的观点可以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政

治纲领。周扬很左，“文革”中坐了八年大狱，有点良心发现，想讲点人道，又不敢真讲普世人道，所以找到老祖宗年轻时用过的词来说事儿。天良未泯的周扬一怒之下再不说话，生气成脑软化去世。

一九八四年春节，我去给先生拜年，闲聊中说起理论界的动态。先生对人道主义理论的前景极关注。问社科院是不是要组织批判人道主义，他有点担心“文革”余孽卷土重来。临走时，先生给我一本书《马克思与人》，我说这可是当红的题目。先生说里面的文章是他前几年写的，也谈到异化问题。

回家后翻看，才读到先生写于一九八二年的《论人和人的解放》。读先生此文，感觉有点怪，他肯定通过异化问题研究人道主义、人性论是个“令人发生兴趣的学术趋向”，这是因为，“自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现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有人据此认为，人性异化的问题，即要求人的复归或人性的复归就是人性化。人性论比阶级论更根本”。先生以为，从阶级论回到人性论，最终还是要追求个人的尊严、自由、幸福。

对此先生并无异议。但先生又认为，人性的复归，“指一切有劳动力的劳动者（或生产者）的本来状态要复归。这是一种阶级论或阶级解放论的理论形式，最终是劳动人民的阶

级解放”。据此，先生说：“就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论，只怕阶级论有时就比人性论更重要。”

对先生的这个结论，我有不同的看法。在马克思的《手稿》中，阶级的解放是一切人的解放的手段。马克思是从普遍人性出发，经由阶级消亡而达于普遍人性的实现。在理论上，马克思《手稿》中的论述是自洽的。阶级论不过是人性论大议题中的一个论题，从而人性论是更具根本性的命题。而当阶级论被夸大到绝对时，必然引发对人权和人性的肆意践踏。这是极权主义者进行权力斗争的看家功夫。

我给先生打了电话，明确告诉先生我不同意他的结论，希望能有时间向先生面呈我的看法。先生听后很高兴，说这个问题他自己也觉得没想透。他只是担心普遍人性会淹没具体的社会阶层的利益，法国大革命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况。用现在的话说，先生关注的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先生的苦心我是明白的，先生在文章中也指明，它的立足点在于：“我们应该参加劳动人民的队伍，为‘大老粗’、‘土包子’讲几句公道话。”

很快，我就去先生家向先生陈述了我的看法。先生仔细听了，说劳动人民在争取自己的自由和利益时，普遍人性论就要让位于阶级论。在这种情况下，阶级论比人性论更重要。

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宣言是讲普遍人性的，但大革命中看到  
的是各阶级代表在争自己的利益。我说那也要对结论严格限制。  
先生说，他在文章中讲到法国大革命的史实也可算是一种限制。  
我强调阶级论的危险性，先生说他知道阶级论在共产主义国家中  
常被用作清除异己的工具，但阶级论本身是来自历史事实，不能  
忽略。

我显然不能完全说服先生，便举出周扬的遭遇为例，以证明  
人性论如何成为阶级论的殉葬品。先生听后果，长叹一声说，  
现在形势不好，连周扬都自身难保。六十年代先生曾为了伦理学  
的设置问题和周见过面，那时他颐指气使，神气得很。“文革”  
中他吃了大苦头，看来是有所觉悟，想从阶级论返回人性论了。  
见先生谈及此，我便不再争辩。

一九八五年前后，先生曾要我读《尼克马可伦理学》。先生  
多次讲，读哲学一定要考虑伦理学问题，道德哲学是极要紧的。  
我以往读亚里士多德多注重形而上学和政治学的问题，先生认为  
是极大的缺失。其实先生很早就提醒过我，说《尼克马可伦理学》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后世治伦理学的人所讨论的各种问题，  
在这书中都有论述。

但我读研究生时忙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梳理，竟一直未得  
空读亚里士多德，毕业之后才重回古典。读《尼克马可



伦理学》我用的是勒布古典本。不懂处问先生，他对该书极熟悉，谈起来如数家珍，问他问题，总是随口解答，还常常告我某卷某节也谈到相关问题，可参阅。我在所里资料室查到先生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长文，细细读了，收益颇多。但向他谈及，他却说这文章受当时大气候影响，谈阶级论过甚，叫我还是直接从原文领悟为好。

二〇〇七年初，去国十七年后回京看望先生。在炒豆胡同老宅整理残简，竟然翻出一页与先生的对话记录，纸已发黄变脆，似乎一捏就碎，重读这几行文字，回想往昔与先生对坐，听先生解惑的情景，啊，那醉人的、一去不复返的时光！这页残简中记着如下对话：

问：求善难道没有现世意义吗？

答：亚氏以为幸福即是善的尘世报答。

问：但又何谓幸福呢？它难道不是一种心理感觉吗？

答：幸福当然是一种心理感觉，但是一种有伦理意义的心理感觉。

问：既然是心理感觉，那就无统一标准，而善在伦理学中是有特指的，此两者如何交汇？

答：那就需要确定幸福的含义，幸福的层次。幸福的含义：一，心理上的愉悦、快乐；二，崇高感；三，美感。亚氏（定义的幸福）的层次：一，动物性、植物，是基础；二，理性独为人类的特性，无理性即无道德。

问：柏拉图的范型伦理，善的范型难道不是普适的善的理想标准吗？不是暗含抽象于尘世的诸种行为的普遍范型吗？

.....

问答中断以后，是我手记的几段话，大约是先生后来所述：

“为一无道之邦‘自豪’是为大恶，因为自豪必是德行。自豪之人必备完美德行。”

“最高幸福不是道德状态，而是智慧的工作。直觉是最高机能，所觉皆崇高事物，故此得之乐为真乐。”

我的记录太简略，有些句子由何而来似应有上下文才好理解，但当时每次对话都令我茅塞顿开。

一九八四年，先生自全国伦理学学会中退了下来，少了

些虚头八脑的名义，也避开了那群“马列主义老头老太太”，我为先生高兴。先生这种尊贵之人，与那些乌七八糟的委琐之辈周旋委蛇，我想起都觉心痛。

先生退下来之后，更常召我去家里，或谈音乐，或聊形势，或论思想，或讲掌故。先生想谈的事极多，开口就停不下来。

当时甘阳已经开始筹划《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我见他挑的那些书好，便愿意助他一臂，上手帮他打点编委会杂务。为编委会的事常去北大，每去必拜先生。先生对编委会的事情极关注，给以高度评价。甘阳曾想在编委会之上设一个学术顾问委员会，请一些老先生为编委会的学术方向提提建议，名单上就有先生的大名。此事商议过几次，甘阳却终未下决心实行。

一九八七年，周先生“退休”了。据知情者说，先生退休是受了学生的牵连。这个学生是先生改革开放后招收的研究生，人极有才智，曾参加海淀区人民代表的竞选。他当选后，先生曾特地打电话告我消息。这个学生毕业后在北京找不着工作，先生欣赏他的才学，不辞辛苦，四处求人，为他联系工作，倘因此牵连到先生也不足为奇。但先生却从来未道一字。

我想先生这样做恰是为了实践他一贯的行为准则。先生读亚里士多德便遵亚氏的主张“我们探讨德行是什么，不是为了求知识，而是要求成为善人，否则探讨的努力就全无意义”。在希腊哲人那里，政治权利来自公民个人内心的正义要求。依照班达的经典论述，真正的智者不会从统治者的角度讨论政治。他们所支持和维护的真理与正义的标准，常常是在现世被视为无效、无益、无利可图的。在班达所举以为例的人物中，苏格拉底、斯宾诺莎、伏尔泰、勒南都堪称智者。萨义德的定义更简洁明快，智者就是那些不被政府和权势集团收编的人，他们言说那些常常被遗忘和抛弃的命题。

不过在先生这一代人中，凡器识高越者鲜有不受儒家士道熏陶的。正如黄山谷所说“士生于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余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

那一段时间，先生确实有些郁闷，常读放翁诗消遣。书桌上放着一部《剑南诗稿》，还常常集放翁句，约有十几首。我去家里，他便拿给我看，多是愤懑伤时、悲凉沉郁之作。我怕先生郁闷伤身，便劝他多读陶、苏，可以任性散心，怡情养年。

但先生笑笑说，其实陶、苏也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记

得先生曾说过，放翁是一奇人，既有“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雄阔，又有“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的恬淡。古人的心性真是伟大卓绝。最难忘先生曾手书陆游诗一页授我，中有一联“独吟古调遣谁听？聊与梅花分夜永”。回家后反复吟咏，能听到先生孤寂凄迷的心声。

一九八九年六月再见先生时已近月末。天气闷热，令人窒息。谈及往后的日子，先生第一次问我为什么不出国。他知道我可以到国外去，便劝我先出去一段看看，反正国内待着也做不了事情。先生讲了许多精彩的话，便习惯性地记起了笔记，像往日听先生讲课。回家后看记录，突然心里有个念头，何不做一些现场访谈，把社会各阶层的看法如实记载下来，算是给将来留一份资料。当时还未听说过有“口述历史”这回事，但自己是实实在在干了一回“口述历史”。我找的访谈对象上至政府高官，下至贩夫走卒，政治上左、中、右都有，应该算是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一份完整资料。

先生在访谈中说：“四十年了，中国读书人吃尽苦头，前三十年是唾面自干，自我羞辱。后十年开始想做出点人样子来，给斯文挣回面子。我活不了几年了，再不能任人家拎着脖子耍来耍去了。”

“我读了一辈子康德的伦理学，精义是什么？是‘批判

精神’，其实批判精神只是康德哲学的工具，康德哲学的中心是‘人是目的’。评判一个国家、政府好不好，就要看它是否把人当做目的。凡讲基本人权，讲人性的政府，即使有点错误，也可以挽救，而凡是无视人权，挑动人的仇恨，残害人的精神活动的政府，即使它做了一两件留名历史的大事，也仍然是坏政府。”

“我读书做学问几十年来，心中常存一点疑问：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批判人道主义。一九六二年，学术界批人道主义，我还出来说话。我说，人道主义是反神道的，有进步意义。一个政府讲人道主义，可以提高它的国际地位。而且，人道主义同中国传统也不矛盾。孔夫子一部《论语》，其中仅‘仁’一字而已。”

“四十年前，共产党掌权，当时我在武大任教。看到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热情，心想中国可能得救了。五十年代诚心诚意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把自己多年的学术成果骂得一钱不值。‘文革’十年住‘牛棚’，反而心平气和。改革十年可谓大梦初醒，觉四十年前我并无大错。想想这些，真有一种解放的感觉。”

二十年过去，如今翻看这些当年记下的文字，先生谈话的音貌宛若眼前。那样一位忠厚长者，为胸中正气所激，发

此金石之鸣，恰如韩昌黎所言“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音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为声音，其皆有弗平者乎！”

访谈之后，先生痛定思痛，撰文《怕火炼必非真金》。先生在文中悲叹道：“人民！人民！天下不知有多少罪恶，是假借你的名字以行！”

我也心烦，有了避秦的想法，决定出国待一阵儿，图个耳根清静。把决定告诉先生，先生沉默片刻，说好。十一月开始打点行装，起程前去与先生告别。先生说一定要去机场送我。又说本该吃顿饭，把酒送别的，但心情不好，谁知此一别是否永别。我不要先生说不吉利的话，告先生我去去就回，请先生善自珍重。先生只是摇头不语。

起程那天，天酷寒，先生仍赶到机场，对我不多叮嘱，只说出去好好看看，多想想，能读书千万别放弃。临登机前与先生拥别，先生紧握我手，双目紧闭，我觉出先生心中不舍。我在，至少还有个人可以常聊聊天。小子一去，怕先生心中寂寞更深。但知先生善涵养浩气，过了这个时候当会波澜自阔。谁知真世事难料，与先生一别，再见竟是近六年之后了。

## 十一

一九八九年底去国之后，难免要考虑在国外安身立命之道。心中所念也大多是政治问题。有一年多的时间，所读之书竟全涉及英美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没有什么超越的思想向先生汇报。

那时家事国事天下事纠缠一身，心情颇劣，整天恍惚在《未完成交响乐》的氛围里，给先生的信也少。倒是先生常有信来，多不长，询问我在国外的境况而已。先生体谅我的难处，从不问我在干什么，只是鼓励我多看、多听、多想。

一九九一年来信说他心情颇不舒畅，也想出国待一段。年底突然接到他从印度寄来的信，知先生去了印度桑地尼克坦的泰戈尔国际大学。泰戈尔曾希望：“这所大学是印度献给全人类精神财富的代表。它向四周奉献自己最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汲取他人最优秀的精华，这是印度的职责。”先生在这里要盘桓一年左右，除了给学校开几次中国文化哲学讲座



之外，再无他事，正可以读书冥想。在这《吉檀迦利》的故乡，“如今正是时候了，该静悄悄地同你面对面地坐下，在这寂静的横溢欲流的闲暇里，吟咏生命的献诗”。

不久就接到先生从印度寄来的文稿《人间野语》。先生劈头就问：“这个世界可爱吗？你真的爱过它吗？”先生分析道：“在这个世界上，偏有一些人，不肯进步向上，他们不做人事，偏做鬼事，……老百姓称之为魔鬼。既是魔鬼当然不认为这个世界是可爱的了。”先生痛省到：“我们受的欺骗够多了，够久了……我们耗尽了心血，做了违心的事，有时还感谢不已。这真是人生最大的悲剧。”

但先生并不绝望。这世界终究是可爱的，因为有那样一些人，“他们仍然若隐若现地留存人间——不，也许更像夜间的皓月，照耀着人间，不与热烈的阳光争胜，却静静地冷眼看世界。人在烈日刺激下，总是不敢抬头看一看太阳，只能低着头看着太阳在地上的影子。但一到夜间，推开窗户，或独立窗前，便可放开眼目看月亮，看星星了，这是面对面的欣赏，面对面的倾吐，这是何等畅快呵！”

随后，在桑地尼克坦的绿树浓荫下，先生把眼光从天上皓月转向人间历史。这次他向伟大的莎士比亚致敬，用哲人之笔撰写历史之剧。先生写就了三幕历史剧《秦镜高照》，反

思秦王朝兴之也速，亡之也速的历史。先生虽是从儒家的传统立场来看待秦亡原因的，但其着眼点却是中国的现实。先生借子婴与宦官韩谈的对话来阐发国朝几十年不得安宁的原因：

韩谈：“我是觉得我们的国家，弄到今天这个样子，真是十分可悲的现象。统一前，天天打仗，天天听杀死敌人多少的消息……统一了，我们都以为天下安定了，谁知不久就感觉战争似乎还在打。但是，它不是在关内或关外的战场上，而是在秦国原来的国土内，起初，也许可说是在儒生范围内，被杀的人，也不过四五百人，后来，扩展到同情儒生的人也逃不掉……这种杀的办法，定罪方式，弄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吭一声。甚至还要闭起眼睛，拍手称好。否则也是犯罪。这算是国泰民安吗？”

子婴：“你看，发生这情况的原因在哪里？”

韩谈：“首先，始皇帝在统一天下后，总觉得自己战场上有大功劳，有自己成功的经验，过度相信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众叛亲离。还有，最大的错误，恐怕还是，搞不清楚什么叫‘战时’，什么叫‘平时’。什么叫夺取政权，什么叫维护政权。国家一有什么不如意事，就疑神疑鬼，就用战场上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手无寸铁的臣民或亲友，这样怎

能不把和平安定的世界变成恐怖世界？即使是建国元勋，但治国无术，动辄就拿起刀剑来骇人，还不会把国事弄得一团糟吗？”

这里潜隐着的问题已不是简单的“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判断，而是事涉一个国家如何长治久安。是以战争方式治国，还是要走宪政国家的道路。

二世：“赵老伯，你的话，更说得我心里如雷一般震动。我想不到为了一顶皇冠，竟要这么多的亲属流血，我真有些心软了。”

赵高：“你的心太仁慈，这仁慈是不能对付政治大事的……我看，你该横下一条心，再多杀一点，一方面可增长威风，一方面如能把杀人看成政治上常有的事，好似从水果袋中取桃子一样，久了，你的心就会慢慢地平静下来了。也许还是一件快乐事呢！”

一九九二年底，先生回到北京。邓南巡之后，左风稍敛，先生又乐观起来。我写信劝先生世事不必太放心上，国家要走的路还长，先生还是多多保养身体，冷眼旁观的好。像我这种人，关心政治不过是关心裹在政治圈中的朋友，所以体会不到先生对民族国家惓惓衷肠。那些劝慰先生的话轻飘得像一缕浮烟。

几年间，我们在法国安顿下来，心里就存了个念头，想接先生来法国住一段。一九九五年初，和嘉映商量能否实现。雪正好回国有事，便去面见先生，请先生首肯。先生很高兴，说能来法国见见我们也是他的愿望，于是雪便去安排机票、签证诸事。正巧灵羽也要来法国，便请她陪送先生。

以为万事妥帖，谁知临起程前一周，嘉映来电话，说先生心脏不太好，大夫不同意老人家长途飞行。这消息让我左右为难。想见先生心切，又担心先生长途飞行万一有个闪失。先生毕竟八十五岁的人了。打电话和灵羽商量，她倒是快人快语，说先生一直在做起程准备，一门心思要去巴黎看你们，这时要他放弃，才真是致命的事。干脆依前议行动，其他不要考虑了。想她说得有道理，就安下心来等先生。

一九九五年八月五日，灵羽护持先生到了巴黎，同行的还有先生的女公子邦珞大姐。我们在机场接到先生，回首先生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在北京首都机场送我出国，已经五年多了。

安顿先生休息好后，便和先生商量在巴黎参观游览的事。八月份我们休假，正好可以陪先生。先生说他想看两个地方，一是先贤祠，他要拜谒卢梭的长眠之地。二是巴士底狱，他要凭吊法国大革命先驱建功之所。知道先生身体需加小心，

故“强行”规定先生半天休息，半天游览。先生抗议说我到了法国，反倒不自由了。我们笑笑，不理睬他的抗议，反正心里打定主意，要让先生在法国平平安安。

和先生商量后决定先去巴士底狱广场。我知道先生从来都关注法国大革命，这和他极喜爱克鲁泡特金有关。先生与巴金是老朋友。先生告我，巴金先生曾一度信奉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故取名巴金。先生年轻时受巴金先生影响，也信仰过无政府社会主义。

我曾经问先生哪本书对他一生影响最大，先生毫不犹豫地说是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因为他从克氏的自传中，“看到一个洁白、无私、坦诚，而为人类牺牲的灵魂”。克鲁泡特金的名著《法国大革命》是先生观察法国大革命的基本视角。即从普遍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革命之不得不发生，它的伟大理想和革命过程中的缺失与迷途。

在先生看来，克鲁泡特金的精神是欧洲文明的根本，即“爱人、自由和牺牲”。先生指出：“人道主义在西洋流行已千年了，但西洋人的精神仍循着这条大路前进。西洋人提到爱自由，总是心志焕发。有人说西洋人是宗教精神维持的，我觉得这话说得笼统了，应该说是由广大的爱所维持的。”先生不赞成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说法国大革命是平民为

争取做人的权利而发起的革命，柏克站在传统英国保守主义立场批评大革命，偏见很深。先生极喜克鲁泡特金所论，革命应能带来道德上的进步，否则必是假革命的名义以行的权力之争。

第一次陪先生去巴士底狱是在一个傍晚。广场旁的巴士底狱歌剧院玻璃幕墙上还映着朦胧的天光。广场中央的七月圆柱顶上，金色的自由神披着灿烂的霞光。我们开车在广场上缓行一周，给先生指出刻在广场上的当年巴士底狱塔楼底座的痕迹。先生说白天还要再来一次，要照几张相留念。

几天后，选了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又陪先生去巴士底狱广场。如他所愿，以七月圆柱及自由神像为背景照了相。先生手持那支黄藤手杖，挺立柱前，表情严肃。后来先生为这张相片写了一首诗：

看那巴士底广场

纪念碑雄立中央

碑身是监狱砖石建成

碑底有烈士遗骸埋葬

碑顶巍然自由天使

面向众生庄严高唱

“人间地狱终将倒

伫看历史公正大旗飘扬”

并亲笔题写在照片背面，当做新年贺卡寄给我，我一直珍藏着。

去卢浮宫的头天晚上就和邦珞大姐说好，让先生好好休息。因为卢浮宫太大，拣要紧的看也要三个小时，对先生来说，是个“重体力活”。但先生兴致极高，显得“斗志昂扬”。待先生午休起来，便向卢浮宫进发。

进德农馆，先到了意大利雕塑馆。先生在米开朗基罗的《被俘的奴隶》和《垂死的奴隶》像前伫立良久。随后顺长廊穿过波尔盖茨藏品厅进叙利馆，远远见米洛的维纳斯兀立长廊尽头。雕像前人头攒动，先生便止步，远远观看，说这座雕像远看亦佳。

沿大台阶拾级而上，见胜利女神若凌空而降。扶先生上到台阶顶层，以胜利女神为背影，与先生合影，便进入法国绘画馆，起始就是新古典主义，左手不远处，大卫名作《贺

拉斯誓言》赫然在目，凛凛浩气扑面而来。先生连说，“真英雄，真英雄”。

请先生在《拿破仑的加冕》前坐下小憩片刻。先生说这画大得有些逼人，像身临其境。起身前行不远，就是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女神引导人民》，先生说，在国内，有人以为这幅画是画法国大革命，还写成文章，其实它是受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启发而作。

出法国绘画馆，左拐进“大画廊”，终于走到《蒙娜丽莎》面前。那时还未给她修专馆，就和其他意大利绘画一起陈列在“大画廊”里。先生最赞她那“超善恶的微笑”，现在站在她面前，先生说，原来想象画的尺寸要大一些，眼见才知并不大啊。我回先生说，尺寸不大名气大，先生随口说这不是壮美，是柔美。看来谈到艺术品，先生就想到了康德。

尽管参观时间已不短，先生也有些累了，还是走到了斯芬克斯厅，让先生与柏拉图头像合了影，先生读了一辈子哲学，岂能和哲学巨人失之交臂。告别柏拉图，便劝先生结束参观，回去休息，若还想看其他内容，可以再来。先生点头，便缓缓走出卢浮宫。

巴黎的夏季天很长，黄昏时分，天仍很亮。先生兴致不减，说这么美的风景，应该再走走。于是我提议去圣母院旁



休息一下，再去看看莎士比亚书店。这是毕奇女士印《尤利西斯》的书店。在神所医院旁停下车，和先生慢慢走过圣母院正门，经过查理曼大帝骑像过双桥，过河就是莎士比亚书店。

此时，夕阳的余晖正把圣母院的倒影投入塞纳河心，游船驶过，波浪起伏，摇荡一河碎金。我扶先生步上双桥，先生突然停步，凭栏而立，眺望河水，沉默不语。

我待立一旁，不敢打搅先生，心里却好奇先生在想什么。许是想起夫子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许是想起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许是想起阿波利奈尔的《桥上吟》“疏钟阵阵，流水荡荡，我们的年华一逝无踪”？不，先生此刻倒可能想的是身边这个顽劣小子，二十余年耳提面命，而今却遁身绮靡之乡，混迹孔方之场，武不能剑行天下，文不能笔写华章，虽忝为弟子，却不窥门墙，年岁徒长，依旧废人一个。

可以想见先生心中的无奈与失望。但先生大人有大量，从未因此责备过我，至多是嘱我不要荒废学业，有时间还要多读书，多想问题。先生的话我是谨记在心的。

先生到巴黎时，国平从德国过来，住在我这里。国平是先生喜爱的学生，能相逢异乡，先生极高兴，得空便谈天说

地。正巧远在美国的另一学生恰恰有事路经巴黎，住在离我不远的一个朋友家。这次师生邂逅巴黎，先生也称巧。同在巴黎的万公两次过来拜见先生，也谦称是先生的学生。因万先生在清华念的是给排水专业，我就和他开玩笑，说周先生只讲希腊，不讲给排水，你算哪门子的学生。先生却一脸严肃地说，我和万公都是清华毕业，我们是校友啊！

先生在巴黎和旧雨新知相聚，兴致极高。有时我要拉先生出去玩，他反会问我，今天会不会有人来啊？

先生在巴黎去先贤祠拜谒了卢梭和伏尔泰，又去巴比松村参观了米勒的画室。先生在北京的书房里，很长时间挂着米勒的《钟声》，先生在他的《自述》中说：“我看到农田里的农民，总想到法国米勒的画《拾穗》和《钟声》，心里便豁然开朗起来。”拜谒卢梭，参观米勒画室是先生的夙愿，终得一了，先生心情极好。

有邦珞大姐在旁精心照料先生的起居饮食，先生说他在巴黎住一个月，人都胖了。我和雪能得机会侍奉晨昏，也觉心满意足。

时间飞驰，不觉先生离法的日子就到了。虽说早知聚散无常，但偏偏“情之所钟，惟在吾辈”，终不能若无其事，心中怅怅是难免的。送先生返京的那天，托运好行李便与先生

坐在咖啡吧闲聊。先生突然从包中拿出厚厚一叠纸张，一看是先生的全套医疗档案。心电图、化验单一应俱全。先生说我来前知道医生不愿我长途飞行，但我决心不理睬，为防万一，我还是准备了一份病例副本，省得万一需要看病让你们措手不及。

听先生这样讲，我鼻子有点酸，急忙打岔，安慰先生，说知道先生身体无大碍，必有百岁洪寿。先生大笑，说“老而不死谓之贼”，我可不愿当百岁老贼。送先生到登机厅，先生过安全门后回过身来，举起手杖，双手做一揖，便转身去了。我一下子忆起七六年初，寒冬雪夜，在鼓楼送先生上 7 路无轨的情景，一晃二十年了。此一别，与先生远隔重洋，不知几时才能相见。一下子眼泪夺眶，急拉住雪，掉头走了。

## 十二

先生回去了。随后几年常有信来，但多不长。新年春节

必有贺卡，永远是殷殷的关切。我虽然忙于俗务，也不忘常给先生去电话。每次电话先生都会讲许多话，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到熟悉友人的动向。常常说着说着便突然停住，问我长途话费是否很贵。我和先生开玩笑，说挣钱不就是为了打电话吗？否则我会游手好闲。先生说他知道，在国外生活不易啊。

一九九八年初，先生辗转托人带来他的书《论人和人的解放》，里面收了一些他早年的重要作品，其中有我最喜爱的《莎士比亚的人格》，也收了先生近些年的新论。读先生的著作，观点或许有异同，但知先生发言皆出自肺腑，这是他为人为文的一贯风格。他说：“人，如果不是语出自丹田，谁愿老是听你只是喉管发出的声音，或者重复他人讲过的废话。”

先生晚年发言不多，但“米豆千甌，不如明珠一粒”，言论与思想的价值不是以数量衡量的，先生在展望中国伦理学建设的前景时，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以为二十一世纪的新伦理学，首先不是把仁或爱（或利他、自我牺牲等）讲清楚，而是要先把公正或义（或正义、公道等）讲清楚。”“爱而不公正比没有爱更可怕、可恨。”先生何出此言？我想因为先生深深知道，正义论或伦理学中的正义问题，从根本上牵连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由此，我们或可明白何以罗尔斯会继《正义论》之后，再作《政治自由主义》。

该书中收有先生作于一九三八年文章《中国文化对目前国难之适应》，六十年前的文章，竟似为今天而作。先生说：“仅仅是生命（或生存）与财产，并不能构成神圣的人权。其必须以人格为根基，始能使人权成为不可侵犯的东西。须知动物也有生命，有生存，但不能因此作为权利……仅有经济关系，仅有私产亦不能成为权利，经济，必须是有人格的人为其理想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始有价值的意义，亦因而是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对那些鼓吹吃饱肚子就是有了人权的国朝上师，不啻一痛击。

在外寇入侵，国脉危殆之时，先生力扬中国文化深厚的生命力，因为“中国抗战力量不在中国都市，而实寄存于中国的农民身上。……须知我们几千年来文化之所寄托，都是在于乡民的生命上”。先生深信中华民族之抗敌精神深藏于中华文化之中。“所以我们今天该提起精神来，清楚地认识文化，并不只是指几箱古物，几本破书，几个团团圆圆的所谓学者之流，文化该是这一民族所有为其理想而努力之活动力。……文化，就是从久远的过去所流来的潮水，人沐浴于文化中，就是与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流结合，它能洗涤我们的心灵，也能鼓舞我们的心灵。”

先生沉痛而激昂地宣示：“我们眼见日本军士的野蛮，他们国内人士之轻浮，以及使得我们最会生活的人民妻离子散，

女污男亡，生活艰苦，相对饮泣的种种事实，都是他们予我们的反面鼓励。我们的人民，将会知道这一次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争战，还带来了文化的危亡，理想价值的毁灭问题。我们受过几千年训练的文化活动，决不会坐看其价值理想受辱甚至灭亡的。”

六十年前，先生就深信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深蕴于那些胼手胝足、辛勤劳作的大众之中，六十年后，先生又提出“人民伦理学”，为细民呼喊：“伦理学就是研究人民平时过道德生活的生活，他们当然既能爱‘好’，也能恨‘恶’，而道德生活就是靠爱与恨两个经验的积累，构成他们的性格和人格。而我们的民族精神，也要靠这些诚诚恳恳过生活，尽神圣义务的人去维持。……人民伦理学是非常朴素但又非常扎实的东西，也是十分广大十分深远的东西。既不以甘言媚世，也不对权势者奉承。它只是如劳动者的手足，一步一脚印地耕耘。”

先生积一生之学，持平实之论，立足典籍而心在田野，从无一时动摇。其理念之一贯，心性之坚实，足为我辈后学楷模。念及而今某些学界“新贵”，不能守观念之贞于片刻，不惜诋毁华夏文人所秉持的“清流”理想，为求“用世”而狼奔豕突于权势之门，更不知何谓“万物皆流而金石独止”。

二〇〇二年晚秋，范竞马回国开独唱音乐会。我一时不能回去，雪带着盈盈回去了，知先生最喜歌剧，便嘱她一定请先生出席音乐会。那时先生已偶尔需轮椅代步，但上下楼仍坚持自己走。竞马在音乐会上献唱了焦尔达诺的《安德烈·舍尼埃》。这位法国大革命中泣血的夜莺唱道：

我去近旁的教堂，

一位祈祷者伫立在圣母与圣徒的神龛旁。

他收敛着全部的施予，

却全不见颤抖的老人正徒劳地用哀求的双手，

乞讨微薄的垂怜。

我走过劳动者的茅舍，

听到他高声诅咒

脚下的土地、贵族和

他们的骄奢。

这苦难可使你高贵的心灵感觉歉疚？

这正是先生熟悉的主题，也是先生常常垂念的问题。先生从头至尾聚精会神地听完了演唱。音乐会结束后，北陵亲自驾车送先生回家。雪从北京回法，带来了先生的信。先生用大字写了“范竞马伟大”五个字，觉得出来他极高兴听竞马的音乐会。只是信的结尾有些伤感地说，我九十岁了，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听音乐会了。

二〇〇五年，先生又寄来打印成集的文稿，题字在上面，说是“老残留言”。这些文稿我大多已经拜读过，唯有附在文稿中的一封毛泽东论及先生文章的信令我好奇。

毛泽东让刘少奇读先生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上海《文汇报》的文章——《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毛泽东就先生文章议论道：“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个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其基本对象是论善恶（忠奸、好坏）。统治阶级以为善者，被统治阶级必以为恶，反之亦然。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

毛泽东的批语作于九月十五日，也就是说，先生文章一见报，毛就注意到了。几天之后，他就想到要让刘少奇读先生的文章。毛绝不会平白无故对希腊伦理学感兴趣。若不是有现实用意，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遥远、太抽象了，什么是其



中玄机？

我给先生打电话讨教。先生说其实他一直不知道毛曾对他的文章有过批示，不久前北大李醒尘先生告他，并给了他一张复印件。这事让他也有点想不明白。只知道当年作文时曾着重谈了梭伦的调和妥协精神。先生还赶紧补充说，我是给文章戴了阶级斗争的大帽子的，那时候在这顶大帽子底下谈几句调和中庸已经很不容易了。再问毛何以会对他的文章感兴趣并要批给刘读。先生说他在文章中谈了两点：第一，梭伦的折中调和成为后来希腊奴隶主民主派的政治路线；第二，梭伦手拿大盾保护双方，所以他心中的公正内容就是“调整公理与强权，协和共处，人人各得其所”。先生说，一九六二年初，中共开了七千人大会，毛刘在政治上有冲突，毛想向刘发出调和的信号，大家不要再争斗了，同心协力挽回局面吧。或许毛看到我的文章讲中庸、调和，就让刘也读一下，不要再揪大跃进饿死人的事了，讲点中庸和谐吧。我吃惊先生对这事判断与历史事实相差太远。

事实上，在七千人大会前，刘已经准备了一个讲话提要，共有四点：一，要放开讲错误，重病用猛药；二，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三，批分散主义要讲事实，一个都不能少；四，党内斗争过火，民主不够，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这四条表明，刘已清醒认识造成大灾难的原因。刘又在

正式会议上讲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名言。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重发刘少奇论道德修养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九月份又出单行本，共产党员人手一册，发行量竟一时超过《毛选》。共产党高层诸公中，刘是唯一一个写著作涉及道德修养的人。这部书早在四九年前以前就发表了，而且毛早就赞赏过这部书。但在意识形态的伦理中，对错的取舍常常系于个人的好恶需求。九月九日，先生的文章见报了。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先生的文章共分四节：一，伦理学来源于社会矛盾；二，为奴隶制所决定的社会生活的特点；三，围绕“中庸”“和谐”为中心的表现形式；四，争论的与流派。正像先生所说，他是给希腊伦理学的思想戴了“阶级斗争的大帽子”，但重点放在梭伦的中庸调和思想，这是先生想说的话。依我看，毛恰恰是看中了先生讲道德的阶级分野一题。正因此，毛在给刘的批示中强调，伦理学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还特别指出，“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毛对先生文章的关注点，恰不在“调和”“中庸”，而在把伦理学中的某些理论问题用于“现实阶级斗争”。

二〇〇六年，突然接到先生自国内打来的电话，有点吃惊，平日都是我给先生去电话，先生有何急事找我？让先生挂下，我再拨打回去，先生在电话中语气沉重地问我，是否

知道曹天予把国平告上了法庭。

这事缘起于国平在其自传《岁月与性情》中提到建英的哥哥郭世英“文革”前因X小组案被整肃的事，其中提到了天予，而天予认为所言不实，一定要讨个公道，便要为国平对簿公堂。先生为此事甚着急，从北京来电就是要我劝两造和解，说事已至此，怕只有你能劝说他们两人息讼。我告先生我完全无能为力。先生却不依，执意要我有所行动，说真打起官司来，必是亲痛仇快。先生说现在重要的是反省批判那个年代，在那时候，谁说过什么，做过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先生情绪有些激动地说，同学之间有什么账好算？那场把天予整成反动学生的运动是彭真直接领导的，谁和他算过账？如果不记取教训，对同学们受过的灾难不反省，将来悲剧要重演的。

我当然同意先生的看法，但比先生更了解此刻的国平和天予。人难免有一“执”，事关自身名誉时，便愈发“执”得厉害。

天予、国平当然都是尊敬先生的，但年轻时结下的怨真不容易化解。人很难改变年轻时认定的事实。在先生看来，俩人仍旧都是他所喜爱的学生，老师说话总会起作用。在我看来两人皆囿于自身所执之事，以为原则所在不能退让。先

生为此事几次催我有所动作，我想先生太高估了我的能力。我知道先生曾请国平到家中，表示由他亲自做东，请天予、国平吃饭恳谈。先生幻想能把盏尽欢，前嫌冰释。

尽管学生们仍敬重他老人家，但要他们尊师嘱行事已不可能，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国平当时表态说只要天予撤诉，他愿做东请客与先生一聚，答谢先生的关心。先生也与天予谈过，天予说只要国平道歉，他也有息讼的意愿。但难就难在“只要”两字上。这是一死结，解执惟一方退让，而这一步实在难退，因为两人都有道理可说。天予是科学家，国平是诗人哲学家，看问题的方法、角度都不同，这样两造又如何调解？

先生爱他的学生，以为必须呵护两人，谁也不该受委屈。我爱我的朋友，但知道男人间的事，该杀该打只能由他们去。这点难向先生言明，只好敷衍先生的嘱托。我对先生说，您就自当哥儿俩打架，家长两不相帮。让他们打个头破血流自有停手的时候。先生刚直纯正之人，总也搞不明白我在扯什么淡。最终先生不愿看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问题终在法庭解决。

判决国平胜诉之后，我与先生再次通话，先生只是重复说不应该，不应该啊，都是受害者。在先生心中总觉自己是

有孩子受了委屈的家长，但先生不知，天下哪有听家长话的孩子。

二〇〇六年底，去国十七年后，我终回故土。孤舟一系，当然首先要去看先生。

十二月二十六日，飞机落地正是中午，怕打搅先生午睡，便先到正琳家吃饭。与正琳八九年别过再未相见，此刻重逢，今夕何夕？兴奋难以言表。付大姐的牛肉粉真是天下第一。在正琳那里待到三点钟，便去看先生。

与先生自一九九五年巴黎分手，已逾十年，而告别朗润园十公寓已十七年了。楼前老白杨树仍在，而木叶尽脱，几株干枯的植物在寒风中萧瑟。走进楼道，见玄关更加破旧，似乎这些年来没人维修过，楼梯已有数处剥落。寒风从楼门破损处吹进，寒意袭人。想昔日同学少年，谁个不宝马香车，华屋美舍，更见先生此处的清冷落寞。

敲门，邦珞大姐开门，引我们进屋，先生已坐起等候。原本嘱邦珞不要早早惊动先生，但先生毕竟知道了，中午竟未午睡，一直坐在那里等候。先生的房间仍是老样子，那张老书桌忠实地陪伴先生阅尽岁月沧桑。屋子里多摆了一张躺椅，愈显得局促。记得一位波斯国王曾往潘布罗克小屋拜会曾两任英国首相的约翰·罗素，罗素先生为房子的狭小向国

王道歉，国王说：“屋子确实不大，却住着一位大人物。”先生能在这方寸之地亲炙中外先哲，又有何小可言？书房门上挂着先生手泽，为文天祥在元兵狱中所作：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先生在旁注道：

为国尽忠，乃义之尽也

为民族尽孝，乃仁之至也

南墙原来放置康德全集的小书架搬走了，挂上了先生手书条幅“殷鉴不远，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悲哀如此深重，在已近百岁的先生身上，几是世纪之哀。与此相比，我更惊异于那些衣马轻肥的学界新贵，他们那样轻浮不屑地扮着鬼脸。

敬问先生起居，先生频频点头，说好，好，只是老了。先生确实老了，临近九十六的人了，能说不老吗？先生走路要人搀扶，或靠支架扶持行走。但先生的活力和精神又好得让人吃惊，尤其是谈吐问答之敏捷，头脑记事之清楚，几乎是一奇迹。我们也知道有近百岁的老人生命虽在，但灵魂已走。而先生，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言：“只有能拿走我灵魂的人才能带走我的生命。”

先生又急忙让我读他前几个月在唐君毅先生纪念会上的发言。先生在这文稿的一句话下面重重画了道红线：“唐先生对人类，爱其生，悲其苦，一生依靠一只手，一支笔表达他的善意。”我想这正是先生夫子自道。先生曾在《论人和人的解放》一书后记中写道：“我佩服古往今来站在人民一边，捍卫人民的权利与人格的有良心的志士们的气节与灵魂。我手中只有半支白粉笔和一支破笔，但还想用它来响应这些古今中外贤哲们的智慧和勇敢。”

北国的冬日，天真短，只觉片刻，天竟黑了。打开灯，柔和的灯光洒在先生的白发上，先生捧着我刚送他的那部纪念友人的厚厚的书，凑近眼睛，读着，读着……我们不再说话，静谧飘来，带我回到一九七五年的冬日，我初登先生门的日子。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间小屋。

三十多年，走近先生身旁，受先生教诲，体会先生的伟大人格，渐渐明白，希腊先哲所区分的“静观的人生”与“活动的人生”在先生身上是浑然一体的。先生用超越的纯思贡献学术，又以入世的关注体察民生。平日慎言笃行，却不忘读书人“处士横议”的本分。邦有道，先生闻鸡起舞，邦无道，先生鹤衣散影。内心守死善道，终不忘循善取义。见先生手录佛陀临终语置于案前，“诸有为法，悉皆无常，精励行道，慎勿放逸”，知先生是勘破红尘后仍素怀持守。

想先生这一代读书人运气真差。古来“士可杀而不可辱”，而先生这一代人在反右、“文革”期间所经历的，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做辱人者的同道。清流尽扫，士林心死，其哀何之？先生知其辱而保其尊，守其弱而砺其志。信大道如砥，虽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希望人类终有一股正气来让人类能安静生活下去，可能这也只是希望，但比较合理一点，也许是可能的。狂风暴雨之后，将有晴朗的一天，这大约是气象学上的规律。我们过去已经等候久了，可能还要等候。今年我给朋友的贺年片上都写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话，看来天总归是要明的。”钱锺书先生曾拈出刘孝标《辩命篇》一语，“‘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故善人为善，岂有息哉”，



来解山谷诗。先生引此语，亦恰是此意。

一九九一年时，先生曾作文总结好友许思园先生的一生，先生说：“他在特有的孤恃外，更有他特有的天真，使人觉得这个世界究竟还有一些在天空下独往独来的人，令孤独的人不觉得孤独。他好似月夜里一颗孤星，并不被睡着的人看见，但却为那些整夜不能入睡的人，忽然从床上透过明窗发现——它的光是何等清明，它的面目是何等安详而令人遐想！人为什么非在烈日阳光下，鸟语花香中生存，否则，便不算生活呢？为什么在半夜里、天空中、寂静地蹒跚而行，就不算是一种良好生活呢？”我以为这段话再恰当不过地描述了先生的一生所求。

二〇〇九年一月一日，给先生打电话恭贺新禧。先生那天谈兴极浓，说话滔滔不绝。谈到国内形势，先生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大人物只关心自己的小事情，而小人物的大事情却没人管。先生怕我不明白，特地解释说，大人物的事情就是升官、出国、捞钱、安置子女。小人物的大事情是生、老、病、死，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社会缺乏公义啊。先生又说，大人物可要注意了，小人物的大事情办不好，大人物的事情也会出麻烦。一个社会缺乏正义，必定要出问题，人类几千年历史就是这样走下来的。

听先生这番话，我几无言。昔庄周大小之辩，辩在孰优孰劣，而今先生大小之辩，辩在黎民苍生啊！

先生又讲起国内学术腐败问题，说已成痼疾，从前为士林不耻之事，而今竟成通则。士无廉耻，国无希望啊！人在海外，对国内学术界的糗事常有所闻。年前回国，朋友们相聚也谈及此事。我却不甚吃惊，本来谀桀颂纣皆是文章，而今革命怒吼为市声喧嚣所代，焚琴煮鹤亦成雅玩，此事本一体两面，不足为奇。伤心惟是中华三千年衣冠文物，旷绝幽奇之事渺不可寻。先生纯然一读书人，痛心疾首也是当然。我们无能挽狂澜于既倒，只能寄希望于中华文化生命坚韧顽强，破土重生。

先生耳朵有些聋，说话怕我听不清，便声高起来，话筒中竟觉得有些震耳。先生最后感叹说，过年我就 98 岁了，还想去法国看你们啊，就是不知航空公司肯不肯卖票给我这个“九八病叟”啊。说到“病叟”两字，先生有点自嘲地大笑起来。在先生的朗声大笑中，我却不由泪水涌出。怕先生察觉，匆匆挂断电话。

呆呆坐着，许久，许久……天渐渐暗了，几点细雪飘落，悒悒地洒在青竹赭瓦上。先生言犹在耳，透骨的悲凉弥漫开来。寂静中，仿佛见到先生，在清河小营哲学班的教室里。

先生刚擦完黑板，回身转向我们，飞舞的粉尘在阳光的裹挟下变得金灿灿的，罩在先生身上，先生的身影模糊了，像峨嵋金顶上隐现的佛光。而耳边的天音却有着川腔：“巴门尼德说‘存在是一’”。

## 后记

二〇〇九年元月二十八日先生起床穿衣时不慎跌倒。夜间便觉背痛，送医院检查，未见骨折，返回家中。二月四日，腰部见有小块红肿，又去医院查。医生仍说无大碍。

那几日常与邦珞大姐通话，手边自一月份动手写的《辅成先生》已完成四章。想全文完再呈先生审阅。本来写先生就感绠短汲深，未成全璧的东西更不愿给先生看。还有一层私意在，盼先生能平安养好跌伤，成其百岁之寿，这样总能看到我的全文。但雪说，还是尽早把成文的东西呈先生寓目吧，让他知道你在写他。问邦珞大姐先生可有精力读文？大

姐说先生每日仍能读两个多小时报刊文章。

于是传文过去，大姐打印出来送先生过目了。先生一气读完，只说了一句：“写写也好，让别人也看看。”此是何意？先生知我往来不过两三子，这“别人”是谁？莫不是先生想让我将此文公之于众？

二月十八日，再打电话，邦珞说先生正在电话旁边，今日精神不错，可以说几句话。等了片刻，话筒中传来先生的声音，大不似往日的洪亮，有些气促声微。只说身体不太好，又问我几时回来。我即告先生今年暑期放假即归探望先生，请他千万珍摄，耐心治疗，等我回来。先生说声好，便再无声音。这是和先生最后的接谈。放下电话，便告雪定下八月一日返京机票。

三月十一日，嘉映往朗润园看望先生，回来后电话告我先生精神尚可，坐谈近两个小时，先生还忆及九五年在巴黎的日子。我听后稍安心。

三月二十八日，家兄自美回国，与家姐共往探视先生。因我与家兄长相相像，先生竟以为是我归国，惊问“你几时回来的”。家兄竟一时未敢道明真相，许久后才说我不是越胜，是越胜的哥哥。先生即送家兄文稿一册，并坚持要签上名字。但四月一日，病情急转之下，送北医三院诊治，不料一月中

竟四次转院，进进出出，元气大伤。期间因插胃管引起胃出血，又加肺部感染，一度入住重症监护抢救室。

五月二十二日，是嘉映父亲的追思之日，家姐前往途中接邦珞大姐电话，告今晨因医生反复“洗胃”，造成血压陡降，然后上一系列抢救措施。先生始终神智清醒，平静注视医生们的忙乱。在医生最后挪动头部时，突然闭目辞世。先生平静而决然地走了，始终保持着哲人的尊严。

五月二十六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先生生平介绍中说：“一九八七年因故办理退休。”此话甚蹊跷。何谓“因故”？因何故？语焉不详。北大校方竟无一人出席告别仪式。先生服务北大近六十年，育人无数，而校方竟吝于表达些微的谢意。蔡先生的学校已然变得如此缺乏起码的礼貌和教养。让我宽慰的是，我们哲学班的同学来了，向先生做最后的告别。虽然离开先生已多年，仍知为先生执弟子礼。先生教过的孩子，仁义总是在的。

八月返京，往朗润园先生故居，已是人去屋空，只剩先生翻过的那些书卷默默地看着我。往老山谒先生灵，对先生说，我来晚了，未及送您老人家。我想先生等我，而您终等不及，先自去了。见先生遗容，雍容大度地微笑着，知先生不怨我。后将《大悲咒》一卷奉于先生灵前，作永久的祈福。

先生一定知道小子的心愿。

此次回京，得空往故园祭扫先慈先严墓。事毕随北陵及姐弟览观五台，寻古刹清凉。山路蜿蜒二十余里，见岚气出岫，虬松挂崖，青霭苍苍，层层染绿。山中阴晴不定，骤雨突至，一片迷蒙，忽又骄阳扫雾，满谷黄金。有孤寺高居梁上，隐约疏钟回响。转一急弯，素石碑楼兀然矗立，乃入清凉界。昔阮嗣宗遇大人先生于苏门山，即此太行余脉。大人先生与之畅论天地玄黄，大道存废，后长啸而隐。嗣宗归而传之曰：“先生从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终极，盖陵天地而与浮明遨游无始终，自然之至真也。”

清凉寺中庭有巨石如船，名“清凉石”，纵横十余尺，高丈余，重数十吨。石身苔藻斑驳，遍体纹理飞动，隐然有灵气，似远古高士化身。其沉稳坚厚，古意萧远，寂然独在，不正如辅成先生吗？先生远行已近百日，谁知其所终极？依先生心性，必会寻此清幽之地以避嚣尘，托体崇山而岿然静卧。有天风流荡，万籁谐响，巨木俯仰，群鹤环翔，又有幽泉濯之，云霞蔚之，丰草绣其锦褥，冷梅献其芳馥，伴朝曦夕昏，夜月晓星，闻晨钟暮鼓、梵呗法音。于千山万壑中得大自在，历万世而不坠，同日月而永光。

呜呼先生！呜呼先生！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完稿

十月六日改定于巴黎奥赛小城

# 聊与梅花分夜永

## ——辅成先生百年祭

辅成先生诞于辛亥革命那年，依中国的传统算法，今年是先生的百年诞辰。先生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二日驾鹤远行，也逾周年。百年诞辰与仙逝周年交集，先生至仁之人，得百年之寿，真可谓“仁者寿”。

《马太福音》中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先生就是一盏放在灯台上的灯。他照亮了一家人，这家里有求善问道的莘莘学子，有漫游精神世界的读书人，也有辛劳于野的大众。先生为他们启悟、解惑、发言，一生跋涉于探索求真之途，经历过彷徨困惑的苦恼，也饱尝体悟明道的欢欣。无论逆境顺境，先生都反身以诚，持守着中外先哲们所昭示的理想，担负着阐发至善的劳作，一生不落名缰利锁，以恬淡充和之气，葆有着中国传统



读书人的纯正品格。

先生出身蜀中布衣，家境清贫，所幸自求学始，就有机会接触宣扬新思潮的书籍报刊，经亲朋好友指引，享受到“雪夜关门读禁书”的快乐。先生博览群书，从中国古典到世界时新思潮无不涉猎。同时，“对俄国文学和托尔斯泰发生浓厚兴趣”。先生一生致力于道德哲学，其立场、视角，颇受托翁影响。

先生一九三一年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他笔耕甚勤，展现出人文科学方面的卓越才华。一九三二年，先生发表长文《伦理学上的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除对两大伦理学派梳理阐发之外，又细致论述“伦理学”、“科学的道德论”及“道德的形上论”的区别，批驳胡适之先生在此问题上的概念混乱。先生那时不过二十出头。先生指出：“在努力道德的人，自己一定是真实地假想着正义是永存的，人的生命当付与正义。所以身体虽亡，只要正义可寄托吾生，如是道德生命自然必丰富，自然必含着不朽的意义了。”先生自己“是一位理想主义者”，终生持守这一道德理想主义立场。

同时，先生又发表《格林的道德哲学》，全面论述了格林的伦理学体系。先生在研究康德伦理学时，注意到康德美学思想的重要。先生说：“我深感当时对康德的美学，而且康德

美学中许多伟大的地方，如崇高或壮美问题、天才问题等等，也多不被重视。就大着胆子，参考西方人的著作，写了这篇《康德的审美哲学》。”（转引自《康德美学思想探绎》，杨振编著）先生的这篇文章对在中国开展康德美学思想研究实有奠基之功。

一九三四年，先生发表《克鲁泡特金的人格》，高度赞扬克氏舍己爱人的崇高人道主义精神。先生从斯宾诺莎和克鲁泡特金身上看到了一个读书人所应进入的道德境界，“独立精神是我们读书人从书中得来的最高道德”。先生更进一步指出“我觉中国现代人有一个极大的错误意见，便是以为学问与精神乃是两回事。以为有学问的人，不一定要有品德，有品德的人不一定有学问。……试看在学问上有成绩的人，谁不是在精神上也是多么伟大？他们何曾是把精神与学问分开？”（见《论人与人的解放》第459页）先生总结道：“西洋人对于有勃勃精神的人，总是一致佩服。他们终生最大的努力，也在这方面。他们宁愿听到一个可爱可敬的朋友，不愿听到一位权势赫赫的人，所以他们爱革命者，也爱克鲁泡特金这等人。我们可看西洋人对于爱，对于牺牲、自由、平等精神是何等的注意。”

一九三八年，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先生与唐君毅等人在成都创办《重光》，并任《群众》杂志主编。除了抗

战宣传之外，先生开始反思文化问题，试图从中国文化的根基处发掘救亡图存的力量。先生发表《中国文化对目前国难之适应》一文，宣示“天助自助，能救自身者维持自身发出的力量”。先生问道：“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固有文化，是否有能力足以担当打破这危局的责任？”先生论文化立基于人格，为每一个体生命所有。先生指出：“我们讲文化，要首先承认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深受文化的洗礼，都有文化，也因而都有其庄严的人格。”

先生阐发人权与人格的关系，指出：“仅仅是生命（或生存），与财产，并不能构成神圣的人权。必须以人格为根基，始能使人权成为不可侵犯的东西。须知，动物也有生命，有生存，但不能因此作为权利。……仅有经济关系，仅有私产，亦不能成为权利；经济，必须是有人格的人为其理想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始有价值的意义，亦因而是不可侵犯的权利。”

先生断言：“文化该是这一个民族所有为其理想而努力之活动力。”它“是从久远的过去所流来的潮水，人沐浴于文化之中，就是与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流结合”。这个生命之流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流，它滥觞于华夏田野，是民族屹立长存的最终保证。先生以为：“中国抗战力量，不在中国都市，而实寄存于乡间的农民身上。我们几千年来文化之所寄托，都是在于乡民的生命上。”先生从文化入手，进而立论于人格

与人权，而终落此两点于中国乡民之身，实是抓住了民族存亡的关键。

抗战后期，先生与唐君毅、牟宗三共创《理想与文化》杂志。从杂志的名称，便可看出先生的精神追求。一九四三年，先生发表《莎士比亚的人格》一文。先生以一位哲人的眼光解读莎士比亚。他抛开一般的文学批评方法而直入人性秘府，以自己炽热的心灵去呼应莎翁对世界的挚爱与笑骂。先生把自己的人生当做莎翁的一部戏剧来阅读、观看、体味。先生读道德哲学，观察探究人的品格，对世人百相了然于心，他悲哀，但在悲哀中能见出人性的光芒。这种善恶杂糅、明暗交织的人性，都具象在莎翁的戏剧中。莎翁希望从泥淖中拔擢卓越正大的品性来标志通往至善之途。

先生追随莎翁，要开辟出从个人悲苦化为人类哀痛的更高境界，这哀痛显示出人性的庄严伟大。先生说：“我们绝不能说莎士比亚心中无悲痛，因个人利益而有的悲痛，可以消减到微不足道，但为他人，为人类的利益带来的悲痛，却随人格的升高，而悲痛愈深。”悲哀的极致便是寂静，在寂静中的沉思能见出众生平等。先生说：“皇帝、大臣、乞丐、小偷，在自然面前同样属于半人半兽，你何必羡慕他人！有时，名利、赏罚，正是一些政治野心家要我们为此而心衷缭乱，以便服服帖帖地听他奴役。”先生从莎士比亚那里读出自由的

真谛。

一九五四年先生所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编问世。此实为中国伦理学研究的奠基石。面对当时显学初立于朝，生硬地对待民族文化遗产，先生凭其良心发言。在讨论中国传统思想遗产的继承时，先生提出所谓“历史价值的意义”，“第一，在当时条件下，（某一思想）是唯一的或特有的价值。这意思就是说：那种思想可能是当时最好的思想，是当时人类的最高成就。第二，历史价值，其作用必可传于后世，甚至与社会同不朽。第三，历史价值，可能是特定条件下的最高成就，后人未必能超过它。”这些阐发在当时“最高最活”的欢呼声中，显出特立独行的品格。

先生又说，“我们必须从爱每一进步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起，然后才会逐渐爱到整个进步传统，哲学传统。不如此，我们弄得每个历史上的进步哲学家都像一架机器，面容憔悴，形体枯槁，其思想都只是机器中的马达声，不但不是一个活的思想家，而且都像是一个低能者”。在此，我们能听到先生的愤怒，他所追慕和热爱的先贤竟被追新竞进之徒糟蹋成“低能者”，情何以堪！

先生坐言起行，一九五七年著《戴震》一书，细梳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指出戴震之释《孟子》乃在指明“不是

由道德规定生活，反过来，乃是人的自然生活规定道德。这个客观规则并不妨害人类的自由。”先生进而将戴震的性命说比照斯宾诺莎之“内在必然性即自由”的论述，指出“戴震在性命问题上，差不多和斯宾诺莎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即戴震已看出命定的必然中有自由，自由中亦有命定的必然”。先生凭他广博的学识、敏锐的思考，指出中外哲人在思想上的殊途同归。

但先生更关注戴震思想的“人民性”。先生指出，戴东原作《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绝非仅为“定义辞句”，“他的书是想使‘古圣贤人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得理’这一思想得到充分实现……要使一切讲理的人，特别是统治阶级，要设身处地为人民的情欲或实情着想”。先生自戴震对孟子的阐释，见出儒家思想中的人本主义因素，先生指出，戴东原“‘以情挈情’的主张，虽未必是人人平等的见解，至少是注意到人民一切情隐的见解，对人必设身处地去想。以一个统治者来说，如能懂得这个道理，便可明白‘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的道理。”

先生入清华研究院，知王国维先生曾担心戴的思想“及身而亡”，以为观堂先生的担心并非杞人之忧，戴东原拼一生之力作《孟子字义疏证》，旨在阐发儒家思想之正道，而此道自汉以降湮灭不彰。先生曾讲，宋以后论儒家以孔孟并称，

其实孔孟之间差别很大。孔孟虽都论仁，但孔子讲“仁”，重在“亲亲”，孟子讲“仁”，“义”也含在其中了。孟子论“仁”，分“以德行仁”与“以力假仁”，以德行仁，义在其中，便是正义，“以力假仁”，“仁”、“义”两失，不过是统治者驭民之术。孟子之论君臣，绝非俯首帖耳的效忠关系，而是“事君以道”，以仁善为取舍标准。君昏，则可“易位”，可“去”，可“诛”，甚至大气磅礴地宣称“吾闻诛一夫之纣也，未闻弑君”。

先生极喜孟子，曾说“《孟子》可作枕边书”。先生书房中壁上常悬亲书《孟子》语录：“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记得一次与先生谈及孟子所论舜父瞽叟杀人，而舜“窃负而逃”，先生拊掌大笑，说逃得好，自此可“遵海滨而处，终身沂然，乐而忘天下”。在孟子看来，舜以天子之尊，弃天下如敝屣，这才是儒者的大心胸。儒者绝非皆是唯唯诺诺、汲汲势利之徒。循善而行才是儒学真义。此处与先生所论之康德理想主义伦理学颇有相通之处。世之至理，原无分畛域。

一九六二年，先生又作《论董仲舒思想》，从另一角度解释儒家思想的流变。先生指出先秦儒家理想主义的光辉，自“定于一尊”，便暗淡无光。经董生之手，成为维护统治集团

的护法之说。先生指出，董仲舒隐去了先秦儒家的“从道不从君”、“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自由高蹈。以“大一统”和不可僭越的君臣之礼将社会各阶层禁锢起来，铸就一套僵死残酷的统治之道。先生指出，董仲舒以为“所谓正义，就是维护君权与政权，一切反抗君主和现实政权的行为，都是非正义的”。先生斥责说：“董仲舒这个思想，是发生在汉代。如果是发生在先秦，只怕先秦的儒家们一定要群起而攻之了。”在先生看来，先秦儒家“以道事君”的理想，包含着读书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选择。高扬此一理想，读书人乃一自由之士，无此理想，便不过策士、谋臣、奴才而已。

读书人并非不问政事，处士横议本是题中之意，但此议乃是探究和阐发善为国本的理念，古之贤人并不拒绝教诲帝王，但决非以奏折密札谄媚逢迎，而是以纯正崇高的理念昭布于世。帝王中偶有具灵性者，听到这昭布，追随这理念，则天下幸甚，如亚里士多德之于亚历山大，梭伦之于克里苏斯。这一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经孟子阐发光大，“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在先秦儒家眼中，君可以变，国可以去，而善的理念决不能依权势者的意志而转变。士，或读书人（时新词汇称作“知识分子”，先生极少用这个概念，他总爱说“读书人”），是社会道德价值的最后守护人。这是先生



一贯的信念。

先生尤厌董仲舒的三统相续论，先生指出，续三统的核心是一“经礼”，此为不变的原则，其内容不过亲亲尊尊。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董仲舒在这里，是想证明，从客观需要言，政权必须集中，秩序必须循尊尊之经礼；从历史言，一切政权的变更，也只为了尊尊之经礼。”先生又说：“董仲舒关于政治制度的理论，由尊尊而经礼，而三纲，而三统，皆求使有一套严格的上下有别的秩序，以此来形成集权中心。尽管有各种变礼及改制，亦不能改变这经礼。不但如此，所谓‘变’，正是维护了这个‘经’。以后两千年的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用以辩护他们的统治的理论，几乎无不以此为根据。我们如说董仲舒是封建制度的大功臣，这并不是一句夸张的话。”就此我们便可明白，何以一个聪明的书生“从君不从道”的精巧谰言，能成就专制帝国两千年的江山。

先生批评董仲舒，因为在先生看来，自董生向汉武献策独尊儒术以来，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民本观、仁义观便变质。读书人本有的自由风范也磨灭殆尽，成为统治集团的工具。儒家的精义不彰，反沦为竞进之术。“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之千余人，盖利禄之途然也。”而据称孔子本人已见到仁义之礼衰微于庙堂，从而转向民间，要“礼失而求诸野”了。先生指出：“孔子并不很受当时君主欢迎，自己随时想到，‘道

不行，乘桴浮于海’。后来在抗暴秦的队伍中亦有儒家信徒。

‘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子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先生据此认为，“原始儒家不仅不是君主御用的智囊团或吹鼓手，甚至最早还是反专制主义的先锋战士。”先生拈出“儒分朝野”说，来标志他心目中儒家的精义与糟粕，其中寓意极值深思。

先生谈及“儒分朝野”时说：“孔子与儒家未必相当，民间儒家与官方儒家未必相当。”在先生看来，所谓在野之儒，多是儒家理想的承继和传播者。从时间上看，他们大部分是先秦儒，信奉的是儒家经典理想，他们“守死善道”，以人为本，满怀慈悲与恻隐之心，倡导“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宣布“行一不义者，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他们相信众生平等，“爱人者人恒爱之”，“泛爱众人而亲仁”。对待权势煊赫的君王权贵，他们绝无卑颜媚骨：“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斗筲之人，合足算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他们参与政事，以“从道不从君”为原则，“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无道之君，弑之无妨。他们谦逊地对待知识，从不以为真理可以独占，“多闻，择善而从之”，“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对认定的道义原则，则“虽千万人，吾往矣”。

他们皆是至情至性之人，“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们珍视友谊，“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愿车肥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他们希望造就具备儒家理想人格的士人来担当此价值的守护人。“士不可以不弘毅”。“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真醇之儒所得之志，是先贤所传的道德理想。持守此理想是读书人的责任。此即为“尚志”，即尊崇以仁为核心的终极价值。肩负道德理想的弘毅之士，以仁为善的源头，以义为实现善的手段。为达此理想，坚韧不拔，“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在此终极价值面前，王位权威皆不足道，仕途利禄皆不足惜。

在先生看来，儒家的经典理想说明了一个事实：“儒家并不生来就是帝王或首领的同伙。”因而讨论儒家学说，“首先要注意的是儒学上的一与多、普遍与特殊（或‘共相与殊相’）的问题”。

在指出儒家正宗所含的终极关怀和普遍价值后，先生又指出：“但历代在朝多数人士，喜用儒家之理，大挥忠孝大棒，大兴文字狱，以权谋私，以权杀士为得意，这确是令人厌恶的。”自汉武定儒家于一尊，儒学渐成专制王朝统治的理论依

据，董仲舒之“三统说”变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中那些有永恒意义的内容竟遭埋没。先生指出：“历代统治者，利用、曲解儒学以治国，大施淫威，欺压人民，这不是人民之福，实是人民之祸。讲中国的儒家道统传统，不清分这点，必定会分不清真儒家或假儒家。以此论儒，无不入歧途。”

先生指出儒学歧途之后，并不放弃经典儒学思想中的终极关怀。先生反复强调“礼失而求诸野”，以为这是先贤寄儒家精义于人民之中。汉季乱世，魏晋相代，在一片混浊晦暗中，却有一枝奇葩出土。那就是被先生看作在野之儒代表的陶渊明。先生说：“如果我们以孔子或儒家作为我民族与文化的传统，显然我们既有人民的孔子与儒家，也有上层社会流传的伪孔子与伪儒家传统。”先生引陶渊明《饮酒》诗，来阐述他的思想：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

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醇。

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

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

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

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

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人亲。

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

先生分析道：“陶渊明的本意，据我看来，虽然是在乱世纷纷的时代，叹息真儒家传统的衰亡，但更重要的是哀叹，‘真’的人民生活（包括朴质之真 *naive life* 和自发之真 *spontaneous life*）的传统丧失。……在诗中陶渊明虽未明白指责汉代董仲舒定儒学为一尊，但说到几百年的官派儒学统治带来的结果是‘六籍无人亲’，这等于最严肃地痛斥官派儒学，也和秦始皇一样，毁灭了真正的儒家和孔子。”

从这个论述中，我们可以见出先生心目中的真儒形象。陶渊明虽生于谈玄之风甚炽的晋代，本心却追慕先秦儒家的道德理想。他说“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似孟子所言：“在我者皆古之制也。”他吟咏道：“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正是对孔子所云“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认同。他诗中所唱“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齐业，闲咏以归”，亦是对先贤“浴乎舞雩，咏而归”之潇洒风度的仰慕。他所立志的“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更是直奉孔子为师，力行清贫

而大道在心的生活。

先生举陶渊明为楷模，来表达他对中华文化价值的认同，对先贤崇高人格的尊敬。因为陶渊明的生活态度是一种追求精神自由的态度。他不假清高以博风雅之名，也非“托怀忘情，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而是真正胼手胝足，躬耕垄亩的在野之儒。他胸怀高远，坚持儒家先贤所倡的理念，穷不坠志，难不屈节，虽乞食亦乐在其中；看似避世高蹈，实则民忧满怀，恬然南山之望，却不忘精卫之魂，傲对显宦贪夫，亦不失百转柔肠。“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这是何等深情的吟咏。诵诗怀人，这样坚贞高洁之淳儒，后人能不追慕？

先生追慕前贤，并非空发怀古幽情，而旨在说明：人类的道德理想，无分古今中外，实是一以贯之，它既在“久远”，又在“手边”。陶渊明斥魏晋乱世为“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千年后又何不如此？先生以陶渊明的诗句，来阐发唐君毅先生那条“通往至真、至善、至美的世界的道路”：“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日入群动息，归鸟静林鸣”。先生说，“这是人路历程，亦是天路历程”。

先生追迹古远以昭当下，实因先生认定了“人性的永久性”。他说：“当人性或生活，乖离其永久性的时候，不能不怀昔以思今，不能不对古、对旧、对昔有所恋……比较过去，而觉有不如过去之处，这正是人类在在永久性的表现。人，也因为有此永久性的要求，不得不注重过去、现在、未来。”

先生在论唐君毅先生的著作时曾说：“唐先生的哲学中有人，唐先生的人中有哲学。”这亦是先生“夫子自道”。一九三二年，先生作《歌德对于哲学的见解》，在详论歌德与斯宾诺莎的关系之后，又论及康德与歌德的人格，先生说：“我觉他们有一大特点值得我们模仿，即他们对于真理或理想之忠实。……今后我们认识西方大哲，均从他自己的人格下手。我以为要了解西方精神，除了此法，也万难找另一条更通畅的路。”先生终其一生坚守他青年时立下的誓言，先生治学是把他的心放到思想中的。

先生思考的领域是价值的判断与实现，是“应然”与“何以然”，它恰是韦伯“价值无涉”论的反例。一次与先生论及韦伯，先生说“我与韦伯的‘价值无涉’无涉”，后大笑说，“这并不说明我与价值无涉”。先生的这个玩笑其实已经指明了韦伯论断的不周全，它是阻挡政治说教的浊水涌入课堂的堤坝，但却不应是阻断思想与灵魂相通的藩篱。先生说：“有人说，理论著作，只有深浅之别，不会有哭笑之声。我

回答说，也许我就是这么糊涂和不懂事吧。”先生明白，在“小聪明”面前，大智慧总显得“糊涂”与“不懂事”。看看先生景仰的苏格拉底吧，以常理观之，他又何尝不糊涂？为了坚守信念之“真”，行为之“义”，他竟然放弃了生命。色诺芬赞叹道：“有什么样的死比这样最英勇地死去更高尚呢？有什么样的死比这样最英勇地死去更幸福呢？有什么样的死比最幸福的死更为神所喜爱呢？”

先生毕生读哲学，推理、论证这些理性惯用的方法本是先生自家活计。但先生却常说他一生都在学习哭和笑。“我在学哭，也在学笑。但哭笑都学得不好。我羡慕莎士比亚对法斯塔夫的笑，羡慕达·芬奇所画《蒙娜丽莎》的超善恶的笑，同时也向往托尔斯泰听完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和读完法国拉波埃西的《自愿奴役论》后的哭。我要学他们，怎么也学不到，不过我仍要哭笑。”

先生并非不重视理性，只是见到它的局限，不能不寻找补救的方法。先生关注道德哲学，以为救社会先要救人心。却见到随人类进步，人的野蛮性却并未随之消弭。尤当先生看到“自古以来，那些用‘莫须有’理由而直接或间接杀了千千万万无辜人民的人，有的还被称作是‘最大圣哲’、‘民族救星’”，先生心痛。他问：“我们在‘宇宙’或‘现代’这两本大书上，读到这种篇章，能不凄然落泪吗？”先生反观



士林，却看到：“古往今来，常有人在高台上向群众大声激昂地讲经书、背条文，深刻玄妙。而我总爱低着头，看看他们的心胸是否也有跳动？不幸，我常常是失望的。有些人的话，每每不是从心坎里发出的，只是从喉管发出的。”先生寂寞了。

但先生并未沉默。近些年，他深感社会公义不彰，便不停地为草根民众疾呼。他苦口婆心地劝告那些权势和金钱的主人：“你如果否认他应得的一切权利，或者，他谦逊，你却认为他是低能可欺，他即使不立即报复，垂头一声不响，但谁也不能阻止他心中的愤怒，急盼你大难到来。”先生仿佛听到远古先民的声音“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这不是“出自喉管”的嗫嚅，而是出自心田的呼喊。在火中烹油、锦上添花的繁华盛世，先生的声音似旷野中的流风。先生依然寂寞。

二〇〇七年，先生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先生已九六高龄，却依然疾言厉色，抨击士林腐败，力斥名、利、权当道的乡愿行径“毒害青年”。先生对时下的风气近乎绝望，他说：“现在的时代似乎不是做学问的时代，做学问的人没市场，没有学问的人满天飞。这不是出人才的时代，而是毁人才的时代。”不怪先生愤怒，当下的士林已远不是先生那一代人在青灯独守、古卷常翻中凝练出的沉静深邃。

三十五年前，我由先生领入哲学殿堂。那时，先生知我

不过是个半文盲的小青工。但先生尊先贤遗训，“有教无类”。先生教我，一无功课，二无课题，只告我应读之书，读后向先生复述内容及我的理解，有不解处由先生点拨。在亲炙先哲典籍的同时，先生将正大的思想、纯正的品位授我，如时雨润物，化而无声。先生爱希腊，也只因那里曾有思想的尊严。这尊严自生自足，从来不需权势者恩准。正像维柯在他的大学开学演讲词中所引彭波尼的话：“凯撒，您可以给人民以公民权，却不能给人民以语词。”我从先生处学得珍视语词，便是从先生处学得珍视思想的尊严。只因小子愚钝，不能贡献学术而愧对先生。

记得在那些阴晴不定的日子，先生曾闭门读放翁，并集放翁句抒发心怀。他曾手书一联授我：“独吟古调遣谁听，聊与梅花分夜永。”我牢记心头，常暗自吟咏，体会古今圣贤的寂寞。但亦惟在此寂寞中能踵武前贤为己之学，而后为天下之学。此或可告慰先生。

## 读神与缺席——为志扬文集而作

我要到处颂扬美，不管我

在哪里看见它！

——巴乌斯托夫斯基

傍晚，站在退潮的海滩上，海浪轻轻涌来，打湿我的脚，弯腰想抓住它，它却卷着浪花匆匆逃逸，逃回海洋深处。与志扬相交的往事，就像这海浪，涌上来，濡湿我的记忆，又逃走，隐身在时光的黑洞里。与志扬相识已三十五年，眼前的这些文字像闪烁的光斑，在记忆的黑洞里标识着路径，凭借它们，可以打捞出往昔的痕迹。这些熟悉的文字，有些曾

激起我们热烈的讨论，我珍爱它们，更珍爱围绕它们的那些争执；有些却埋藏着我们心底的伤痛，因为萌萌当年曾在电话中把它们读给我听，而今音犹在耳，人却重壤幽隔。“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我想试着抓牢这些大江边的记忆，再不让它们逃匿。



20 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哲学所《国内哲学动态》工作。那时，思想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经历了“文革”十年，全民“兽性大发”，一些有头脑的人开始痛定思痛，考虑起“人性”问题。突破口首选马克思著作中的人道主义内容，马克思本人从黑格尔那里借用的“异化”概念尤为人关注。当时借调到哲学所美学室工作的高尔泰先生交给我一篇文章《异化辨异》，我在《动态》上编发了这篇文章。这是当时国内对异化问题最早的讨论。文章刊发后不久，我收到一篇文稿，寄自

武汉，署名墨哲兰。作者依据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力驳高尔泰先生对异化概念的诠释。文章中可以见出作者很熟悉马克思的《手稿》，对异化概念也有很深入的理解，论及《手稿》的结构如数家珍。作者的文字也颇有个性，行文铿锵有力，甚为雄辩。我还注意到作者使用了一种薄薄的绿格稿纸，落笔力透纸背，稿纸几乎被笔锋划破。我很快编发了这篇文章，并给作者写了信，希望能够把讨论深入下去。

作者回我热情洋溢的信，同他文章的犀利相比，信写得平实朴厚。我才知道，作者真名张志扬，墨哲兰是笔名。随后就是频繁的通信，先是谈稿件，谈编务，后来开始谈思想。虽素昧平生，却宛若老友，思虑多所契合，有相见恨晚之慨。在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信中，志扬写道：“你对一个素昧平生的远方的陌生人，仅凭着人的信念，就对我文章的每一个字都感受着同样的呼吸和脉搏，你一点也不曾怀疑这样的文字会有狡诈和欺骗，因为事实上‘人’才是我们的国际歌。”志扬在“人的信念”四个字下面加注黑圈，以示突出。我知道，那时，他是从彻底人本学的立场考虑问题。他断言：“我必须在横逆面前承担自己的罪责，以便挺身为一自由人。”在民族痛遭横逆惨祸之后，还有什么字眼比“自由人”更能燃起心火？可是尽管在信中谈得契合，我却全然不知志扬是个什么样的人，多大年纪，学什么出身，家庭背景如何。

八二年暮春的一个下午，有人敲炒豆胡同老宅的门，我起身应门，眼前是三位生人，两男一女。女子生得秀丽，微笑时露着浅浅的酒窝；两个男人，一位身材敦实，面孔黝黑，像刚从大田收工回村的农民；另一位高身量儿，宽肩窄腰，面白皙，黑发中分，一副艺术家范儿。那女子怯生生问：“赵越胜是住这儿么？”我忙答：“在下便是，诸位找我何事？”后面那位汉子忙开口：“我是武汉张志扬。”声音浑厚，有胸腔共鸣，是个男中音。我大惊，与志扬通信几年了，他从未透露过要来北京找我的意思，人却突然就在眼前了。慌忙让进屋坐下，志扬给我介绍那女子是鲁萌，男子是她丈夫萧帆。已不记得当时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志扬不大开口，静静坐在一边，始终微笑着，满脸喜悦和满足。我仿佛主要在听萌萌讲故事。从她口中，我知道武汉有一群追寻着真理与艺术的人。她提到武大哲学系的邓晓芒，武汉艺术学院的尚扬、皮道坚。萧帆时不时插上几句补充。八十年代初，全国到处有这样的“团伙”，几个爱读书、勤思考的青年“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却无由以鸣，只能独自蛰伏黑暗，内心何其渴求寻找同道，以证“吾道不孤”。当时嘉映黑山扈小屋的定期讨论会，正是北京弄哲学的学子“团伙”。我大约向他们介绍了北京的朋友们的情况，因为志扬走后不久的来信中，就急切地说：“很想见见你的朋友们，别忘了把你们的聚会简单叙述一下。”

四个人坐在那里，谈话的却是三人。志扬很少开口，我们偶尔交换一下眼神，一切尽在不言中，似乎在尽情享受故友重逢的喜悦。其实我们只是初次见面，却仿佛失散多年。与志扬相交长了，才知道他的笔比口顺畅，每次交谈，他总是长时间沉默着，脸上甚至会出现痛苦的表情，像火山在地下积蓄着能量，然后突然开口，沉郁的男中音带着威严，表述也极有力量。后来才知道，这是因抗拒长时间的提审而养成的习惯，以致这“沉默的权利”竟成为他苦思的一个哲学命题。这种在“六面墙”中砥砺出的坚毅，成为他的护身符，因为“只有它才能建立起与墙毫不相干的纯属自我的空间”。

志扬走了，虽折柔条过千尺，心中却仍怅怅。但很快就收到了他的信，信中说：“康德是个惯于自我节制的人，所以他有权讥讽柏拉图的理性像一只在真实中鼓翼奋飞的鸽子。生活的抑制，或确切地说，这充满抑制的生活，也使我的想象力特别有力，以致这样短促的北京之行，我原不打算去见你，想故意与自己的期待心情作对，还是按捺不住，去了，挑起了这样强的愿望，使匆匆归途满载遗憾。”志扬遗憾时间匆匆，我们没有更深入地交谈，其实我自己也常有这种感觉。几个好友朝夕相处了几日，分手后，脑中却一片空白，不知这几天不停顿的谈话究竟说了些什么。后来习惯了这种感觉，像品尝窖藏多年的好酒，那陶醉的感觉是慢慢上来的，来得

缓慢才扎实。未承想几个月后就有了和志扬畅谈的机会。

## 二

全国现代西方哲学讨论会定于九月中在庐山召开。我奉命先赴武汉为北京与会者准备往九江的船票。行程一定便急告志扬，他回信说去接我，约会地点在大东门。火车到站时刚下了一场暴雨，到处泥泞。出站一眼看见志扬站在门口，见到我，他急步跃过几洼积水就到了面前，扯过我的背包就往外走，说：“回家去，嫂子在家等呢。”那时，他刚搬到水果湖湖北省社科院宿舍，一座六层红砖楼房。刚完工，水泥灰浆味新鲜刺鼻。我推门进屋，见小门厅权作饭厅，一张小圆桌摆满菜肴，香气扑鼻。我还未回过神来，里间走出一个娇美女子，生得小巧秀丽，看上去很年轻。我一时恍惚，想志扬的女儿已这么大了，志扬却忙介绍说这是你嫂子慧超。我暗惊，想志扬除了读书弄哲学，还有金屋藏娇的本事。慧



超嫂亦是不多话的人，只款款问声路上累吧，又说志扬一早就等不及，提前好几个钟头就去车站了。志扬又从厨房扶来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婆婆，双手湿湿的，显见正在厨房里忙，不用说，这便是志扬的母亲。伯母开口说了些什么，大约是湖北方言，我是一句没懂，只见老人手指饭桌，要大家入座。此时门又开了，是北京见过的萌萌，和我打过招呼就和伯母用湖北话说个不停。我横竖听不懂，坐下吃饭便是。首先放到面前的是一碗排骨汤，萌萌介绍说武汉的排骨汤特点就是浓厚、油腻。果然碗面上几乎全让油盖住，入口仿佛在喝油。而这正是武汉人待客的正宗，情谊正如这汤，浓得化不开。伯母坐在我身旁，眼睛不离我的碗，见我喝得不畅，又说几句，虽不懂，但能觉出语调的热切。这热切让我端碗大啖，汤入口，似柔软的固体在嗓间蠕动，缓缓地滑下。见汤尽碗空，伯母满意地起身，又摸摸索索地回厨房操持了。

志扬是独子，伯母极宠爱他，爱屋及乌，这宠爱也扩展到我自己身上。凡我到武汉，老人家总是呵护有加，我虽从来没听懂她对我说什么，但原本爱的传递就不靠语言。它融化于伯母日常的操持与呵护。温情与柔爱构成生存世界，日常操持又构成温情与爱。这牵挂甚至漂洋过海。九五年底，志扬来巴黎，带来一只酒红色的布老虎，是伯母亲手给盈盈做的吉祥物。做工虽不甚精细，但朴拙可爱，粗针大线绣在虎身

上的花纹不规整，见出伯母的巧手因年事已高而不听使唤。伯母临终前的情况，志扬从未向我提及，但我在书中读到他的逐日记载的老人临终前的行状。这记述如绵绵秋雨，洒落在我心上，唤起往日记忆，清澈又凄凉。伯母几次对志扬说：“我没用了，做不动了。”看到这话，我不禁热泪长流。在伯母心中，她的生存意义就在一个“做”字上。其实这个“做”就是伯母一生的奉献，唯无己者视奉献为有“用”，但以“无用之用”视之，则无论伯母“做”与“不做”，她那深厚广被之爱已是生存本身的意义。愿伯母在天之灵永享安宁。

### 三

在武汉偷闲几日，志扬要带我见识武汉三镇。早晨八点志扬就来旅馆招呼我出行。在路边小摊上饱吃一顿江米醪糟煮汤圆。志扬带我“拜码头”，见了武汉各路英雄好汉，尚扬送我一只他手捏的汉俑，憨态可掬。在尚扬家里，亲眼见到

武汉“团伙”中的那些“热血青年”，为一件作品、一种感觉、一个想法争论得面红耳赤。中午时分，尚扬要操持做饭，志扬却执意拉我走，用我听不懂的湖北话和尚扬讨论了一阵，尚扬便不再坚持。在武汉“团伙”中，志扬似有一种天然权威，不大说话，却“不怒自威”。随着志扬东转西绕进了一条小巷，志扬让我稍等，他闪进一座小楼，一会儿下来了，笑眯眯地说要带我去吃四季美汤包，说是武汉名吃。说话间，到了一条繁华大街，“四季美”的大招牌赫然醒目。入店坐下，志扬便问我要吃多少。像我这种扛长活出身的，张口就要半斤，想是不多。志扬却踌躇了一下，说先来三两吧。我想这玩意儿很金贵吗？汤包端上来我明白了，所谓“汤包”就是包子馅泡在一汪油中，吃一个包子几乎就是喝一大口油汁。别说半斤，二两就糊住了。志扬坐在边上始终不动筷子，见我吃不动了，才吃了两只，然后得意地说，我就知道你吃不了三两。很久以后，萌萌才告诉我，那天他带我离开尚扬家才想起身上一分钱没有，急中生智去了皮道坚那里，让我等在楼下，上楼找皮道坚借了五块钱，后来他告诉皮道坚，请我吃汤包花了两块五。

长江边上的天气乍晴乍雨，早起出门，跟着志扬登龟蛇两山时，阳光灿烂，山脚下长江浩荡，金波粼粼，只是再不见孤帆远影。烟雾迷蒙中，武钢巨大的身影隐现。和志扬沿

大桥过江，两人大发怀古幽情，诵起“昔人已乘黄鹤去”时，志扬说正有人建议重修黄鹤楼，但愿不要成真，否则心中残存的那点儿远古的想象就被彻底打碎了。下桥时天气大变，江风裹着水滴打在脸上，乘轮渡返回汉口时，江面上疾风劲吹，浑浊的江水波澜大兴。下船行百余米，志扬指着不远处陋巷中一片密集的棚屋，说那边就是民权路，他就成长于路上的黄皮街。志扬后来在书中写道：“在我的记忆中，我没有故乡和童年……只有一条破旧的小街，挨着河边。它的居民，至少有半数挑码头的苦力。”志扬的父母是再朴实、温厚不过的底层民众，但志扬的父亲早年却做过码头上洪帮的“头佬”，想来是条行侠仗义、扶弱济贫的好汉。新朝初立，当了码头工会主席，时间不长，似是得了什么预感，辞职藏匿起来，算是躲过了血雨腥风，得全身于乱世。以志扬的出身，家里几乎没有任何可能让他耽迷于哲思和唯美的天地，但两位老人天性中的善良意愿，就是滋养智慧与美的厚壤。正如康德所说：“善良意愿之为善，并不因它意欲促成和实现什么，而仅因为它就是善本身，它天生就有自身的尊贵。”何况神意任性地播撒美与智的种子，这些种子大半死于枯涸的心田，但它也会偶然落入丰土沃壤，碰巧有雨露滋润，就生根、成长。《诗》云：“瞻彼淇澳，箴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志扬这位江边上长大的孩子，就是这样自我磨砺而成的斐然君子。

志扬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无数个黄昏，流水一样逝去，但命运却挑中那个黄昏。这天，暮色降临时，他听到操场对面小食堂里飘来一支提琴奏出的旋律，美得动人心魂，不知何曲，姑且名之“无名”。“无名天地之始”，正是这“无名”为志扬“敞开”了音乐天地。透过黄昏橙黄的光，他依稀看到有个天国，他要进入这天国，明知路上布满荆棘。为了买一把练习用琴，志扬拿出全部业余时间来打工挣钱，拖瓜，送煤，一架板车竟成了进入天国的华辇。他告诉我，最吃力的活是拉砂石，板车在码头装满砂石，拉到堆场，路上要爬个大坡，双手紧持把，肩上套上纤索，一个坡上下，肩膀头勒出血印。就这样干，硬是攒出钱，买了一把工农兵牌小提琴。我知道这琴，基本上调不准音，琴声刺耳，我称它是“三合板琴箱”。但志扬视之若“斯特拉第瓦利”，每天收工回家就吱吱呀呀地拉，硬是拉完了整本《开塞》。后来志扬拜了个老师，每周一堂课，每月八元学费。老师教他的是基本功，上弓、下弓、臂平、腕松。他不知道志扬的音乐感受早就和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列奥尼德·柯岗一道儿了。工作的繁重，让志扬无余力挣出这八元学费，有时交晚了，老师就给脸色看。于是，退学，满心的失败感，久久不能释然。其实志扬不知他早就进了音乐天国，他是不循路径，直入门墙，一弓一世界，一曲一天堂啊！我不能想象志扬那笨拙的手指如何挣扎着在纤细的琴弦上跑动。那不是他拉琴，是琴拉他，

是音乐的精魂拉他飞升，直入美幻的天国。他的学琴生涯开始时，老师告诉他，他拉的那支曲子叫《耶路撒冷》。

志扬去音乐辞典里查，没查到这曲子。我猜莫不是那支被称作“金色耶路撒冷”的犹太古曲？这曲子后来作了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主题曲，帕尔曼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过它，拉得满场唏嘘，一支咏叹犹太人苦难命运的曲子。志扬似和这曲子有命定之缘，曲中所悲歌的迫害和苦难竟成了他命运交响曲的前奏。

## 四

返家途中，电车行经一处建筑，高高的灰色围墙，上面有电网。志扬在我耳边轻轻说：“这是武汉警备区的看守所，我在里面坐了七年单身牢房。”话带着克制的平静，脸色却大变。他在《墙》中写过这段经历。让我惊异的是，他把狱卒的残酷和维罗纳晚祷的钟声放在一起，同时感受凶残与凄美。

士兵的皮带抽打在他的右脸上，“后颈和右耳火灼样的热辣，刀刮般的撕裂”。这种遭遇引起他思索的却是“真正惊人的美，会有一颗期求极高的心灵。它向生活要的东西太多，这是它天赋的权利”。而“丑，是生活忍受痛苦和不平的被扭曲的印记。它正是爱的阳光理应普照的遗弃之地，因而也是美的自我完成”。他把毒打他的士兵看作一个反思的对象：“你看我抚摸我的伤口时，还在忧虑，他们经受得住这种暴行的腐蚀与毒化吗？”

初读志扬的文章，感觉他的文字极有力度和韧性。即使是论述问题也带有辩论的味道。这辩论并无对象，仿佛是自己左右互搏。待知道了他的经历，才明白他的很多思索来自冰冷坚硬的“六面墙”中。他一旦与人辩驳，无论是和高尔泰先生还是和朱光潜先生，都有点抓住不放、不依不饶的感觉。爱德蒙·威尔逊曾评论马克思与人辩论，“一路鞭打到底，丝毫不肯放手”，志扬于此庶几近之。这固然因为志扬是从读马克思入手，又通过马克思浸染了黑格尔的风格，但更重要的是七年单身囚禁的经历。面对光秃秃的水泥墙，除了在思想上和论敌厮杀之外，又能怎样呢？甚至还要以自己为对手，拼命鞭打，遍体鳞伤亦在所不惜。别人的思索来自书房，志扬的思索来自牢房，因此，当他从牢房进入世俗的学术圈时，他从不得意于一孔之见，相反他永远怀疑自己思索的意义，

甚至常常惶恐。他在信中谈到这种惶恐，“写到后来，竟出现了这样可怕的冷漠，我几乎要对我写的每一个字问：‘什么意思？’”在提审室里，他不开口，那时他充实，得意于享有沉默的权利。而当他能开口，却感觉空虚，焦虑于思想的意义在流失。

“犯人就不是人，是狗”，这是狱吏给志扬上的第一堂课。那时他还没读胡塞尔，更不熟悉现象学。但他却体会到“时间的悬置是真正的还原，吃饭、拉屎、睡觉”。丰盈精致的生命被还原为简单的生物反应，人性被还原成基本的动物性。在此际遇中，什么东西能呈现人的尊严？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犯人转监时塞给志扬两本书，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巴黎手稿》，卢森贝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这两本书救了他，使他“从胡塞尔回到笛卡尔”。狱卒的提审、毒打、单身囚禁似乎只关涉他的“动物性”一面，他的精神却漫游在精神的国土。他反复读这些书，书中的文字仿佛被他咀嚼烂了，和血吞下。就这样，因“我思故我在”的确证，他保持了人之为人的尊严。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首读志扬的稿子，觉得那一行行文字像罗马军团列阵，士兵们呼喊着重投出的标枪。

茨威格写过《象棋的故事》，讲一个被单身囚禁的 B 博士，如何因一本棋谱得救又几乎疯狂的故事。志扬在牢里得



到的那部《巴黎手稿》就如同 B 博士冒死偷来的那本棋谱，而 B 博士不过住了几个月的单身牢房，而志扬一住就是七年。看志扬批驳高尔泰先生的文字，能想起 B 博士出狱后，在船上与象棋冠军对弈的场景。B 博士拿起棋子就发抖不能自己，志扬文字中也洋溢着抑制不住的激情和快感。其实，志扬是个多么温和朴厚的人啊。志扬给我看过他给慧超嫂画的肖像，那是他在狱中用钢笔画的，娴淑静美的慧超竟被画得头发如钢丝般竖起，脸部肌肉扭曲，双眼流出恐惧。这显然是志扬把自己当时的感觉投射到慧超身上，才有如此变形。七年单身囚禁，要多么坚强的神经，人才不会疯掉！之后，志扬思道求学，永远摆脱不掉这个背景。

八四年九月五日，志扬给我信说：“哲学界的一些朋友越来越重视语言问题，其中少数人对‘不可言说性’极为关注。可他们是在做学问中做出来的，而我是在生活中备受它的折磨而为求解脱才去不得不做的。”“不可言说性”在志扬那里首先不是个哲学问题而是一个生存问题。提审员凶神恶煞地向他“逼供”，他首先想到的是捍卫沉默的权利。如果沉默是保有生存的基本条件，这背后一定有着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意义。随后志扬明白了：“我再也无法逃匿了，踏上思之途，而思在超越，它太险恶，太艰难，是无期的苦役。”这个“险恶之途”绝非海德格尔所说的“运伟大之思者必行伟大之迷途”，

而是自由精神在凶残昏昧之地面临的直接危险。可怕的是而今国朝智士假装不再有这个危险而说个不停。他们全然不知斯坦纳早已指明：“有些精神行为扎根于沉默。它们难以言说，因为词语怎能正确地传达沉默的形态与活力。”

志扬思考不可言说性，八十年代中期关注维特根斯坦。但他思考的源头却不是纯语言哲学的问题。倒不如说对语言问题的思考把他引向生存论的深处。他的独特经历使沉默自然地成为思考对象，它契合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对不可言说者，只能沉默”。此何以故？斯坦纳以为：“集中营的世界，是在理性的范畴之外，也是在语言的范围之外。如果要说出这种‘不可言说’的东西，会危害到语言的存在，因为语言本是人道和理性之真理的创造者和承载者。一种充溢着谎言和暴力的语言，不可能有生命。”如果说斯坦纳是从欧洲现代史的角度赋予沉默以文本学的意义，志扬却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的角度，通过把“沉默”转换为“缺席”而赋予沉默以人本学的意义。

作为道德和自由承载者的个体如何生存、选择？志扬试图通过申彰个人“缺席”的权利，避免个体的撕裂，使个体仍有可能在“基本善”的范畴内，保有整全。“所谓缺席，就是不参入认同共识，不接受认同共识的根据及其价值判断，为了新视野的开拓，为了与神共居的空间。”因为“个人不仅

可以对政治、社会及其意识形态要求缺席的权利，而且对公共语言也可以要求缺席的权利”。处于奴隶状态的个体无所谓言说，“缺席”就是他保有个人尊严的惟一方式。

但是，“缺席”在什么意义上不是逃避呢？如果“你被强行置入一个既定的封闭环境中不得不接受非此即彼的拷问，要么承担责任，要么放弃责任，你必须在价值的好坏、善恶、美丑之间作二择一的取舍。这时你能对生活、对社会要求缺席的权利吗？”志扬的这一问，颇似“苏菲的抉择”。但在我看来，决心“缺席”已经作出了选择，它内含着理性的“天命”，独立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同时，它也意味着个人是伦理责任的承担者。在这个问题上，从康德到萨特，所论虽异，实质同一。缺席于众声，便选择了独见；缺席于迎合，便选择了批判。勇敢的思想者不会泯然于宣传机器造就的“共识”，在他看来，这只是本真生存“遮蔽”于言词的“欺瞒”。后来，志扬更明确地界定缺席的权利，把它限制为“‘缺席’的权利是知无的有者的自保能力，它并不一般地抗拒有，而只是抗拒有的无限僭越的垄断”。这个黑格尔式的表述有点绕，但我理解他是把“缺席的权利”当作造就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必要条件。我宁愿把它当作知识人的品性。如阮步兵《咏怀诗》所言：“云间有玄鹤，抗首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

我喜爱志扬书中的一段话：

亲人友人所给予的理解和爱，像生活的常青树环抱着灰色的理论，为了让密纳发的猫头鹰在夜幕垂降中唱起森林之歌……

但有一只猫头鹰飞出了森林，它听到土拨鼠的声音，田野上一片寂静。

凭借大地的守护，土拨鼠像是另一世界的使者，松动板结的大地之光。

我喜欢猫头鹰，但我是土拨鼠。

## 五

志扬总提起东湖，说那里景色奇佳，颇值一游，又说，他的许多想法是在东湖边散步时有的。但杂事繁多，直到上

庐山的前一天傍晚，才被志扬拉到东湖。九月下旬，秋声初起，湖边荷田已不见盛夏的热烈，秋风暗剪荷衣，败叶褴褛。湖边几不见游人，一岸晚树婆娑。在我记忆中，东湖并不是个公园，而是一片清旷辽远的水面。暮霭中，珞珈山映衬在这空阔无际的沧浪上，似虚似幻。山上武大的老校舍飞檐斗拱，琉璃瓦白绿相间，海市蜃楼般隐现云间。岸边沙石小路纤秀蜿蜒，湖上薄雾乍起，飘渺侵路，沿途信步，若登云梯。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贤主嘉宾，竟真是个“四美俱、二难并”的时刻。

在武汉这几日，与志扬谈得深入、细致，也看了他的一些手稿，发现以往对志扬思考方向的认识有些偏。他固然从马克思反溯黑格尔和德国古典哲学，自己亦自诩为“青年黑格尔派”，而心中最牵挂的却是美学。他告我他出狱后下功夫啃的书是黑格尔的《美学》。这个外表冷峻、文字犀利的汉子，内里却是一腔柔情，对美的感觉敏锐细腻。艺术领域的各个门类，他几乎都关注，尤对电影格外用心。他青年时曾梦想做个电影人，六十年代初就动手改编电影脚本，寄给专业人士，也得到过正面回应。但那是个什么年头儿啊，志扬的梦像达利的画《荷马的殊荣》，一派变形的荒诞。

命运的坎坷，未曾消磨志扬的向往，甚至在监狱里，他也从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中挖掘审美的意义。他从巴乌斯

托夫斯基那里得了一个誓言“我要到处颂扬美，不管我在哪里看见它！”男人若爱美到了极致，常常要靠哲学来救赎，这几乎是宿命。他在艺术品面前，甚至在艺术化的生活中感受着激情，为一幅画、一支曲、一阙诗神魂震荡、匍匐颠倒，泄露出内心的柔弱。他不甘于此，他要把握住这种在感觉上彻入骨髓，在知性上却无法道明的东西，唯有依靠理论形式，用言说的逻辑、概念的盔甲把奔逸之美纳入论说的结构。他们凭此交流美，也扼杀美，甚至拉斯金论绘画，勋伯格评音乐，尽管已是此中翘楚，也让人觉隔靴搔痒。济慈认为“美是真”，而这两种困境更证明“美是难”。

沿湖畔曲径缓行，与志扬谈得酣畅，记得志扬讲到朋友之间诵读自己所作的好处，说萌萌特别重视这个方法，她写诗总要在朋友间先读过。我知道萌萌的这个习惯，她常在电话中给我读一段她得意的文字，或是她自己的或是志扬的。其实我们先人本就颇精唱和，“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求的就是知音。欧洲文艺沙龙中，为朋友朗读、与朋友切磋更是常事。志扬说他曾朗诵过自己改编的电影剧本。我想志扬那浑厚的男中音，朗诵起来一定极有味道。说起改编剧本，志扬就提起《死于威尼斯》。依他的看法，剧本和小说差得很远，演员的表现并不出色，只是电影音乐美得不得了，似乎整部电影全靠音乐支撑着。

志扬似乎不知道这电影音乐就是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乐第四乐章《柔板》。八十年代初，马勒的音乐在中国尚未普及，熟悉的人不多。我便给志扬介绍了马勒其人其乐，志扬听得入神，说这音乐凄迷美艳，让人想不到是交响乐中的乐章，拿来配托马斯·曼的作品实在是天作之合。话头转到音乐，我不觉说得兴奋。其实音乐也是志扬心中至纯至柔的一隅。志扬问我，马勒这个乐章婉转缠绵，柔肠百绕，他的整部作品又如何收束？志扬担心一部作品当止不止会使整体结构漫漶不清。我为马勒辩护，说他的渲染并不空疏，实在是内心感受太丰富，想说的太多。但整体上，他的作品是严谨整饬的。我说他也善写 Lieder，每一曲皆如珍珠般精美圆润，其典雅、收束绝不在舒伯特之下，并随口哼唱了几句《悼亡儿》。志扬突然停步，似被这几句歌调击中，脸色因激动而显赭红，仿佛青涩少年偶遇暗恋的女子，颇有些手足无措，说“我不知道这些歌，我们唱的都是苏俄歌曲，你回去后一定要寄些马勒的音乐来”，话说得急，竟有些口吃。我被他打动了。只有真正懂美的人才会从几句歌调中感觉到一个新世界。随后两人不再说话，言语已随马勒音乐的余音远去，静默中只听脚下沙石作响。

天色向晚，万顷琉璃上薄雾氤氲，湖畔亭中有人吹萧，呜呜咽咽。聆听片刻，箫声愈发凄切，不忍久留。

翌日上午，我们登船往九江，志扬来码头送行，上船后，我见志扬仍在栈桥上未走，江风鼓荡，志扬衣衫飘举，长发散乱，不知怎地，心中涌上元九的诗句：“江花何处最肠断，半落江流半在空。”

待下山回京，志扬的信已在家中等候，信中只有一句话：“大地、暗夜，只有脚步声。”

## 六

从某种意义上说，志扬是个为思索而生的人。但是命运多舛，他一直未能进入他所喜爱的领域。因为家庭原因，他莫名其妙地入了农机系。但这未必是坏事，哲学又岂是学出来的？数数古今中外大哲硕儒，有几个是“哲学系”出身？正因此，志扬常有出人意料的思考角度。他在给我的信中记述了嘉映和他的一次谈话，提到嘉映正苦于寻找自己的语言。他问我：“我的语言表达是不是太‘自我’了？”我并不这样



看，但也注意到他的语言风格同一般陈辞滥调的哲学论文不同，句子充满了内在的紧张，能觉出他的殚思竭虑。所以他的文字拙奥、厚重，有些沉郁，能看出早年受马克思黑格尔表达方式的影响。但是也会突然间笔势嶙峋、桀骜不驯。与人辩论，不耐婉转陈辞，单刀直入，不依不饶。志扬完全不会讲“官话”，为文就要像古人，求那段“精神命脉骨髓”，所以他常说“写得苦”。在写作《感觉的悖论》时，有一段思路不通，他写信给我说：“使我困扰的不是像沼泽一样可以灭顶的日常琐事的贪婪分割，而是苦于我偏偏要说一些我怎么也说不出东西。你要是看到我怎样地在纸上爬行，你会发抖的。”就这样，他不退缩，苦思苦写，竟至紧张到头痛发作，苦不堪言。他祈求能有一天头不再痛，“那就是天国了”。刘勰所谓“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在志扬那里是感同身受。不过，说到底，要文章中能有自己的那段“精神命脉”，写得苦怕不能免。贾长江“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境界，不正是我们的追求吗？

心里明白这是志扬的宿命，却也说些不关痛痒的话劝慰他。说想不通就扔下不管，读书为文抱着欣赏游戏的态度会救治写作的紧张。一次，我以诗的原始性和超越性为题，和他讨论“放松”在欣赏和创造中的作用。志扬回复我：“你保持着，甚至小心呵护着诗的原始性和超越性，而我的诗却混

合着世俗的冷与尘。我有滂沱之时，挟泥沙而俱下。但是，我的坠落，沉淀，还恋着我的天空、我的云彩、我的蓝色。这是我的召唤，我的希望，你不理解我的过程怎么能理解你的归宿？你理解，只是沉默着。”是的，我理解，只是心痛他执拗的耕耘。于是再回复他，让他小心七年单身囚禁留下的惯性变成一种自虐的执著。志扬马上回复说：“我知道我自己的命运，就像一个宿命论者，我顶多只是在巨大的存在面前显示虚无的否定力量，而把界限外的虚无留给勇敢的索取者。”

和志扬相比，我工作太不努力，每次交谈，志扬总会做记录，他存有许多讨论的笔录。他总督促我尽快把谈话中的思想整理成文，把对话中的火花留下来，而那时，我年轻，不知珍惜，不在乎灵感来去倏忽，将之随意抛撒。有时纯因志扬的“勒索”才写下片言只语，却不知丰饶的心田不加耕耘亦会变得贫瘠，杂草蔓生。志扬的宽厚总原谅我的轻慢。一次我揶揄志扬思诗与哲学，总不脱黑格尔式的涩与拙。志扬婉转地反驳我：“我不能说清我们相处交谈的感受，如果硬要找一种表达，我就说，你的生命时间绵延着人类优秀的文化，我的生命时间却满是芜杂的经历，因此，你面临的是向土地的回复，而我一生却在向天空拼命挣扎，像勿忘我草。”对我“游戏于艺”的态度，他尖锐地说：“你早就应该走出你

直观的对象性了。理解就是超越，你这个超越的理解者，难道被自己超越的理解惊呆了吗？”但是这些争执不能冲淡彼此所见相合的快乐。我译海德格尔的《诗人哲学家》寄给志扬，他几乎是句句点评，有褒扬，有异议。他最喜诗中两句：“林中树兮不相识，若挺立兮枝相扶”，说“唯独立而相承，多么真实的格言”。我寄文章《诗的智慧》给他，他回信，兴奋不能自己，“我读着，下一句竟猜到了。”那种不解自明、忘形尔汝的感觉，至今思之仍令人心动。

## 七

志扬切入思想的路径是人本学，这是拜马克思《巴黎手稿》所赐。后来，他的学术视野日益宽广，思考日益深入，但在我看来，他从来没有离开这块基石。他后来关注海德格尔，也依然是受存在哲学之人本主义倾向的吸引，虽然这个人本主义表现为存在论。他早期反思理性与自由，试图深入

理解马克思从异化角度探讨人性，人的自由的丧失。这仍是人本学的基本视角，所以我说他是启蒙思想的受惠者。他的哲学思考、艺术评论、社会反思，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九十年代初，他专门撰文《启蒙思想中死去的与活着的》，试图厘清自己的思路，对启蒙作一番省思。他以为“用‘人’忘记个人是中西文化第一次启蒙的通病”，似乎可以脱离启蒙思想来理解人本主义。其实，他提问题的方式仍守着传统启蒙主义的立场。只是在志扬那里，这个启蒙完全是内向的。志扬从来不以教育者的身份启“他人”之蒙，而只是坚持勇敢、独立地使用自己的理性。这本是严格意义上的康德的启蒙观。启蒙思想真正的变质，始于俄国民粹派，在“苏俄革命”手中完成。这一路的“启蒙”以“教育人民”为鹄的，最后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欺骗工程”。后来，他受现代西方一些思想家的影响，试图重思自己的立场，但是我相信，他逃不脱启蒙的光照。因为他早就明白，“启蒙应合理地理解为一个不断重现的解蔽过程”。他理解“福柯指出启蒙或启蒙哲学，不是一个永恒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态度，一种气质，一种哲学生活”。志扬用自己的话说得更好：“‘启蒙’不是许诺‘有’或‘无’，而是承担。首先承担的就是没有许诺中的个人真实性。”这个提法回到启蒙的核心价值：“个体的自由”。正是这个核心价值被那些启蒙的叛徒用虚假的“人民性”遮蔽了。

从这一视角看，启蒙思想所高扬的自由理性，是一切既定秩序、现存意识形态的永恒挑战者，志扬称其为“渎神”。志扬亲身经历过造神、崇神的社会狂热。以他思想的叛逆天性，心底总藏着“渎神的冲动”。“渎神”是自由理性醒来的第一个象征。他“天问”般地质疑：“亿万人的狂热难道真的浸透了宗教的虔诚？思想真的强大到统摄一切意志于一个目的中？多么大的神话。”这个质疑随后变为社会现实，楼起楼塌，神人不再，神坛上原是一群祸国元凶。于是，煽动起来的神圣感幻灭了：“原来那样坚实地支撑你穿过狂风暴雨的希望居然会在顷刻之间泡影般的消失殆尽，连同环绕着它的激情与血肉的长城。多么可怕的梦幻，不是它的虚无，而是它唤起人没有灵魂的行走的如白昼般的真实。”志扬问道：“为什么十亿人的民族竟会被几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达十年之久？”对此，他不仅反思，而且承担，因为我们不仅做俘虏，而且做帮凶。“我没有排除自己，我也是这场骗局的受骗者。”

志扬知道，参与造神、信神、崇神的大多是读书人，现在叫“知识分子”，古时叫“士”。志扬说：“士者，仕途之人也，或在，或准在，或想在，以‘修齐治平’为宗旨。即便到老白身，士的心态也仍然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既然文以载道，士亦载道，少不了从政心理。”这就指出了大多

数中国读书人的通病。他们从不“缺席”于社会统治。“学而优则仕”是天经地义。读书与做官，考场与官场纠缠一体，难分难解。九州之上至高者都是帝王，《书》中所赞“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是帝王，人间之神。从而崇神与崇权乃一体之两面。中国的读书人天生亲近官场，却不大在意那些抽象的精神探索。子路问孔夫子以生死之理，夫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曾子所谓“君子思不出其位”，亦把世人所思局限于身边切近实用之事。因为他们的至高理想是修齐治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结果，睿智如孔夫子见了君主亦不免“君在蹶蹶如也，與與如也”，“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素王见真王，如耗子见了猫。高洁如屈子，所怨所哀，徘徊不去者，终不离怀王一姓之事。“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反观西方大哲，却另有说法。西塞罗作《论义务》三章，把探求真理列为人的首要义务，他说：“追求真理和探究真理是人类之天性。所以，一旦我们从不可避免的繁忙事务中抽出闲暇，我们就热切地想看到、听到和学到新东西，并且从中引出为幸福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对一切隐秘的或神奇的事物的认识……不过在这种发现真理的激情之外，还要加上对高贵感的渴望，以便由自由所打造的完好精神不会屈服于任何人。”康德引封塔纳，“我向贵人致意，但我的精神不鞠躬”。他随后解释说，对身份低微的人，如果他身上有所缺乏的品质，则“我的精神鞠躬”。先

哲们所服从的是精神世界的法则，他们或被责为“象牙塔中人”，但社会若没有精神的象牙塔而只有权势的金字塔，就不会有精神生活的尊贵与高扬，亦不会有人的尊贵与高扬。人兽分界，仅此一线。

秦始皇焚坑之后，士人勇气几乎一举扫平，自此士人或得到权势，或附于权势之皮，数千年不变。四九鼎革，士林板荡，向学弱烛翻为洗脑狂波，不过一代人的时间，庠序同于官府，士子几如循吏。胁肩谄笑，如沐春风，山寨版的苏俄意识形态赫然显学，立官学，设博士，馈经费，奖滥作，蔚为大观。自由的理性若想挣扎出一条生路，委实困难。尽管人人皆知独立之人格、精神之自由是知识人的本分，但正像志扬所说：“做起来格外难，因为我们太害怕自己的有限性了。”在我们的精神资源中，缺乏献身于纯粹超验之事的冲动，缺乏以自己的有限博取无限之知的勇气，所以我们不向帝王要阳光，不向刀剑要圆形。而在第欧根尼和阿基米德看来，这却是至重之事，值得用生命换取。纵然如此，志扬仍要挣扎着抵抗那无处不在的“消融之力”。这力量无形中吞噬人的良知和勇气，并向你提供充分的驯服的理由。他说：

是，我要求缺席的权利，只要我有能力承担并超越  
我的要求所招致的一切后果。

## 八

二零一二年夏，我回国时，志扬和慧超嫂来看望我们。志扬携来《偶在论谱系》一书赠我，扉页上题辞：“越胜，这是大哥最后一本西学著作。三十年了，你是见证。”书从质询西方哲学缘起入手，对现代哲学诸巨子皆有论及，大有对自己的哲学探索做一了结的意思。难道志扬真要回到三十年前的构想，“用日记、笔记的形式敞开我的思索”，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想法。一九八五年，他写信给我谈到过这个想法，甚至都起好了题目《虚无与超越》，他说：“不要年月，不要对象，不要线索，兴到笔随，可以谈文史哲，可以悟《坛经》，可以谈诗画、小说、电影，可以反思日常琐事和重大抉择，可以悲切、沉郁，可以欢乐、遐思。凡是一个人，一个沉思者所经历的，或阅读、讨论、闲谈，或授课、聚会参观，皆可用。在无边的散漫中大概可以看到这样的沉思的精神，它携带着向将来开放的视野和不可重复的过去而前进。我所寻



求的作为内在空灵性和外在超越性同一的中介的心灵结构及其形式化功能，也自然潜藏其中而显露其外了。”多么值得期盼的书。可近三十年了，志扬著述甚多，却始终未能写成他心中最钟爱的书。志扬是笔勤之人，他不动手，自有他的理由。他还嫌体验不深，积淀不厚？他要尝遍人生百味，把生命咀嚼透才下笔？生活的体味何尝有够？我们的思索就伴随着我们的生活在世。那“入世操持”、“林中迷途”，那“烦”、“畏”不在在反映我们的生存意志吗？志扬缘何踌躇徘徊？《偶在论谱系》一书似乎给出了一点线索。

这部书称得上是呕心沥血之作。志扬从偶在论入手，试图把他读西方大哲的心路历程做一清算。其中精彩之见迭出，我两次读它，皆有深悟，亦有疑问。志扬劈头就问：“我凭什么相信你”，这是他“脑后反骨”的表现，这“脑后反骨”就是他的批判精神。为了确证自己“相信”或“不相信”的理由，志扬以奏鸣曲式梳理西方存在论的一个个主题。序曲呈示部引出他怀疑的缘起，随后在主题发展的第二乐章，以六个副题的回旋曲式呈现“阴影之谷”。在主题再现的第三乐章，以两部赋格曲倒影式进入，讲述偶在范畴与偶在现象。第四乐章尾声，回到他心心念念的向往，中国现代哲学。这是一阕贝多芬式的《命运交响曲》，还是一阕马勒的《复活交响曲》，我不敢断定。

志扬说他的目的在于“针对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学历来自诩的‘光照的清晰’和‘奠基的完整’，揭示出‘裂隙’与‘深渊’，以打破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整幻象’”。但我根本不相信有这么一个“完整幻象”。要说它的完整性，也仅存在于亚里士多德把它当作智慧看待。只有“智慧”才去探讨第一原理和终极原因。海德格尔的聪明在于他指出“形而上学史乃存在遗忘史”。而这个存在作为“人”之“在世”，本身就具有先验的整一。因为“在”或“本体”只能通过人的实际生存状态才能表达和理解。说“形而上学史乃存在遗忘史”，我们或赞同或反驳，但我们仍在哲学之内说话。而断言“形而上学史”不过是“意识形态史”，我就断然不能赞同了。

志扬反感西方哲学的“强势”，他颇有些愤愤不平地说：“凡西学皆普遍必然，即为世界性、现代性，凡非西学皆特殊偶然即为民族性、传统性。”他断定这是“启蒙以来推行的看法”。这次志扬拔剑，剑指形而上学和启蒙，但荒原之上“拔剑四顾心茫然”。形而上学为了避那意识形态的污名，早已遁逃无踪，只剩启蒙，像堂吉诃德面对的风车，耸立荒原。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故意的欺骗，是横暴不义的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所构造的谎言。志扬在书中指出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我甚至还想补充一点哈维尔的卓见。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伪称制度的要求源

于生活的要求。它让真实世界披上虚幻的外衣。但这与“形而上学”何干？我以为，哲人不欺瞒，政客才造谎言。

志扬从“形而上学即意识形态”出发，以为揭露这点即“意味着对启蒙的启蒙”。我在前面已指出，志扬以为启蒙“是一种态度，一种气质，一种哲学生活”。对“启蒙的启蒙”应该仍是这种“哲学生活”。但这恰恰证明，启蒙就是那束照亮世界的光亮，挥之不去，避之不离，连志扬的“阴影之谷”也因有这光亮。有光照才有“阴影”，否则世界就是鸿蒙未辟，一片混沌。志扬用以质疑启蒙的概念系统“偶在”、“存有”、“谱系”、“本体”、“界面”，恰是西方哲人发明的构件，用以构成思想大厦。这些哲人或是启蒙的前导，或是启蒙的战士，或是反思启蒙的后进。志扬用来与启蒙作战的利器，已不是先民手中的燧石，而是哲人思想的利剑。他已置身在理性的光照之下，这理性的光照就是启蒙。我们可以反思拷问这光照，但经验告诉我们，受强光照射的眼睛反容易看到黑暗。

志扬以为对“启蒙的启蒙”，是“还原西方的世界性为民族性，即还原西方的诸神为一神”。我却以为在哲学中，“民族性”是最要“彻底悬置”的东西。我甚至以为，只有用中文讨论的哲学，而没有一种特殊的中国哲学。只要我们面对同一问题，无论你用什么文字表述，所论同一。古人用“坚白”讨论感觉与对象，用“名实”讨论能指与所指，用“理

气”讨论实体与规律，而讨论“存在”，不论你用 Being, Sein, Etre, 所论皆为一事。也因为所论为一，才可能交流、译、领会。区别仅在于你论的“好”与“不好”。试想有一本用中文写出的《存在与时间》，这里有什么民族性？可以有中国烹调，但不必有中国哲学。因为烹调生自口腹，哲学却诉诸理性，而理性是人之立世的标记。谈到这点，志扬可能会有些失望，他设想会有“汉语言哲学”，但他以为这“汉语言哲学”就是“中国现代哲学”。我想斗胆劝志扬一声，当思所行于至高处，何来畛域古今之分？理性的秉性本是自由，又何必作茧自缚？恰是朱子诗云：“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况且奥林匹斯山上原本众神纷纭。

志扬以为，“启蒙思想的核心就是科学进化论，历史必然性”。但我以为，这固然是启蒙思想的要则，却不是核心。启蒙思想中，固然涉及科学进化论和历史必然性，但细究起来，问题更多。在我看，启蒙思想的核心是高扬个人理性的自由和力量，让每一个人成为自己的主人。E·卡尔西在其名著《启蒙哲学》中总结得最为精辟：“现在，人们把理性看作是一种后天获得物而不是遗产。它不是一座精神宝库，把真理像银币一样窖藏起来，而是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经过这样确定的真理，是一切真实的确定的种子和不可缺少的前提。”在此前提下，启蒙

思想家所论虽也歧义迭出，却都坚守一个核心价值，“人的尊严与自由”。

他们或推崇社会进步，如霍尔巴赫，或反对科学技术的统治，如卢梭，但极少有人怀疑人的价值和自由。他们推崇理性，因为此乃人的尊贵的标志，但他们又何尝缺乏宽博慈爱之心？以致伏尔泰宣称他之热爱真理并不来自理性的召唤，而来自对苦难的同情。后来的工具理性之滥觞，恰因为那些“精英”背离了启蒙的理想。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在《重申启蒙》一书中，对此点作了有力的论述：“启蒙思想并不曾机械地将世界等同于时间的流逝或单纯的技术发展。相反，它总是被视为承担着一种对拓展自我意识和发掘判断力的可能的道德承诺。”

启蒙思想家不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正是启蒙思想提倡各民族平等，诸文化形态皆应受到尊重，他们甚至抱有人类大同的理想。伏尔泰作《风俗论》，对中国大唱赞歌；魁奈甚至有心“全盘东化”，作《中国专制政治论》，推崇中华帝国是顺从自然法的楷模，当作普世价值向西方推广。在智性的精神生活中，在自由的哲学思考中，只有智慧的互相吸引，养料的互相汲取，而断无“敌情观念”。那是三流政客的下作把戏。老富兰克林说得好：“请让地上各族各邦，爱自由亦知人权，哲人踏足任何一地，均可宣称‘此乃吾土’。”

志扬说：“跪惯了的人站不起来，意志虽已具备，能力尚属阙如。”话说得漂亮。但我不知道在人类精神所操持的天地之间，强分畛域，画地为牢，是否也成问题？我们的哲学之思确属“意志虽已具备，能力尚属阙如”。《庄子·天下篇》所言“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叹的就是这种情形。我们自视甚高，但识见浅陋，哄哄然一堂士子，“虾蟆繁声，无理取闹”，虽有浮文炫世，岂可作金石声？所谓“古人之大体”即古人思之整全。现今我们的心力已不足识整全，才造成天下道术之大分裂，以志扬的睿智，岂能看不出？他以下面的话结束了他对“道术天下裂”的反思：

这一最终的原始状态，其描述的词语勾连着最古老的东西之文明。

原始、陌生、寂静、黑暗，最后的神运行其上。

这不就是宇宙之初的景象吗？

任何此在之此都来源其中，居有其中。

而此一在乃存有中生发的，作为此种寂静之守护的基地。

## 尾声

一九九五年底，志扬和萌萌来巴黎看我们。匆匆两夜，那时盈盈不满周岁，我杂务繁忙，接待他们都有些狼狈。好在志扬不会怪我，像以前一样，他仍不多话，只是看着我的忙乱微笑。晚上带他们游览夜巴黎，在蓬皮杜艺术中心旁边的丽堡咖啡吧小坐。身后是建于十三世纪的圣麦里教堂，面前是超现代的蓬皮杜艺术中心，时间之流漂来东方的我们，在这时空交错的地点，“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次志扬他们是去德国参加一位画家的画展。坐在咖啡吧里，他们给我讲述这次画展，但我对现代绘画的心得仅止于蒙马特和蒙帕纳斯那一代，对狄克斯、弗洛伊德、马格里特那些人已敬谢不敏，遑论当下的弄潮儿。我静坐着听他们讲述，留下的印象只有昏黄灯光下弥散的咖啡香。萌萌蜷缩在一只舒适的沙发椅上，柔和的灯光映着她秀丽的脸庞。她聚精会神地听我和志扬说话，那表情同十几年前我们初次见面时一样。不论我们讲什么，她都一样欣赏、喜悦、陶醉。

有她在，谈话的氛围便温馨而动人。我惊异她仍那样年轻，仿佛时光自她脸上流过却了无痕迹。

巴黎的冬夜清澈幽邃，像萌萌的眼神。窗外昏黄的灯光在木叶尽脱的梧桐树间摇曳。变换的光影不时掠过她的脸，我无意间瞥见她眼角隐隐有泪痕，虽然她一直在微笑。我深心涌上歉疚。与萌萌相识多年，我始终对她过分严厉，我以为，像萌萌这么一个受朋友宠爱的女子，应该有些缺憾才好。所以我对她的批评多于赞扬，甚至说话尖刻，伤过她的心，让她流过泪。那时年轻，相信时间无限，总有机会补偿。但现在，飘零海外，让我时常检讨自己的倨傲，悔恨自己对朋友的轻慢。听她讲了这些年在国内的种种神奇经历，我由衷地赞扬她外柔内韧的性格。她听得高兴，便滔滔不绝地讲她种种构想，总是以“等你回来”开头。她为我们设计了多少美妙的未来啊，其实我只听懂了一个意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谁能想到，那个冬夜的离别，竟是我们的永诀。噢，如此冬夜何！如此冬夜何！

知她患病后，有机会我就给她打电话，鼓励她，给她开心，她也表现出乐观和信心。一次通话中，她突然提出要盈盈为她演奏几支曲子。盈盈乖，知道爸爸的朋友都金贵，便为她准备了柴可夫斯基的《四季》选段和肖邦的夜曲。但萌萌的病情急转直下，竟没得机会为她演奏。直到一二年回国，



我与志扬在菲子上海的新居相会，盈盈才为志扬演奏了这几支曲子。曲毕，志扬无语，揽盈盈入怀，清泪涟涟。那一刻，我知道萌萌和我们在一起。

# 若有人兮山之阿

## 关于顾圣婴与友人通信（一）

建英：

今年是肖邦诞辰二百周年，音乐界的“肖邦年”。我会去拉雪兹神父公墓肖邦墓前，为你，当然也为我们这些热爱肖邦的人献上一束鲜花。这些日子，法国古典音乐台从早到晚播送肖邦的音乐。昨天播放亚历山大·达武演奏的升C小调夜曲，主持人介绍说达武的演奏极富诗意，一下引我想起一个人。五六十年代，在我们故土有这么一位钢琴家，曾被称作“演奏肖邦的钢琴诗人”。她就是顾圣婴，你哥哥那一茬

儿钢琴家中最有才华的一位。还记得那年你来巴黎，在我家看过周广仁先生为她编的一册纪念集吗？这部书我反复读了几遍。当时我对你许诺要为顾圣婴写点什么。今天你又偏偏提到她演奏过德彪西的《快乐岛》，勾起我心中隐痛。那就请耐心听我讲下去吧。

据顾育豹先生记载，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愚园路七四九弄的原区中心医院。凌晨三点左右，救护车呼啸而来，抬下来三副脏兮兮的帆布担架，放在急诊室的地上。担架上的两女一男已经气息全无。那个男的抬进来的时候，右手不合常理地前伸，很触目。天很冷，没多久，人就呈僵硬状态。人们认出那个年轻的女性是顾圣婴。她面容惨白，头发塌在地上。片刻，医生写好死亡鉴定，三副担架由护工推到太平间去了。三具尸体匆匆烧了，骨灰未存。另外两个死者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

就在头天下午，顾圣婴的老师李嘉禄先生在淮海路上见到顾神色凄惶地蹒跚而行。李先生觉得她人全变了。李先生不知道对顾圣婴的批判侮辱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而今天下午在上海交响乐团排练厅中，她被勒令跪下认罪，随后一个精壮汉子扑上来，狠狠抽了她一记耳光。或许就是这一击促使顾圣婴下定必死的决心。顾圣婴这么一位温文尔雅的女子，资若兰芷，形如弱柳，自幼献身音乐，只在旋律与和声中生

活。待人友善坦诚，工作兢兢业业，从不与主流意识形态冲突，甚至努力向之靠拢。曾代表政府出国比赛，也有不俗的战绩，算是“为国争光”的人。却以二十九岁灿烂年华，与慈母爱弟毅然同殉，阖家玉碎，满门灭绝。岂“惨烈”二字所能尽言？以赤县之广，竟无一隅容顾圣婴藏身，以国人之稠，竟无只手援顾圣婴逃生。

在五六十年的钢琴家中，顾圣婴的教育背景有些特殊。她出身江南名门，其远祖可溯至东吴名相顾雍。史载顾曾受教于蔡邕，以善操琴、通音律著称于时。顾家书香门第，父亲顾高地先生乃博学儒雅之人，常抱幼小的圣婴入怀，指读家中壁上所悬字画，而小圣婴竟能听音辨字。这份对音韵的敏感似得真传于蔡伯喈，他曾辨灼木之声而制琴“焦尾”。顾家与傅雷先生系通家之好。傅先生曾辑古籍文献中百余篇适合儿童教育的文字，手抄为册，送圣婴阅读。这些立志扬节、主旨高远的文字，虽不同于当时显学，却熏陶了圣婴质若幽兰的心怀。

顾圣婴五岁开始学琴，她的启蒙老师住在江湾。每次上课，顾高地先生便领着圣婴坐上叮咚作响的有轨电车，下车后再牵上小圣婴的手沿淞沪铁路缓行至老师家。随着顾圣婴音乐天才的迅速展露，她先后从杨嘉仁、李嘉禄先生学习钢琴，从马革顺先生学习音乐理论。一九五四年，年仅十七岁

的顾圣婴便被录取为上海交响乐团的独奏演员，她与乐团合作演奏的肖邦《f 小调钢琴协奏曲》好评如潮。至此，她可谓一帆风顺。然而，一块乌云飞至她的头顶，并笼罩了她短暂的一生。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顾圣婴挚爱的父亲、她的音乐生涯的引路人顾高地先生，在家中，当着顾圣婴的面被逮捕了。原来顾先生在上海任职国际问题研究所时，曾帮助过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此时遂因潘案的株连而吃上官司。顾先生一心报国却命运多舛，陷入这深不见底的黑暗。据顾老先生回忆：“这天外飞来的横祸，把我们全家都吓呆了，……我对女儿圣婴说，‘你要好好练琴……爱国家，爱人民’。当时女儿沉坐在椅子上，一听完我的话，她站了起来，神情忧郁而悲愤地望着我，圣婴说：‘爸爸，我爱国家，也爱爸爸’。”可以想象，顾先生有警察挟持，不得不大言掩饰。而圣婴在此决绝时刻，全然不循当时通行的“划清界限”的老套，而直言“我也爱爸爸”，这鸣若金石的几个字，在当时的形势下，何止千钧。我以为，正是这几个字背后蕴藏的心灵力量，让顾先生能挺过二十多年的劳改营生活，但也正是这种力量，促使顾圣婴下定“伏清白以死直”的决心。

囚车载走了顾先生。高墙之后，顾先生最惦念的是女儿四天之后的音乐会，她要演奏肖邦的《f 小调钢琴协奏曲》。

顾圣婴那单纯、纤细的心可能承此大变？她还能从容演奏这分量不轻的曲子吗？这个疑问顾老先生竟存心中二十二年，直到一九七七年从劳改营回到上海，李嘉禄先生才告诉他，顾圣婴当年的演出非常成功。顾先生自己解释道：“圣婴能冷静对待事物，控制个人感情，是她出于对音乐的爱。”其实正因为圣婴把个人感情，把对父亲的爱倾注在演奏上，她才可能成功。我几乎要感谢神的慈爱，让圣婴演奏这支曲子，使她可以借肖邦的音乐恸哭，宣泄她的失父之痛。

乐曲的第二乐章“小广板”，是肖邦倾注了挚爱的乐章。钢琴进入后，左手下键第一个音，直是一声深叹。人随之便卷入情感倾诉的波澜。颤抖的心灵，化为右手奏出的连续长颤音加琶音。二十五节开始，右手轻柔上行，连续颤音后又悲歌般缓缓下行，直至左手让呻吟化为呼喊。中段主题再现后，乐队烘托着缠绵的低诉，提琴齐奏，抖弓揉弦声中，定音鼓隐隐轰响。在肖邦标示 *appassionato*（热情的）处，钢琴昂然唱起。整个乐段，描画孤帆挣扎于滚雷怒涛之间。紧接令人心碎的 *dolciss*（柔美的），便是 *abandon*（纵情的，奔放的），借右手连续的八度和声跑动，演奏者有多少希望不能祈求？若非肖邦精魂之助，顾圣婴心中苦痛又凭谁诉？

后来，顾圣婴的成长要感谢她身边那些爱才的善良师长。经丁善德先生推荐，在洪士硅先生帮助下，顾圣婴北上师从

苏联专家塔图良和克拉夫琴柯，开始了一段颇有收获的学习历程。一九五六年，她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获得金奖。一九五八年，又在克拉夫琴柯指导下，参加日内瓦国际钢琴大赛，获得最高奖，与她并列获奖的就是你最喜欢的波里尼（Pollini）。而很少有人提及，前一年这个比赛的桂冠，戴在了阿格里齐头上。无疑，顾圣婴已跻身世界最有前途的新星之列。但她赴莫斯科参加柴可夫斯基音乐大赛，却铩羽而归。

倪洪进先生回忆，在莫斯科准备比赛时，一天她和顾圣婴去莫斯科音乐学院小卖部吃早餐。顾收到一封信，读后便哭了。后来倪先生知道，顾圣婴从信中得知，她父亲被判了二十年徒刑，发青海劳改。顾因此情绪极度波动。倪先生说：“试想，背上这样沉重的包袱，又如何能对付这场重大的国际比赛？”这“情绪的极度波动”，在殷承宗先生的回忆中得到证实。殷先生说：“她这次比赛失利，主要是家庭不幸，她在莫斯科准备时，曾哭晕过。”

不难想象，自顾高地先生一九五五年夏被捕，至一九五八年被冤判，这三年间，顾圣婴每日心中怀着怎样的希望，但这希望终于破灭了。我以为，自此，顾圣婴的心灵生活和精神世界就变成双重的。她在心灵深处留一块净土，珍藏她的财富，这些财富只展现在她的演奏中，她只通过大师们的

音符，特别是肖邦的“蓝色音符”（Notebleue）诉说自己。顾圣婴的挚友刁蓓华先生说：“我们平时与圣婴相处，总觉得她有心事，心里很矛盾，有话无法吐露出来。”刘诗昆先生也察觉到顾圣婴有苦难言的心境，他回忆道：“我经常在她的琴声中感受到她的忧郁。我几次问她，顾圣婴，你是不是感觉很不开心？她总是对我忧郁地微微一笑，说‘我有什么开心的呢？’”人说“愤怒出诗人”，却不知忧郁更出诗人。顾圣婴演奏肖邦时那种忧伤是学不来的，它是静静流淌在自己心间的幽泉，呜咽鸣溅，只有自家心知。她在肖邦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家园。

我手中有顾圣婴演奏的两张 CD，其中一张是肖邦的作品。CD 上没有标明是哪一年的录音，但从所见材料推测，应该是六十年代早期的演奏。录音的质量不太好，显然会丢失很多细节，但从中已能大致了解顾圣婴的天赋和达到的水平。她的师友们都盛赞顾圣婴的手指技巧。多年之后，好几位先生仍能回忆起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上，顾圣婴演奏的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中的谐谑曲。这支拉赫马尼诺夫改编的曲子，是考验密集音群手指快速跑动的经典。洪士硅先生说：“顾圣婴弹得流利轻巧，犹如微风掠过树叶。”倪洪进先生竟从中感到“一种近似仙气的东西”。在这张唱片上，我们可以听到有类似技术特点的曲目，如前奏曲 Op28 之 8 升 f 小调、



之 24d 小调，练习曲 Op10 之 8F 大调、之 4 升 c 小调。确实，顾圣婴的跑键技巧无可挑剔。但这并非最重要的。手指的灵巧与触键跑动的颗粒性可以通过苦练车尔尼来做到，但要在快速跑动中表达诗意，表达出密集音列的色彩和亮度的明暗对比，却非心中有诗不可。

以索罗甫嗟夫称之为“短小史诗”的第 24 号 d 小调前奏曲为例，顾圣婴二分二十八秒的演奏充分显示了她既有控制密集音群快速跑动的高超技巧，又有表现作品悲剧性内涵的心力。跑动时风驰电掣，云飞浪卷，轻奏时如闪现蓝天一线，尽管稍纵即逝，也绝不含混放过。手指能放松到列文所说的那种“漂浮状态”，却不失弹性，乐句流畅贯通，如珠滚玉盘，一气呵成。全曲织体表达清晰，情绪跌宕起伏却不夸张，是个有说服力的精彩演奏。做到了乔治·桑所论“这些优雅而悲哀的音乐，在陶醉你耳朵的同时，破碎你的心”。同样，奏鸣曲 Op58 第四乐章那些十六分音符的疾速行进，在左右手交替跑动中，顾圣婴始终保持旋律线连绵不断，如疾风掠草，风劲草伏，风缓草起，从容大气。完全不是奇夫劳那种炫技式的跑动，而是韵味十足，似乎每个音都有自己的性格。

顾圣婴在匈牙利演奏后，一个乐评人写道：“她演奏肖邦的作品，带有女性特有的细致缠绵，哀怨凄沉的情愫，然而

有时也强韧有力，显示着光明和希望。”此说可谓抓住了顾圣婴演奏的另一个特征：内在的深沉与韧性。一旦作品需要英雄气概，她能一扫柔弱，展示男性的悲哀与豪迈。这在她演奏的 Op.25 之 7 升 c 小调练习曲中有充分的表现。这支曲子是肖邦匠心独运的作品，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泽林斯基甚至认为“这首练习曲从巴洛克的雄辩风格过渡到对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哦，朋友’宣叙调的回忆，再到极其庄严肃穆的挽歌般悲哀的和弦”。要想完美诠释它，不在技术，而在音乐。我以为它充分体现了肖邦音乐的核心特质——*zał*。

什么是 *zał*？这个几乎找不到准确对译的波兰词，对肖邦是如此重要，以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当我思考我自己，我感觉到意识留给我的往往是 *zał*。”从肖邦、李斯特、涅高兹等人的叙述中，我们可以试着把 *zał* 体会为：一颗高贵的心灵，在野蛮强力的欺凌侮辱下，那种痛彻肺腑的耻辱感。他痛恨这种专横，渴望复仇，又明知反抗的结果必是毁灭，这种无力感使他更觉屈辱。*zał* 就是这双重耻辱下的绝望与悲哀，同时又饱含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深切悲悯。看看波兰民族屡遭强权瓜分，沦为奴隶的历史，肖邦这种心理大致可以体会。如果要找一个形象来说明，我想举出《伊利亚特》第二十四卷为例，当老英雄普里亚摩斯向杀死儿子赫克托尔的阿喀琉斯乞求，要他归还爱子的尸首时，他心中就

充满 za1:

想想你的父亲，我比他更可怜，

忍受了世上凡人没有忍受过的痛苦，

把杀死我儿子的人的手举向唇边。

肖邦音乐中这种 za1 的感觉是教不出来的。我们常人，可以通过体验人生百味，陶冶历史情怀，聆听大师演奏来领略一二，但对那些亲身经历过屈辱、恐惧、绝望的天才，za1 就是神赐的礼物。我想顾圣婴能体会到 za1，或许这就是她身上那种忧郁感的源头。她手下的升 c 小调练习曲，下键就展示出一个刚毅深沉的形象。随后主题展开，始终保持着庄严感。右手的伴奏音型惯被称作“大提琴般的”，而大提琴是最适于表现男性的温柔与深情的乐器，其带有淡淡忧伤的声音特点，如幽谷中风动松弦。顾圣婴把作品前段演奏得稳健沉静，又不拖、不黏，充满内在的激情。随后，左右手交替的力度变化，似乎是深情的临别告语，倾诉着“所思在远道”的惆怅。中段进入连续十六小节的宣叙，右手情绪凝重，左手却始终以低唱应和，真是肃穆庄严。令我想起大卫名画《贺拉斯的誓言》，三兄弟与父亲诀别赴死的悲壮。后段，顾圣婴

在左手上行的快速跑动中极合逻辑地加强力度，为后面葬礼般的尾声做好铺垫。自五十七小节之后的反复悲叹，让人联想起英雄已逝。终句沉重的 *smorzando*（渐慢渐弱）、带延长符的休止、结尾轻回的和声，如寂静中落日西沉，惟余悲笳呜咽，清音辽远。

顾圣婴演奏肖邦作品所取得的成就，绝不仅止于我以上的分析。她演奏的 Op61《幻想波兰舞曲》、Op39《谐谑曲》之3和 Op58《第三奏鸣曲》，可圈可点处甚多，显示了她驾驭大型曲目的能力。这包括演奏的整体布局，声音力度的层次安排，合乎作品内在逻辑的准确分句。这些都关乎对作品思想主题的深刻理解与诠释。这岂是一封信所能尽述。好在这些作品都是你所熟悉的，我们有时间再切磋。

为什么顾圣婴能在演奏肖邦作品中取得突出成就？除了她的天才和演奏技巧之外，可能还需要把视野放宽，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在十九世纪中叶欧洲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肖邦的某些作品可以在社会政治的宏大叙事中找到解释。舒曼一句“隐藏在玫瑰花丛中的大炮”，几乎成了肖邦音乐革命性的标签。确实，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化中，个人自由、爱国主义、民族情感都是主流文化的内涵。那时的文学、音乐、戏剧中，浪漫主义的浪潮总裹挟着反抗暴政的内容。肖邦爱波兰，痛恨俄国对波兰的奴役。他的密友多是自由知识分子，

像密茨凯维支那些常被肖邦带入乐思的诗歌，几乎是波兰自由的火炬。在肖邦的音乐中，萦绕着乡愁和反抗情绪的作品，反映着他内心深处的 zal 感。

俄国十月革命后，这些宏大叙事所用的语汇被顺利地嫁接在俄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树上。俄罗斯钢琴学派的教学，这些内容被自然地用来诠释肖邦的作品。涅高兹在面对《A 达调波罗奈兹》《c 小调练习曲》时，也会谈及上述角度。但不要忘了，这种解释的源头可上溯至李斯特。涅高兹是从欧洲文化出发，以普遍人性为参照，以深厚的俄罗斯音乐传统为背景的。苏联几十年出了许多大钢琴家，这是俄罗斯沃野上结出的硕果，是柴可夫斯基、李姆斯基·科萨可夫、安东·鲁宾斯坦的余脉未绝。涅高兹就是这一伟大传统的传人。

一九四九年之后，大陆的音乐教育体制照搬苏联，幸运的是在这“照搬”时，顺便带来几缕俄罗斯音乐传统的残绪。不幸的是，这几缕残绪也很快烟消云散。顾圣婴所受教的老师克拉夫琴科，是奥柏林的学生。在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准备阶段辅导过她的查克是涅高兹的学生。这使她有幸在这残绪中一睹音乐圣殿的辉煌。在塔图良、克拉夫琴科的引领下，顾圣婴汲取了俄罗斯钢琴学派的养料，也因此，肖邦音乐中那些和宏大叙事背景相通的特质，渗入她的演奏。她在研习肖邦音乐时，是心无滞碍的。

你对她演奏的德彪西的《快乐岛》，评价似乎不低。但我仔细听了她演奏的几首德彪西的作品，以为她应该能演奏得更好。以顾圣婴的气质和技术素养，印象派音乐本该是她的自家花园。德彪西钢琴作品纤细、飘逸的声响、变幻无定的光线、斑驳陆离的色彩，多么适合顾圣婴的天性啊。但她似乎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她演奏的《快乐岛》，整体上显得响了一些、有点硬。末段虽然谱子上标示 *tres anime*（活泼地），但奇柯里尼和桑松·方索的演奏却更显柔和。关键在于声响层次的适度，这点极难把握。想想德彪西灵感来源的华托名画《发舟爱之岛》，云影缥缈、光线摇曳、色彩过渡微妙，整个画面氛围是那样慵懒、散淡、温暖。顾圣婴的演奏就偏实了。当然，她所师承的俄罗斯学派有自己的诠释传统，他们弹印象派，重彩大墨，对比强、起伏大，其中自有妙处，但毕竟德彪西不是斯克里亚宾，地中海蔚蓝海岸沙滩上的棕榈同俄罗斯旷野上的白桦，风韵自是不同。像吉列尔斯，弹北欧的格里格抒情小品，听起来就觉入情入理，细致妥帖。可听他弹德彪西，总觉不大舒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物，真是强求不来。

在我看来，诠释印象派音乐（这里只谈钢琴音乐）的完美标准，是科尔托、吉塞金、桑松方索、奇科里尼这一路。德彪西音乐的灵感大半来自马拉美、魏尔伦这些象征主义诗

人。正是象征主义诗人对“音乐优先”的强调，吸引德彪西直接以他们的诗歌为题材谱曲。如马拉美的《牧神午后》《显现》，魏尔伦的《月光》《雨滴在我心上》。这些诗歌悦耳的音韵、舒展的节奏，仿佛是由旋律线穿起的一串串珍珠。德彪西用音符做一应和，用声响创造出色彩斑斓、光线迷离、意境朦胧、轮廓模糊的音乐。有一个细节不知你是否注意过，称德彪西的音乐为印象派，是从结果而不是从源头上看，有点本末倒置。确实，他的作品的效果让人想起印象派大师莫奈等人的画作，但这只是结果而已。所以，苏瓦雷说德彪西完全是象征派音乐家。

象征主义诗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纯诗”。梁宗岱先生说：“所谓纯诗，便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式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的感应，……像音乐一样，它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纯诗的意境，正是德彪西的音乐理想。盈盈的老师是奇科里尼的嫡传弟子，她在教盈盈弹《月光》时，先要她去读魏尔伦的诗，甚至叫她背下来，说奇科里尼曾对她说，演奏德彪西的音乐不能只靠读谱子。要“闭上你的眼睛，在幻想中演奏，每一个琴键都是sensuel（感性）的，要在幻想中抚摸它们”。

其实，我们的先人从不缺幻想力，古有屈子“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今有戴望舒“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二十一世纪上半叶，敏感的心灵，仍在求索于纯诗之境。梁宗岱先生曾与瓦勒里在“木叶始脱，朝寒彻骨，萧萧金雨中”漫步布洛涅森林，听他讲解《水仙辞》。而五十年代读书人被“洗澡”之后，梁先生便只能在家中培植中草药，以制作“绿素酊”打发时光。至此，象征主义草丰花繁的园地已被芟夷殆尽。在那个说梦话都怕遭人举报的时代，人或为觊觎权位而妄想，或为贪图钱财而痴想，或为独霸“真理”而狂想，唯独不为美而幻想，因为美是自由的形式。

俄罗斯钢琴学派的风格固然会影响到顾圣婴的演奏，但更重要的还在演奏者自己的内心体会。要深入诠释一件作品，需要对产生作品的文化土壤，对作曲家的艺术诉求有所了解。了解得愈深愈透，愈能与作曲家心曲相通。顾圣婴对此很清楚，她对学生讲：“要学好一首作品，最主要的是理解作品讲了些什么，然后用什么样的手段把它表达出来。首先你要有话讲才可以，不然就没意思。”可惜在顾圣婴研习德彪西音乐时，印象派音乐的文化背景在大陆几乎是一片空白，她很难“有话讲”。如果说当主流意识形态全盘接受苏俄时，通过俄罗斯钢琴学派的传承关系，我们和肖邦的音乐还多少沾点远



亲，那么，纯粹西方的印象主义音乐则是完全异质的。

这种“纯诗的”、“绝对自由的”、“诉诸感官的”音乐，不反映“阶级斗争”，甚至不理睬“爱国”和“民族解放”这种中性观念，又如何能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只能变成姚文元这种文坛杀手驰骋的战场。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文批判德彪西的音乐论文集《克罗士先生》。姚根本不懂音乐，更不明白德彪西究竟说了些什么。为谀圣意，他才不管什么和弦结构变化，五声音阶的运用，只需拿起“阶级斗争”这根棍子横扫便是。由于他的文章错误百出，贺绿汀先生化名山谷撰文批驳，引起了一场论战。上海音乐学院的几位教师化名郑焰如，站在姚文元一边参战。顾圣婴注意到了这场论争，在给刁蓓华先生的信中，她颇为惶惑地说：“姚、郑二文基本论点是一致的，我认为也是正确的。”但这显然不是她的定见，她接着又说：“但是逻辑上不够严密、充分，郑文涉书太少，泛论较多，不足以驳倒山谷与S二文。S那篇是写得相当出色的，音乐学院的先生们认为异军突起，为之一惊。这位作者年方二十四，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生，现在戏剧学院搞文艺理论，对音乐有相当的爱好，我感觉（从他的语气、见解中）已经知之颇深了。”从信中看，顾圣婴对驳斥姚文元的人是极为赞赏的，此中可见出她心中的倾向性。但她并不懂政治，不明白姚文元曲言媚上

的阴毒下作，更不能想象这背后政治上的鬼魅伎俩。她对 S 文的赞赏只能出自她的音乐直觉。谁是 S？他就是沙叶新先生。在那个残酷的年代挺身而出，批驳姚文元的唯贺老与沙先生两人而已。沙先生的文章论据充分，说理透彻，将姚文元驳得体无完肤。后来却是姚文元掌了文化界的生杀大权。顾圣婴万想不到，姚文元的出场，会带来她的毁灭。在信的结尾，顾圣婴似有心为德彪西回护，她辗转问道：“是否有这样的情况，有较好的愿望，但在实践中仍局限在阶级的框子里，而没有走对路？德彪西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但随后，柯庆施就把这场争论定性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争论变成政治批判。顾圣婴这种真正演奏德彪西音乐的人再无发言权。一九六二年一年之内，顾圣婴尚在国内演奏了七次德彪西，但自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上海艺术剧场的音乐会之后，再未有她在国内舞台上演奏德彪西的消息。

信写得长了，暂时打住。下封信我想从更广一些的社会思想背景上分析一下顾圣婴的音乐道路和她的毁灭，再和你讨论。

2010 年 5 月

## 关于顾圣婴与友人通信（二）

建英：

春天来了，岸柳微吐鹅黄，晓雾中已见灰鹤戏水。但春温不临笔端，论及顾圣婴的毁灭，常掷笔徘徊。陈寅恪先生以为，笔涉人物，须有“了解之同情”，实为至言。

在周广仁先生编的纪念集中，收有一些顾圣婴的照片。看她颀长的身材、清秀的容颜，演奏时忧郁的目光，会想起杜甫诗句“日暮依修竹，天寒翠袖薄”。何以会有这种感觉？从她的朋友们的回忆中，知道她父亲入狱，母亲无业，弟弟患病，顾以一人之力，支撑全家，更有作为钢琴家的日常苦练。这些担子压在她瘦弱的身上，让人有不胜苦寒的感觉。鲍惠荞先生感叹道：“圣婴活得太累，太苦了！”她还觉出顾圣婴是一个“把自己的痛苦藏在心底的人”。什么痛苦需要埋藏？

顾训中先生说：“顾高地被正式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从此顾圣婴的心被劈成了两半，一半仍在孜孜追求着艺术女神，一半留给了深陷冤狱的慈爱父亲。”不过实际情况可能更复杂些，顾先生说，顾高地“从家里每隔数月寄来的薄薄信纸中贪婪地吞噬着女儿的信息，他从农场仅能搜罗到的几种报纸的缝隙中寻觅着女儿的踪影”。“数月”而来的“薄薄的信纸”和“报纸的缝隙”，说明顾圣婴和父亲的联系交流并不充分。顾是笔头甚勤的人，纪念集中，没有她给父亲的只言片语，却收有给刁蓓华先生的信件十三通。是顾先生“丢了”这些信吗？顾先生身陷高墙，女儿的片语只言都是救命甘泉，倘有亲人手泽，能不宝爱至深？有一点大致可以判断，即使顾圣婴有信给父亲，她也会把想说的话掩埋心底，因为她要依照当时社会的生存逻辑行事。

由于父亲被冤判，顾圣婴已沦为“杀关管子女”。这个符号标志着某些人，因上辈中有人被“杀掉、关押、管制”而身负“原罪”，沦为“贱民”。他们前途暗淡，举步维艰。当时，对他们的基本政策是“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就是说，你若想摆脱“贱民”地位，则必须认同主流意识，并且格外努力表现。借用批判哲学的术语，肩负救赎任务的主体是 Establishment，在中国，恰当的译法就是“组织”，一种无个性却无处不在的强大力量。个人再有才华，在

组织面前也等于零。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中，顾圣婴的卓越才华和她的贱民地位强烈冲突，并决定了她今后的行为模式。她将积极靠拢组织，以努力成为一个革命者来洗刷她的原罪而葆有她的艺术。

在她和刁先生的通信中，她批评别人“政治基本功太薄弱”，这会使“演奏停滞不前”。她真诚地赞成“改变思想感情是长期艰巨的任务”，并称“没有人像雷锋那样使我激动和敬佩”。这种努力有些效果，她在日记中记下别人对她的肯定：“知我是团干部，说我这几年特别卖力，某些地方赶过别人了。”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她又如何看待父亲入狱的性质？当年她目睹父亲被捕，说出“我爱爸爸”时，她刚刚十八岁。经过几年的“革命化”教育，顾圣婴的看法会有哪些改变？在不断的政治清洗中，我们眼见骨肉相残。但我以为，顾圣婴和父亲的关系绝非如此。在经验不到之处，自有启示之光将思考带入澄明。

顾圣婴一九五八年加入中国音乐家协会，随后，加入共青团，初步摆脱“贱民”地位。但前述冲突依然存在，只是变成了她个人的心理冲突。她已是“组织的人”，当然认可组织的正当性。但判父亲入狱的不也是“组织”吗？相信组织，就要相信父亲是有罪的，但“自我”却绝难认同。对父亲出于本能的爱，同组织的判定相冲突。用精神分析学的话说，

这是一种双重的“对丧失爱的恐惧”。面对这种心理冲突，需建立一套防卫机制，来保持心理平衡。这种压抑—转移—升华的心理过程在弗洛伊德、马尔库塞与拉康的著作中有详尽的分析。简而言之，她将把对父亲的思念逐入潜意识，再以革命的名义转移那些与当下现实冲突的欲念，而“升华入”音乐，“为革命演奏”使她找到心理冲突的平衡点。她暂时“得救”了。不过从纠缠顾圣婴一生的紧张、失眠、噩梦、焦虑诸症候看，这个平衡是脆弱的。它是一种在“超我临督”下的“恐怖的平衡”。外部强权迫使“超我”顺从“有罪判定”，而本能却告诉“自我”，爱不是罪。冲突的结果，形成顾圣婴心理上的“伪原罪感”。这就是顾圣婴埋藏起来的痛苦。安提戈涅并不想抛下瞎眼的父亲俄狄浦斯，是国王克瑞翁把她拉走的。

在没有自由空间的全能社会中，顾圣婴的行为方式是合理且正当的。弱小的个人在强大的社会机制面前，正如拉康所论“镜像阶段”的幼儿。其自我认证是通过“它性”来完成的。组织才是给予顾圣婴自我的“它性”。它是力量的象征，价值的衡定和弱者的保护人。顾圣婴的安身立命之所是她的钢琴艺术，而这也只在组织的关怀下方能存在。在以“阶级斗争”为社会活动杠杆的形势下，个人唯一的依靠就是“站好队”，尤其当你不是本阶级的人，这个阶级却宽宏地收容你，

便自然会“感恩”了。我们谁不曾有过把自己交给“组织”后那种轻松的幸福感？这是一种为逃避的接受，我们接受外部威权，甚至不考虑它是否在侵害我们，以换取失去自由的安全感。因此，对顾圣婴时而激昂的革命情绪，我们绝无责怪，唯有痛惜。

由于顾圣婴要追随政治正确，她便经常处于艺术家本能与社会政治要求相冲突的境地。讨论一场音乐会的得失，她能一丝不苟地考虑技术问题与音乐处理，但又会认为“政治上的‘娇’导致了业务的‘矫’，于是演奏也停滞不前”。她很真诚地同意“经常下乡下厂对我们搞洋、搞古、搞单干的十分必要”，又感到“党的要求是越来越高”，“这几天显然感觉调门又往高处走了，我不得不再自问，究竟哪个调门是我的”。她说服自己“最近再三的强调了总方向，严格审查作品，注意倾向性，我不可也不应该在自己的舞台上去搬弄适于西洋的一套”，又抱怨“多少年了，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明显的‘提高’？固然政治觉悟的提高，思想认识的一致是大前提，但若是离开了乐队队员的技术、修养，离开了指挥艺术，又有什么可言呢？”我们甚至能感到这种矛盾冲突动摇着她赖以生存的艺术基石。她问道：“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可能和可以对过去的作品有兴趣和喜好吗？”纪念集中，收有顾圣婴一九六四年参加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钢琴比赛的日记，

可以看出艺术与政治的冲突怎样折磨着她。

当她知道参赛者的情况后，便断定“美苏选手是强敌”，命令自己“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应该记住，弹好就是我运用了我的武器，也就是为革命服务，为政治服务”。显然，顾圣婴并未把参加比赛当做深入钢琴艺术的机会，而把它当做一场国际政治斗争。

五月三日，顾圣婴得空在樱花林中散步，自然唤醒了她被压抑的本能：“略闻草香泥土气，心情为之一爽，什么时候我能整天在这样的环境中轻松一下呢？我太喜欢这样的天地了，我能不能怀着这样的心情上台比赛呢？”在自然怀抱中，她意识到自己需要一种轻松的心情上台。随后，因为一位负责接待她的比利时老太太“拥抱和吻了我，给我力量，我差点流泪了，的确心在那一刻发热了，我得到了力量”。这个力量并非来自“政治斗争、祖国荣誉”，而是来自人性之爱。第一轮比赛她弹得相当成功。

顾圣婴到比利时后，每天都记下身体的各种不适，头昏、抽筋、噩梦、手臂疼痛，这显然和心理压力有关。她为自己加压，竟认为“全国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这岂是她那脆弱的身体和心灵所能担承？第一轮赛后的清晨，她到林中散步：“晨间的阳光透过树丛，形成各种色调、气氛。林中各



种虫声鸟鸣极悦耳，对 Ballade（叙事曲）有大启发。如老太太所说，我弹得不够诗意，不够 libre（自由）。”诗意与自由，这是艺术的生命之源啊。但她多半时间却无暇顾及。第二轮，她的表现不理想，她自评道：“很不满意，没有一首好的。”尽管如此，她也没有从艺术上反省，却想到，“现在局势是微妙的，这里还是有斗争，需手段的”。恰在这时，丁善德先生和她谈了一次话，“说到我的家庭问题，谈到团的工作，说到入党问题，要我回去也……说现在将吸收一些（丁院长的提法是较令人惊讶和感觉兴趣的）”。

丁先生的这次谈话似乎是想为第二轮比赛表现欠佳的顾圣婴鼓把劲，所以竟隐约谈到尽管顾出身不好，却仍有可能入党。顾在记丁先生的话时很特殊地用了省略号，似是丁先生出语慎重，甚或曾“面授机宜”。总之，这隐约的许诺让顾圣婴“惊讶”，而且“感觉兴趣”。这使她更紧张动员起来，“应争取得奖，得高奖！”在五月十九日与乐队和乐之后，她感觉“白天头疼，精神不佳，手不舒服，如何工作呢？”却又告诫自己，“让所有的想念都变成练习效果吧！这是最好的献礼”。倘若能仅做此想倒也罢了，她却又注意到“看看其他选手，都不像我这样紧张，是他们会安排，还是我过分？深思！”两个问号加惊叹号，说明她实是不堪重负。是啊，其他选手只为自己，为艺术弹琴，而顾小姐却平白要为六亿五千

万人弹琴啊！

顾圣婴以总分排名的方式进入第三轮，需在隔离状态下练习昆特的协奏曲，背谱时心力交瘁，却仍不忘“我是一个革命者，来自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什么不在这件事上体现一下我们的革命风格呢？”这时，美国选手科尔蒂出现了，他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一种思路。顾圣婴记下了他的一些言论“他认为知识分子可以有个人自己的想法，开展自己的艺术道路，言下还有艺术不具体体现政治之意。”顾圣婴当然知道这和她信奉的意识形态大相径庭。她却未加批判，还直言：“我喜欢他。”两天之后，她又与科尔蒂散步聊天，具体谈了些什么，顾未曾记下，却记下了科尔蒂对劳动的看法：“他拥护我们的政策，认为劳动是‘good for health, mind, soul’。”但顾圣婴却忽略了科尔蒂所谈的劳动和我们的“劳动改造”之本质区别。这个忽略或许是有意为之，因为顾圣婴不可能忘记她的父亲正在从事着一种劳动，它可不是“good for health, mind, soul”。而不做这种忽略，她就只好接着记下“我还是很喜欢和他交往”。

最后顾圣婴获得第十名。应该说，在她那种心理压力和身体状况下，这已是不错的成绩。但她不满意，自己默默流了泪。可惜对这个结果，她给出了这样一个总结：“对比赛，我没有什么满意不满意可说，因为艺术不可能脱离政治，比

赛无例外的也是一场斗争，是两个阶级争夺的所在。它既是艺术观上的交锋，也是政治上的交锋。”顾圣婴没有说明，在她的名次上，“敌对阶级”是如何行动的，倒是记下了英国评委的意见：“不要加太多东西进去，而应该去掉杂质废料，使作品的全貌呈现。”照当时的阵营划分，英国评委应属“敌对势力”，但顾圣婴却斩钉截铁地说“很好的道理”。“去掉杂质废料”，莫非英国评委听出了顾在演奏时心中所装的那些“党国、人民、阶级”，而顾自己也明白这点？

随后，她买到肯普夫弹的贝多芬的奏鸣曲，李帕蒂弹的格里格，听后极喜欢，甚至“觉得我能够弹好贝多芬”。就在第二天，她记下了观看电影《柯山红日》的感受：“《柯山红日》太差了，我受不了这种全无音乐逻辑的东西。”笔锋一转，她又写道：“突然非常喜欢 Beethoven, Kempff 的原因吧！”只要稍微离开那些“杂质废料”，顾小姐就立时恢复了纯正的艺术趣味。比赛结束后，顾圣婴在欧洲几国巡回演出。其间政治活动不少，听报告，“受到激励，一定要不负期望，努力革命化，彻底革命化，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一个共产党员”。日记中出现了“革命啊！永远革命”的呼喊。这种超常的革命表态，其实来自她的内疚感，似乎这次比赛没有取得理想成绩是她的“过错”，“唉，一种抱愧遗憾的心情总占据着我，只能从以后去弥补了”。这种抱愧内

疚的感觉，根子还是那个“负罪感”。据刁蓓华先生说，顾圣婴每次出国要经“特批”，时任文化部长的夏衍喜爱她的才华，每次为她做“政治担保”。顾小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对曾帮助过她的人，心中总存一份感恩。说大了，是“党国、人民”，其实心中是具体的个人，没达到理想要求，竟深怀愧疚，长久不能释怀。帕斯卡尔说：“世上只有两种人，相信自己是罪人的义人和相信自己是义人的罪人。”顾小姐是前者。

回国前，她在莫斯科记下最后一则日记，“一整天几乎都在唱片中消磨，听了两套歌剧，老柴浪漫曲和 Mendelssohn concerto, chopin Grand Polonaise，都喜欢，但与我们今天的生活，今天要表达的太远了，多听有好处吗？不禁想到如果立足不稳的话，是会陷入沉入到那样一种境地，那样一种感情与精神世界中去的”。顾小姐已经意识到她所“信”的世界和她所“爱”的世界是根本分裂的，她真是面临深渊，彷徨无地了。鲍惠荪先生对此有所察觉：“在那些年里，她默默承受着命运的重压和痛苦，就像一个朝圣者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踟蹰前进。……我们都觉察到她的演奏风格渐渐有了些变化，原来的清新的诗意和高贵的抒情少了些，代之而来的是躁动不安的戏剧性。初时，我们还以为她是想突破自己，寻求一些新的东西，但逐渐感到了那是源自于她内心的巨大痛苦似乎要挣破她单薄的身躯冲出来，那是她的心在哭泣、

在挣扎、在呐喊，我常常暗自担心她快要崩溃了。”

顾圣婴六月十六日在布鲁塞尔音乐会之后记道：“加奏了斯克里亚宾的左手夜曲，我近日特喜欢它，心情有关！”这条记载似在一片灿烂的背景上横抹一道灰痕。刚获比赛奖项的顾小姐何以会“特喜欢”这支悲伤透骨的曲子？它是斯克里亚宾右手练琴受伤，面临断送演奏生涯时的绝望之作，专门写给左手，似双翅损一仍欲振翮。在顾小姐“革命、革命啊”的意识底层，竟埋藏着如此深重的伤残感，又不小心通过乐曲透露出来。何以故？后来见到顾小姐遗物中，有一只肖邦左手模型，已被暴徒砸毁，仅余三指。我几乎相信这便是顾小姐那一刻“极喜欢”斯克里亚宾左手夜曲的理由。“白露警而鹤唳清，知霜雪之将至也。”顾小姐似已隐约听到“共和国新人”铿锵的铁踵。音为心声，顾小姐欲借斯氏左手向肖邦致最后的敬意。

阅读顾圣婴比赛归国后的演奏日记，可以看出形势变化，劫难的巨轮开始滚动。它将碾碎顾圣婴脆弱的生命。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开始，顾圣婴愈来愈少演奏古典作品，音乐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那些时新作品，《翻身的日子》《高举革命大旗》。一九六五年一年，她仅弹过一次肖邦的《升f小调谐谑曲》，而新曲目是《唱支山歌给党听》《随时准备战斗》……她的演出场所也离开音乐厅，搬到上海重型机械厂铸造车

间……但顾圣婴对这些和音乐艺术无关的曲目也努力去弹，并记下笔记，分析得失，从中能感到她的焦躁。由于政治学习时间太多，她已无法练琴，她焦急地发问：“演奏要不及格了，如何是好？”“该练琴呢？”“何时能练琴？……在工厂中可练琴，但时间何在？”九月二十七日上海重型机械厂演出结束后，她焦虑地发问：“以后演出用什么呢？是个大问题呢！”对顾圣婴而言，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一九六五年最后一则演出日记中，她明白大势已去，“总想学些新的，不过看来可能性不大”。她脚下的生存板块开始漂移。

在纪念册中，找不到顾圣婴一九六六年的消息。但我们知道，这是“共和国新人”大为风光的一年，有多少兄弟姐妹、父老乡亲无声无息地在他们的铁踵下“消失”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那个阴冷的凌晨，她走了。

顾圣婴的朋友们在回忆中痛惜她的决然弃世，惋惜她未能咬牙熬下来。刘诗昆先生认为“‘文革’初期她所受的折磨毕竟还只是最粗浅的”，甚至以为顾圣婴选择的自杀之路“也远未到非走不可”，似乎死活之间是可以计量的。我倒想为顾小姐一辩。

前面我已分析过，顾圣婴的心理平衡建立在由外在威权内化的“超我”与“自我”的妥协之上。在她的“超我”接

受外在威权的价值形态时，也确立了“自我”的价值。先前这个由“超我”负责取舍的价值形态是稳定的，从而顾圣婴的“自我”价值结构也是稳定的。但突然，外在威权将“超我”的价值稳定自行打破，使那些将此价值内化于意识结构的弱小个体无所依附。他们的心理崩溃便在所难免。此其不得不死者一。

顾圣婴以为她的政治原罪，在十几年的努力表现下，已救赎在望。组织已和她谈及入党问题。她完全信赖那些代表组织出面和她打交道的个人。但转眼间他们亦被打翻在地。救赎者变成罪人，救赎再无可能。此其不得不死者二。

钢琴演奏是顾圣婴安身立命之所。不要说肖邦、德彪西，她甚至对《洪湖赤卫队》这类时新作品也倾注心力去演奏。但眼下连这类作品亦成需荡涤的“污泥浊水”。她无价的天才与技艺竟类同垃圾。此其不得不死者三。

顾圣婴冰清玉洁之身，竟被勒令下跪谢罪，又遭粗汉掌掴而肌肤相侵。餐英饮露之人堕入荤血腥膻之筵，凶徒满目，狂嚣盈耳，亲人阻绝，友朋悉损，虎狼之地，不容圣婴。此其不得不死者四。

有此四端，义无再辱，有此四端，安能不死！

但并不仅于此。顾圣婴是自杀的。自杀与自然死亡性质不同。它是主体的自由意志先行到死，因而更是一精神性事件。哈姆雷特发问“死还是活，这是个问题”，他已经把有关生存性质的询问掷在我们面前。一个人选择“不存在”（死）一定劣于“存在”（活）吗？帕斯卡尔说“人是能思想的芦苇”，以指明人在生物上的脆弱和精神上的尊贵。人唯在精神活动中呈现其为人的定性。精神活动创造意义，这种意义的价值衡量却要实现于社会系统。从而，个人的生死抉择便关涉对某种价值的否弃或认可。涂尔干正是在此意义上指出：“我们缺少活下去的理由，因为我们能够珍视的唯一生命不再适应任何现实的价值，而仍然融合在现实的唯一生命，不再满足我们的需要。”他把这看做利己性自杀的重要原因，其关键在于，高贵的心灵中，生命的延续同价值、道德目标相关。顾圣婴选择自杀，正因为她的生命“已不再适应任何现实的价值”。此生死去就之择，岂能以多少较之？

对顾圣婴而言，还另有一层宿命。她是一位“钢琴诗人”，担承着为“另一维”“立法”的责任。虽然她并不自觉此一责任，但责任并不因此消失。海德格尔说：“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且承受世界之深渊。为此就需有入于深渊之人。”顾小姐被命运之手加上了“入于深渊”的责任。不过，我在此引海氏名言，却有着与他不同的用意。诗人之担



“入于深渊”之责有两种情况，能为诗，则深入深渊，启明存在之光；不能为诗，则陷入深渊，“遮蔽”存在之光。海氏寄希望于前者，顾小姐却以后者出场。她在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钢琴比赛中所思之事，多与诗人之责无关。她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向音乐中寻求不属于音乐的东西。无论是谈论作品还是演奏，她几乎无一字涉及音乐本身。她已不能为诗，而身处晦暗不明的“遮蔽”状态。

艺术家作为艺术品展现其真理性的“途径”，本承有“葆其真”的使命，她却让那些“杂质废料”将此途径“遮蔽”起来，把艺术虚掷于“服务于所用”的荒野。她反复责怪自己“技术上的问题”，以为技术可以带来艺术的完满，却不知道技术性仍外在于作品的真理性。她本可以借技术之“用”来打开艺术品昭示真理之光，她却在技术上往返逡巡，痛失深入艺术品之本源的机会，即作品“凭何是其所是并如其所是”。艺术家无须深知“去蔽”之责，她只需面对作品如其所是地演奏就够了，真理自会在乐声的鸣响中显身。但她错把“阶级”“国家”认作艺术的目的，把“去蔽”之责当做以“武器”制胜“强敌”，从而迷失在现实的癫狂中。但是，这并非顾小姐的过错，当整个民族都被鼓噪起来奔向深渊时，她不过替我们担当了迷途之责。

诗人的职责是在诗中经验那未曾说出的东西，她开启，

她立法，她创造有别于“实存”的另一维度。如果时代的暗夜太浓重，诗人之思无力穿透黑暗去昭明存在的真理，诗人便已死去，无论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她是否还活着。却有诗人选择另一条路，以真实的死亡完成其最美艳深邃之诗。顾圣婴的先行者茨维塔耶娃，明了此点。她说，心灵的英勇是活，躯体的英勇是死。当她知道自己的心灵已无勇气承担诗人的职责时，她便选择了躯体的英勇。诗人之为民族的先知，象征着民族的命运。民族同个人一样，也存在精神的生死。因此荷尔德林敢于说“一个民族将死之际，精神选择一人，为它唱出生命的天鹅之歌”。

一九七七年，顾高地先生自青海劳改营释放，满怀对家人的期盼回沪，等待他的竟是一个残酷的消息，他的亲人们早在十年前就撒手人寰。顾先生知此消息，一夜须发全白。后在蔡蓉曾女士陪同下，前往万安公墓寻找亲人遗骨无获，恸哭失声，哀动墓园。此后，老人收集爱女遗物，办成顾圣婴纪念室，每天晚上，老人都会来这间屋中一坐，在夜幕四垂，一灯如豆的岑冷孤寂中，和爱女交谈，听爱女演奏，直到一九九〇年，老人也走了。

一九七九年，顾圣婴辞世十二年后，举行了她的骨灰安放仪式。但摆放在灵堂中央的骨灰盒是空的，顾小姐竟是弱骨无存，埋香无处。

二〇〇九年六月，波里尼（Pollini）在巴黎普莱耶尔音乐厅演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这是肖邦当年在巴黎开音乐会的地方。看到他演出的海报，手捧鲜花，微笑着，便想起一九五八年日内瓦国际钢琴比赛，和他同登领奖台的顾小姐，一袭白裙，高贵典雅。五十年后，却一为巨擘，纵横乐坛，一为游魂，无枝可依。

九州并非不产精灵，牛山濯濯，只因持斧斤者众，纵天降英才，瑰伟卓犖，天朝戕伐亦如割野草。如有美玉，日月孕育，山川滋养，逾百千年而成，要毁灭亦不过一击。

历数顾圣婴的演奏日记，没有见到她演奏肖邦《降b小调奏鸣曲》的记录。似乎她不愿意为我们演奏《葬礼进行曲》，我想她是有道理的。这曲子不适合我们惯常的情感方式。在李斯特看来，“这样的情感只有在哀悼民族悲剧的全民族葬仪的行列中才会存在”。而我们却不喜欢扶着受难者的灵柩，悲悼于时光的行进，倒乐于披上死者的尸衣，欢歌于横尸的荒原。我们只会为君王送葬，不会为生民哀哭，从而无法体会“广大的慈悲，那种珍视每座坟墓和每个摇篮的正义”。

马尔库塞说过：“遗忘过去的苦难就是容忍而不是征服造就苦难的势力。思想的崇高任务就是对抗时间的流逝而恢复记忆的权利。记忆是获得自由的手段。”记忆，便是我们的

持守。

2010 年 6 月

## 骊歌清酒忆旧时



那是七二年暮春的五月，街头正弥漫着槐花的清香。我刚从怀柔山中回京轮休，就接到了萍萍的电话，说有个人挺有意思，你来见见吧。傍晚，唐克就背着他的吉他到南锣鼓巷 149 号来了。

萍萍家与我家是世交。我们两家住得很近，百十米的距离抬脚就到。萍萍是师大女附中的才女，高挑的身材，妍丽的容貌，在我这个青涩少年的眼中，是幽居深谷的佳人偶落尘寰。她的声音好听，清脆中带着难得的胸音，歌喉宛妙。

以她的才识风貌，天生一个沙龙女主人。所以她家那个幽静小院常有各路人马聚会，说的都是中国以外、民国以前的雅事儿。

我那时十七八岁，正是青春萌动之时。虽然模样呆头呆脑，但心里满是普希金的浪漫、雨果的激情。萍萍大概看我“孺子可教”，又碍着老辈儿的面子，常常带我玩。这天她来电话约我去，我立刻就奔了“高台阶”（胡同里的老百姓管萍萍家的宅子叫高台阶）。萍萍家当庭一棵大核桃树，繁枝厚叶，浓荫匝地，遮住了小半个院子。我推门进院，见大树下立着一条汉子。身高一米八以上，宽肩细腰长腿，面色白皙，眉峰外突，双眼下凹，阔额方脸，鼻梁高挺，细看有胡人相。此人长发披肩，一条细腿裤紧绷，屁股的轮廓清晰可见。照现在的说法是“性感”，按当时的看法，叫“流氓”。他左手扶在核桃树干上，右肩上挂着一把大吉他，古铜色的漆皮已经脱落。萍萍介绍说：“他叫唐克，是北京汽车制造厂的。”我在工厂看惯了穿劳动布工装、剃着“板寸”的工人师傅，乍一见这副行头打扮的人，颇觉惊讶，觉得有点像港台特务。唐克朝我一笑，他笑起来倒不像坏人，显得有点腼腆。

进客厅坐下，萍萍说：“唐克会好多你没听过的歌”。我很好奇，想听唐克唱，尤其是弹吉他唱歌的情形，只在小说里见过。唐克不忙弹唱，反问萍萍：“上次给你抄的歌，你学

了吗？你来唱，我伴奏得了。”我这才知道此前他们已经对过几次歌。萍萍说：“你还是先唱几首吧。”唐克从沙发上站起来，搬过一把椅子，坐下，开始调弦。轻拨慢捻，随手给出几个琶音，流泉般的叮咚声就在屋里漾开了。调准音，他回头问萍萍唱哪一首，未等答话，自己就报了名：“唱《蓝色的街灯》吧。”在吉他轻柔的伴奏下，歌声起了：

蓝色的街灯，

明亮在街头，

独自对窗，

凝望夜空。

星星在闪耀，

我在流泪，

我在流泪没有人知道。

谁在唱啊？

远处轻风送来，

想念你的，

我爱唱的那一首歌。

唐克的嗓音不算好，沙沙哑哑的，但有味道，而且音准极好。唱到高音处，梗起脖子，额头上青筋绷露，汗水涔涔，一副忘我的样子。眼睛只盯着左手的把位，动情处会轻轻摇头。这是什么歌啊！缠绵、忧郁，那么“资产阶级”！在他轻弹低唱之时，我的眼泪几乎要落下来。我们从小只听过毛主席语录歌，那些配了乐的杀伐之声。而这《蓝色的街灯》却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凭这歌声，我喜欢上了唐克。

但唐克并不把我放在眼里。唱完歌，他只是看着萍萍，期待着那里的回应。我忍不住说：“真好听，再唱一支吧。萍萍说，你会很多歌。”唐克仍然看着萍萍，问：“想听哪一首？”问话里含着期待。萍萍轻轻应一声“随便”，便不再说话。唐克低头，只在吉他上摩挲着，不时弹出几个和弦。我突然明白，今天在这屋里，我是多余的。再看唐克，满眼的惆怅，琴声中涟涟流出的全是爱意。没错，他在追萍萍。片刻的寂静，唐克突然奋力一击琴箱，随即琴声大作，唱出的歌也不像前首的婉转低回，歌词似乎皆从牙缝里吐出，带着嘶嘶的爆裂声：

葡萄的美酒令人沉醉，



苦口的咖啡叫人回味。

没有人理我，

我也不理谁，

一个人喝咖啡，

不要谁来陪。

我要喝，

葡萄美酒加咖啡，

再来一杯也不会醉，

没有人爱我，

我也不爱谁。

一个人喝咖啡不要谁来陪。

歌声中的绝望让人心碎。后来我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苦咖啡》。

唐克爱上萍萍，他注定要喝苦咖啡了。萍萍早有男朋友，

是总参作战部首脑的公子，家住景山后街军队大院将军楼。此人生得孔武有力，是地安门一带有名的顽主。每来萍萍家，必是锰钢车、将校呢、将校靴，行头齐全。他不大读书，也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真正是根红苗正。我奇怪萍萍和他在一起怎么会有话说。

天色渐晚，唐克几次请萍萍唱歌，萍萍都未答应。待他起身告辞，已是繁星满天。我请他把今晚唱的歌片抄给我，他敷衍地应着，显然没想到这几支歌对我的意义。在萍萍那里，这歌是追求者的奉献。在唐克那里，这歌是倾诉爱慕的语言。而对我，却是一个新世界的展现。我陪萍萍送唐克到门口。月光透过宽厚的核桃树叶泼洒在院子里，天风轻拂，地上满是光影的婆娑。有一刻，萍萍与唐克相对而立，光影中，这对俊男倩女宛若仙人。一霎那，我觉心酸。

离开“高台阶”，陪唐克向锣鼓巷南口走，没几步就到了炒豆胡同，我要拐弯回家。和唐克打招呼再见，告他我就住在路北第一个门。唐克仿佛猛然醒过来：“噢，咱们留个地址吧，今后好联系。你不是要我的歌片吗？我抄好就寄给你。”离开萍萍，唐克好像还了魂，说话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刚才在萍萍家客厅里若有所失的恍惚不见了，举手投足透出几分潇洒。听说他要和我联系，我挺高兴，便把工厂的地址给了他，告他我平日不在北京，两周才回来一次。唐克走了，

双手插在裤兜里，上身微微晃着，披肩发和身上背的吉他一跳一跳的。我呆立着，看他消失在灯影里。那不是蓝色的街灯，而是橙黄色的，昏暗、朦胧。后读龚自珍《己亥杂诗》，见有“小桥报有人痴立，泪泼春帘一饼茶”句。那就是年少时的我吧。

回到怀柔山里不久，就接到了唐克的信，里面厚厚的一叠歌片，都是他手抄的简谱，工工整整，一笔字相当漂亮。看看自己那笔破字，更从心里佩服他。唐克给我的信很长，尽是些我不知道的事儿和词儿。我印象最深的是“甲壳虫”。因为他抄给我的歌片儿里有两首英文歌，原词没有翻译，是 Yesterday 和 Michelle。那时我会的英文词超不过百十个，根本看不懂这歌说的是什么，可他在信里特别提到给我的歌片儿里有“甲壳虫”的歌。后来才明白“甲壳虫”就是 Beatles 的中文译名，现在大多称“披头士”的。信有点烫手。那时候，若让革命群众发现，唐克教唆犯的罪名是逃不掉的。“传播黄色歌曲，毒害革命青年”，为这关几年大牢是家常便饭。但我喜欢。读他的信，有点心跳，却高兴他拿我这么个小屁孩儿当朋友，弄些犯禁的东西传给我。在禁忌的时代，哪个年轻人没有渎神的冲动。更何况我又生来有反骨，专爱惹是生非，让我妈夜里睡不着觉，做梦都是我进了局子的事儿。七二年，“甲壳虫”已经散伙快两年了，四雄单飞，列侬已经

写出了不朽名曲 Imagine。当然，这是我后来知道的。那时，在中国大陆，听说过“甲壳虫”名字的又有几人？因了唐克，我算一个。

信，我是精心藏好了，歌则和好朋友一起躲在山沟里人迹罕至处偷偷学唱。唐克当时抄给我的歌，现在还能记住的有《寻梦园》《蓝色的街灯》《晚星》《唐布拉》《苦咖啡》《魂断蓝桥》《告别》。这些歌和当时的社会氛围全不搭界。我们就凭它，有了一种别样的生活。唐克给我的歌和当时流行的苏俄歌曲不一样，似乎来自另一种文化，大约是从英美到港台的一路。这些歌里少了苏俄歌曲中浑厚忧郁、崇高壮烈的情绪，多了缠绵悱恻、男嗔女怨的小资情调，更个人，更世俗。后来我偷偷唱给几个知心好友听，没人不爱。既有信来，必有信往。我得给唐克回信，为了证明我有资格做他的朋友，而不仅仅是萍萍的“灯泡儿”。好歹那时也胡乱读过几本书，得在唐克面前“抖抖份儿”。

这封信足足花了我一个星期的工余时间。每天下班之后，别人都回宿舍了，我一个人躲在车间的角落里，打开机床灯，趴在工具柜上写。字难看，就写慢点，一笔一划的，学问不大就拽着点，东拉西扯的。当然，我的“杀手锏”是萍萍，就凭这名字，拿下唐克不成问题。当时我刚通读完《鲁迅全集》，正好拿来卖弄。我给唐克分析了一通他为何不该爱萍萍。

在我看，一是萍萍已经名花有主，二是像唐克这么一个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庭的闺女也不般配。记得信中还用了“贾府上的焦大也不会爱上林妹妹”之类的比喻。我并无伤害他的意思，只真心希望他认清爱的无望，不要徒费心力。就算信写得不招唐克待见，相信我的单纯坦白他会理解。

每天写完回宿舍，已是繁星高挂，夜幕四垂。沿着八道河往宿舍走，河水的鸣溅伴着稻田里的蛙声，汨汨、咕咕，交相回应。满山坡的栗子花香得醉人，偶尔蛙鸣止息，能听见玉米拔节的“咔嚓”声。带着刚才一逞“堆砌”之快，飘飘然觉“万物皆备于我”。

信发走后便撂在脑后不去想它。

二

又是一个轮休日。刚一到家，我妈就说，这几天老有个叫唐克的找你，留了电话号码，让你回来后给他回话。一看是个公用电话号码，下写“请传新街口大四条 45 号唐克”。

我心中忐忑，不知唐克收到我的信没有，会有什么反应。傍晚时分拨通了电话，唐克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音调高昂、兴奋。先听他说“你这封信写得可是花了力气”，接着大谈萍萍也是爱他的，并不是他单相思。又说起他最近见了一个什么人，两人谈起《人·岁月·生活》这部书。接着，洛东达、莫吉尔扬尼、毕加索等名字子弹般飞来。接下来说一定要见面，给我讲讲这本书。随后他压低了声音问我，萍萍读过这本书吗？说实话，这部书的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问唐克，这书是谁写的，他竟然一时语塞，没说出来。唐克立刻要约我见面，叫我到他家去，只是有点抱歉地说，他家地方太小。第二天下午，我们约在新街口丁字路口，几分钟后就站在唐克家门前了。

新街口大四条在新街口以北豁口以南，斜对着总政文工团排练场。胡同不算窄，沿街有老槐树。唐克家院子门不大，进门左手是个长方形的小院，搭着许多小棚子，院子显得拥挤。顶头一颗大槐树，遮了半个院子的荫。唐克家是北房，只一间屋，约二十几平方，屋子分成两部分，靠里一张大双人床，靠外一张小单人床。简简单单几件家具，倒收拾得干

净。屋子中间已经摆好了一张方桌，桌上几盘小菜，一瓶北京红葡萄酒。迎门坐着一位老人，鹤发童颜，腰板挺直，双目炯炯有神。他就是唐克的父亲，以后我一直称他唐伯伯。

看气度，老人绝非等闲人物。与唐克交往多年，我从没有问过老人是干什么的，唐克也未提起过。只偶闻他曾是民国时期演艺界一位重要人物。直到前些年，唐克寄给我一份国民党 C. C. 系祖师陈立夫给他的亲笔信的复印件，称他“克信贤侄”，才知道这位唐老伯和 C. C. 系关系绝非寻常，能与陈立夫兄弟相称。唐克告我他的名字就是陈立夫所起。

老人见我进来，点头相迎，命我坐下，开口便说：“我看了你给唐克信的信。”我才知道唐克本名克信，人称唐克乃是简称。老人道：“看你年纪轻轻，还真读了不少书，不像唐克信，不学无术，整天鬼混。”我心一虚，知道是我信中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胡拽的结果。随后，唐伯伯又讲了一通青年人应该如何上进，和报纸上差不多。唐克烦了，催着快吃饭。饭后老人又夸了我几句，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吓得半死的话：“唐克信这孩子，我就交给你了。”

我记不起来当时如何回答。以我当时的阅历，肯定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回想，一位耄耋老翁，把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托付给一个十七八岁的半大小子，有多滑稽。唐克

对此倒是听而不闻，也许这小子太过顽劣，老人不知已经把他托付给几多人了。老人起身离席，走到院中洗漱了一下，就回屋和衣倒在靠里面的大床上。唐克冲我一招手，我们就溜出了屋子。

东西向的院，唐克家靠东侧，顶西头有个小院和大院子中间隔着门道，小院中有一小屋，隐秘得很。唐克引我进去，说他平时就住在这间小屋里。小屋仅有五六个平方，一单人床，一双屈桌，桌前破椅一把，坐上去嘎吱响。若一人坐在床上，一人坐在椅上，空间仅可容膝。开灯，是盏北京当时最流行的八瓦日光灯，嗡嗡响了半天也不见亮。唐克猛拍，终于亮了。一眼见正墙上挂着唐克那把心爱的吉他，在惨白的灯光下有森森色。唐克摘下吉他，轻抚琴箱，讲起这把吉他的来历。这琴是他从一位朋友处淘换来的，以前，它是一位苏联专家的。这位专家的父亲三十年代曾是国际纵队成员，参加过马德里保卫战。战败后归国，带回这把吉他。唐克告我，这种手抱挥弦的吉他叫西班牙古典式，适合弹奏古典乐曲和歌吟伴奏，声音浑厚。另有一种吉他音箱狭小，需用拨子弹奏，声音尖亮，是夏威夷吉他，适合小乐队演奏。

又告我吉他大师塞戈维亚就是弹奏这种西班牙古典吉他。从此，我又知道了一个神圣的名字：塞戈维亚。



吉他在唐克的抚弄下似乎有了生命。磨损的漆皮透露着岁月的消息，不知何年，几多良夜，它曾在佳人窗下倾诉。许是刚才吃饭多喝了点酒，唐克有点兴奋，不停抚弦欲歌。我怕夜深搅人，尤其是唱被禁止的音乐。他说街道大妈和他关系不错，还曾说他唱得好听呢。那晚，唐克唱了《晚星》，一首此后几十年和我在一起的歌：

傍晚，我望着夜空，

想起你，知心朋友。

你远在天边，

几时才能和你相见。

晚风吹着我的脸，

星儿啊，

又随风飘散，

飞到我身旁，

永远陪伴着我。

如今我寂寞悲伤，

有谁知道我在流泪，

只有你啊，

知心的朋友，

可是你远在天边。

如今我孤零无靠，

今往何处去流浪，

只有你啊，

知心的朋友，

可你远在天边。

屋子小，拢音，琴箱共鸣更显丰厚，唐克的声音也格外动人。已微醺的我是彻底地醉了。琴歌声歇，我起身告辞，已是午夜时分。骑车往家走，洒水车刚过，新洒过水的街上，清凉阵阵。街上没人，我兴奋，放声大唱，从新街口一路唱回家。到家门口，忽听身后有人说再见，一看是唐克，说怕我喝多了路上出事，就一直跟我回了家。看我平安到家，便掉头走了。

### 三

那年夏天，怀柔山区暴发山洪，淹毁了我们工厂。抗洪救灾后，工厂已无法生产，全厂工人返京自找地方实习。我去了北京起重机械厂，一呆就是一年多。

这段时间，和唐克隔三差五就见面，跟他学歌，听他胡聊，当然也从他那里学东西。“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看太阳”，是唐克在一封信中抄给我的巴尔蒙特的诗。这诗行对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人实在有颠覆力。我们从小接受的信条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的人”，是为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唐克却用巴尔蒙特的诗告诉我：睁开眼睛吧，这世界上还有其他好看的东西。在听到北岛吟诵出“我不相信”的决绝之前，我一直以“看看太阳”的态度来生活。那时，我也寻到过普希金、拜伦、雪莱的诗，把那些滚烫的诗行抄在秘密的小本子上，藏在心底：

我要凭那无拘无束的卷发

每阵爱琴海的风都追逐着它

我要凭那墨玉镶边的眼睛

睫毛直吻着你颊上的嫣红

但拜伦的爱琴海对七十年代的中国太轻柔明媚。中国是死海，粘稠污浊的海水里涌动着无数受苦的灵魂。踟蹰在巴黎街头的巴尔蒙特才更贴近我们。

七十年代，北京在不同时间流行过不同的书。《人·岁月·生活》文革前就已在内部出版，但它最受青年人“追捧”的时间大约是七十年代初。这本书最流行的时候，我没读过，我知道它是听唐克说的。书的内容相当丰富，但唐克不断向我提起的主要是艺术家在巴黎的生活。他最津津乐道的故事是一位画家在洛东达咖啡馆门口脱得精光，一位警察看看他问道：“老头，你不冷吗”？唐克抛给了我一大堆名字，莫吉尔扬尼、毕加索、马蒂斯、“洛东达”、“丁香园”、“洗衣坊”、“蒙马特”。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扇小窗子，透过它，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可惜，我们虽然常提起巴尔蒙特、阿波利奈尔，但没读过他们的诗。我们谈论印象派、立体派、抽象

派……但没看过它们的画。我们拿新鲜名词娱乐自己，更由于物质追求被严酷地禁止，对精神的追求就来得格外强烈。

“洛东达”对唐克或者说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唐克谈起它就像饕餮之徒谈起菜谱？后来我明白，“洛东达”不仅意味着无数开先河、领风骚的艺术家曾聚集在它昏暗肮脏、烟气弥漫的厅堂里，更因为它代表着自由的思想与创作，代表着特立独行的人格，代表着精神上的相互启迪与召唤，代表着友谊能打破民族国家的藩篱，仅因为道义相砥、精神相通而地久天长。

我要读这部书，问唐克，他没有，而且我发现他并未真正读过这本书。他所知道的内容大半是听来的，或是得自友人之间互相传递的那些隐秘的笔记本。我有几位大朋友，是文革前 101 中的高中生，家里都有些背景。其中有一位门路极广，我们叫他“老胖子”，我请他帮忙。等了挺长的时间，老胖子才告我找到了，说这书印得很少，他是通过马海德的公子幼马找到的。马海德在共产党内的地位类似白求恩，属于为革命服务的国际友人。幼马是个混血儿，为人慷慨仗义。老胖子和他家住隔壁，关系很熟。我当晚就跑过去取回书，老胖子限我一周还书。这书用旧报纸包了个皮儿，两册，黄黄的书页。后来我知道，当时流传的这部书并不是全本，它只有四个部分，而爱伦堡一共写了六部分，一直写到“解冻”。

拿到书，我通宵达旦地连读带抄。仅一周时间，恨不得把这书吞吃下去。看了才知道，书的内容极丰富，远胜过唐克的“口头传达”。它不仅记述人物、事件、场景，还有更深入的思考，而唐克似乎并不在意这些需要更高智力活动的内容。他是通过感觉来吸收，通过听力来汲取的，以至一次我把抄下来的段落给他看，他竟问我“这是什么书”。

但这并不妨碍他“生活在别处”。当“全世界人民都向往着祖国的首都——北京”时，唐克却向往着“巴黎，宛如一朵灰色的玫瑰，在雨中盛开”。当全国人都爱看“伟大领袖毛主席慈祥的面容”时，唐克却想看毕加索笔下那些变形的“丑女人”。在大伙都爱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时，唐克却要唱“一个人喝咖啡不要人来陪”。在一片灰色的萧瑟中，唐克是一点绿意。和他在一起聊天，我们说的几乎是另一种语言。“两报一刊”生产的套话消失在新街口大四条的陋室里。那里有缠绵的琴声，和“恨今朝相逢已太迟”的叹息。

## 四

这段时间，唐克的兴趣集中在电影和摄影上。现在每次见面，他都会谈到某部电影，有些是文革前上演过的，像《战舰波将金号》《第四十一个》《偷自行车的人》，更有些他也只是听说过。他给我讲过帕索里尼的《迷惘的一代》、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扬巴德》。最津津乐道的就是“人家真的好电影根本没有故事情节，全靠镜头说话”。哪怕他没看过，这些电影里的新潮思想也会让他兴奋。他有几个在电影界混的朋友，有关现代电影的信息大半是从那儿听来的。唐克的本事就是“听”。但是他的“听”有一种天然指向，他有兴趣去听的东西一定和人类精神世界的拓展有关。在社会震耳欲聋的革命喧嚣中，他是个聋子。但哪儿有一丝有价值的异响，他马上竖起耳朵，循声而去。

尼克松访华之后，文革的势头稍有疲软。随后维也纳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斯图加特室内乐团相继访华。阿巴多、奥曼迪的名字在小圈子里不胫而走。这几个外国乐团我都没听成，因为除了江青和她的一些死党，剧场里坐的大都是士兵，整团整营地开进去，一声令下就座，开始受罪。记得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演出那天我回怀柔山里办事，晚上站在

宿舍凉台上，习惯性地拿出我的九管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找那些传道讲经的电台，它们往往在两段圣经之间放一段古典音乐。但那天还没调到短波，就清晰地听到了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原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居然播了一段演奏现场实况。听得我顿觉星光灿烂，万山奔涌。回城后唐克来找我，得意洋洋地说他听了这场演出的现场。怎么可能？其实他用了一个极简单的方法：在民族宫礼堂台阶下昂首挺胸站好，某首长在前下车，立即紧紧跟上，稍抬双臂，做保护首长状，跟着进了剧场，然后立即闪进厕所，等没人时进去找个空座坐下即可。他告我，剧场空座很多，越往中间坐，越没人敢问你。关键是你心里觉得自己是大爷。

七四年，邓重回权力中心，各种“另一个世界”的东西通过难以察觉的缝隙透进铁屋。唐克敏锐地嗅到了一丝异味，于是像暗灰吹了氧气，火苗陡起，开始四处征战。自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混场告捷，他又发现总政文工团排演场常演“内部电影”。当局为了“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弄了不少日本的战争片来教育群众，如《山本五十六》《啊，海军》《虎、虎、虎》《日本海大海战》……先是在高干中演，随后扩及文艺界的核心队伍。但唐克两头不搭界。总政排演场就在家门口，肉香扑鼻却不给快饿死的饥汉分一杯羹，是无天理。一天，唐克突然兴奋地告诉我，他看了《啊，海军》，随后给我



大讲东乡平八郎初入江田岛海军学校，教官嫌他回答点名时声不够壮，便大声喊“我听不见就是听不见”。为了让我能身临其境，唐克模仿台词竟至声嘶力竭，青筋绷露。我问他哪里弄的票，他先说是朋友给的，问他是谁，他有点恼火说，别以为只有你们这些人才能弄到票，我有我的办法。后来他不断有电影看，每次看完都会向我炫耀。那几个月，是自相识以来，他最快乐的时光。但渐渐地，他再不提看电影的事。新波是唐克的乐友，弹一手好吉他。唐克和他吉他二重奏，都是新波弹主旋，唐克弹伴奏。一天新波不经意地告诉我，唐克画不成票了。我再问，才明白前几个月，唐克出入内部电影院如趟平地，原来是靠画入场券。他发现一家常演内部电影的剧场（我不记得是不是总政排练场）的入场券是油印在一张淡粉色的薄纸上的。这种纸在文化用品商店很容易找到。由于这种纸很薄，油墨洇得厉害，所以用黑墨水笔很容易画。唐克是在剧场门口捡到人家随手扔的入场券，然后回家制作。他原有绘画的根底，画出的入场券几可乱真，从来无人察觉。但前不久，入场券改道林纸铅印了，唐克无计可施。所以近来再无电影看，人也郁闷起来。

一天我上早班，下午两点刚出工厂门，就听唐克大呼，一看他正在马路对面等我，双腿蹬地，跨在自行车后架上，前摇后摆好不惬意。没等我走近，就急着告诉我，他又看了

一个多么棒的电影。我逗他说，又能画票啦，他撇嘴道：“谁画了，我自己买票看的”，语气大有二奶扶正、穷人乍富的得意。这次他看的电影叫《爆炸》，是官方准演的罗马尼亚电影。主角是一位名叫“火神”的消防队员，为了救一艘要爆炸的外国轮船出生入死。唐克最喜欢男主角的那张脸，比起中国银幕上那些装腔作势、一本正经的死人脸，“火神”的脸确实太让人动心。这是一张沟壑纵横的瘦长脸，倒八字眉，塌鼻梁，但内藏英武之气。此人言语幽默，行动果敢，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冷面英雄。更让人吃惊的是，电影中竟然有一皮肤半黑的窈窕女郎，身着比基尼泳装，在舰桥、舷梯、甲板间跳来跳去。蓝天碧海、烈火浓烟衬托着鲜亮的桔黄色三点式泳装，果然赏心悦目。唐克坚持认为审片子的人在这个镜头出现时正巧睡着了，以至让这大逆不道的镜头出现在中国观众眼前。这片子唐克看了多遍，还一再鼓动我多去看几遍，说这种片子每个镜头都值得琢磨。

摄影是唐克一贯的喜爱。他有一台老式的单镜头反光135相机，曾给我看过一些他照的人物特写，我当时认为水平相当高。我对摄影一窍不通，全听唐克启蒙，从他那里知道了牛顿的黑白反差效果、布拉萨依的人物照。他珍藏着一张不知哪里找来的布拉萨依照的毕加索相。他对我说，这张相片不符合一般人物肖像的规则，画面切割不均衡，但是人

物表情捕捉得太精彩。还拿起尺子在这张照片上比划，说要是他照，他会裁掉多余部分。他对摄影很下功夫，手边几本有关摄影理论与技巧的书，快让他翻烂了。他自己拍照，也自己冲洗，放大机是自己手工制作。他把那间小屋弄成暗室，常常一干就是通宵。有一阵他和唐伯伯闹气，把全套冲洗相片的设备搬到炒豆胡同，夜里我陪他干活。在暗红色的灯光下，见一张相纸从显影液中渐渐显出形象，真有一种快乐。他洗过许多照片，但我现在唯一记住的是他给自制的放大机照的相。构图极朴素，那架细脖大头的放大机孤零零地悬置在照片的中间，似有种哀怨的表情。他自己吹嘘说这张静物照可与牛顿的片子相比。

## 五

唐克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干的是机修钳工的活，这个工种是工厂里技术要求最全面的。要能判断机器的毛病出在哪，

还要能动手修，有时配件不凑手，就得自己动手做。唐克在工厂上班是百分之百吊儿郎当，泡病假、请事假、迟到早退司空见惯。但他群众关系总混得不错，哥们儿、姐们儿、大伯、大妈一大堆。领导恨得牙痒痒，不知整过他多少回，可他一仍其旧，死不改悔。唐克学了手艺也不闲着，总想着自己捣鼓点玩意儿。他建议把我爸五十年代初从越南带回来的那架飞利浦收音机拆了，做个音箱。那时我已经沉溺于古典音乐不能自拔，但没有好设备听。他说可以把我那架北京 604 开盘磁带录音机接到音箱上，扩展低音。立体声概念，也是听说过没见过，以为弄两个音箱左右一摆就是立体声。终于他把我爸的收音机拆了，其实他只用里面的那只八寸喇叭。他的木工活挺漂亮，外壳还贴了一层深咖啡色的木纹塑料贴面。音箱的原理是他自己瞎琢磨的，但背面开反射孔，内里塞棉套吸音，还真符合声学原理。音箱做好以后，他精心往面板上贴了一个商标牌“Toshiba”，后来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日本东芝。也不知道他打哪弄来的。

音箱做好后，唐克又有新的设想：“设计剪裁缝制衣服。”七十年代，大陆几亿人的服装基本上是一个样式，都是脱胎于军装的毛服。唐克平时就要把工装裤改窄，包臀裹腿。他不能忍受穿万众一面的服装。这回他要自己设计款式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把当时叫“老头衫”的圆领衫裁短，长度仅

及肚脐。下摆不缝，留着毛边。再就是把劳动布工作裤彻底改造，臀围、大腿围收紧，膝盖以下开成大喇叭口，裤脚毛边，一边的膝盖上剪开一洞，拉出布料的粗纤维。这款似乎是从电影《爆炸》里学来的。难得的是唐克追萍萍失败之后，身边再无女性，而他妈妈也早已不在世，设计的服装全靠自己缝制。他的女红技巧如何，我不能评价，但那身打扮招摇过市，绝对得让“雷子”盯上。

一天中午，唐克来我家，我俩在院门口说话。这时我妈已对唐克提高了警惕，让我少跟他来往，所以他总是在胡同里跟我会面。唐克背靠墙，一脚立地，一腿屈起，脚蹬在墙上。屈起的一腿，恰恰把膝盖上的大洞暴露出来，像裤子破了没补。我姥爷回家，见我和唐克在说话，便点头而过，谁知走过去几步后，突又掉头回来。姥爷是深度近视，他摘下眼镜，弯腰仔细端详唐克裤子上的大洞，然后一言不发，掉头而去。

姥爷是北京市武术协会委员，身怀绝技。太极、通背、形意、八卦掌、五禽戏，样样精通，更有一独门功夫“太极短剑”。文革前他曾带我去看他在北海体育场表演。此套剑术形似太极拳，做起来身形悠缓，气随意走，意气相连，绵绵不断。但前臂内侧暗藏一尺短剑。格斗时，翻腕刀锋立现，一剑封喉，制敌死命。因此套路太凶狠，姥爷从不传人。我

表叔曾跟随罗瑞卿掌管公安部，几次劝姥爷将此绝技传给公安学院武术教研室，但姥爷执意不从。后来他对我说：“我怎知学剑的人是不是好人，他要学了去干坏事怎么办”？看来姥爷早知“国家机器是不能信任的”。

唐克走后，我回家，姥爷叫住我问，你这朋友是何人？家里是不是特困难？有无父母？我奇怪姥爷为何问此。姥爷发话道：“这孩子可怜，裤子破成那样还穿了上街，家里没人给补。你叫他进来，把裤子脱下，让你妈给他缝缝。”我妈一听大乐，在旁边朝姥爷喊：“人家那是时髦！”姥爷到了也不明白破衣烂衫如何时髦。再见唐克，相告此事。唐克大感动，说今后再见了姥爷非给他“磕两不可”。果然，唐克以后再来家中，总找机会和姥爷聊天，哄老爷子，竟至姥爷甚喜欢他，还要教他习武，说赵家孩子全不学他的玩意儿，实在可惜，颇有“广陵散不复传矣”的感叹。不知姥爷要教唐克的功夫中有无他的独门绝学“太极短剑”。

七四年开始批林批孔。像我们这种平日爱“学习”的人大半被组织进了“工人理论队伍”，负责向革命群众宣讲毛的理论。为了配合批林批孔，中国书店上了一些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哲学原著，我们因此有机会读些以往找不到的书。唐克对新鲜玩意总有兴趣。当时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工人理论小组在北京挺出名，所以让他们和北大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一

起编辑、注释辛弃疾的词选，因为当时辛弃疾被列入了法家队伍。唐克和厂里工人理论队伍的头儿关系很好，常和人家瞎聊。人家在干活、搞注释，他也趁机读了几首辛词，因喜爱就要和我分享，居然弄到一部人家刚注释完的底稿给我，打字油印，整整齐齐一大厚摞，像本书的样子。唐克自己做了个封面，用挺漂亮的毛笔字题上《稼轩长短句》。后来才知道这是以元大德年间广信书院刊印的《稼轩长短句》为底本，参照前人注释编成，里面大约袭用了不少邓广铭先生的研究成果。反正是工人阶级用，不存在抄袭和版权问题。那一阵我们以背稼轩词为乐。唐克常有独解，犹喜《贺新郎》送陈亮一首，最感叹陈亮别去，稼轩不舍，竟踏雪追人。古人高意勾起唐克远游之心。不几日他告我将独自远行，游历名山大川。既念到“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便要亲往拜谒。我问他可有盘缠？他笑答“一甌一钵足矣”。

## 六

唐克开始浪迹天涯，几乎每周有一信寄我，信中记载所行遇之奇事。大凡风物人情、遗痕古迹、绝词妙文皆详录之。我不知他的行止，只凭着收到的信知道他到过哪儿。他在成都寄给我的信有十多页，大抄武侯祠、杜甫草堂的铭文、楹联、题诗。记得武侯祠所悬巨匾题“义薄云天”，祠内有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杜甫草堂则有一联，我深爱之：“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蜺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随后，唐克在重庆买舟而下，过三峡时，他抄录盛弘之《三峡》名句给我：“每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岫传响，哀转久绝。”他沿途记载长江名胜，在武汉下船寄信给我，信封上注明“发于武汉长江大桥”。随后，顺江而下，过黄冈赤壁，览小孤山，在九江下船奔了南昌。

唐克出发时号称只带了五块钱，沿途多半靠混车、蹭票、扒车而行。他在宝鸡曾上一煤车，半夜几乎冻死。时常饿肚子，但总有好心人帮忙，或请饭，或留宿。在陕西曾被路警抓获，关了好几天，据他说全凭善搞公关，和小警察东拉西扯，最后竟然套出交情，放他出监。唐克没读过《在路上》，我们那时也不知道凯鲁亚克的大名，但唐克肯定是“路上派”的先锋。后来看到霍姆斯评说道：“《在路上》里的人物实际



上是在‘寻求’，他们寻求的特定目标是精神领域的。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刺激，他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我想，这就是唐克上路时，未曾明了的意义。

唐克自南昌一路南下，在去广州的火车上遇见了阿柳，一位文静、秀美、单纯的姑娘。他一到广州，就爱上了这座城市。他来信说和北京相比，广州太自由，太有意思了，说天高皇帝远，总有草民喘气的地方。还抄了黄花岗烈士陵园里的一些墓碑铭文给我。他在广州待了好几天，寻访到几位琴友，和人家练琴对歌，受到热情款待。据说他带去的几支歌“关震”，广州琴友盼他携琴南下。因此，唐克有南下之意。加上和阿柳相处的热络，更使他打算辞北远行。

不记得他又转了什么地方，但收到他的最后一信是寄自云南昆明滇池。这已是他离京数月之后了。这封信用红线竖格信纸，极工整漂亮地全文抄录了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信中大抒登临感怀。那时他凭栏临风，望八百里滇池浩淼，叹岁月空逝，立志奋起直追。信写的激昂慷慨，与往昔唐克的消颓大相径庭。再读他抄给我的长联，却更喜：“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真惭愧，唐克当时走过的地方，大半我至今没有去过。有关知识皆来自唐克在路上寄给我的那些信。这些信极有价值，可惜三十年过去，都散失了。八二年，中国现代西方哲学讨论会在庐山举行，我奉命打前站，去武汉办往九江的船票。随后顺江而下，一路默念唐克曾写给我的大江形胜，竟如昨日。过小孤山时，天刚破晓，大雾迷江。一山兀立，江水拍舷，思念的歌声自心底悠然而起。那时唐克已移居广州，我与他久不通消息了。

唐克回京时，我已回山中。待半月后相见，他憔悴又忧虑，全不见旅途中来信时的亢奋。原来这次闪的时间长了，工厂要处分他，严厉至开除。如何收场，我已经记不得，但不久唐克就坚定地告诉我，他要南下。“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唐克要走，对我是件大事。几年来，他是最亲近的朋友，我的启蒙者。他的怪论激起我读书的冲动，他的琴声带给我多少快乐。但这次，他真要走了。我曾找出许多理由挽留他，但他一句话让我无言：“北京是你们呆的地方，不是我待的地方”。交往这几年，唐克常讥讽我的出身。他把和萍萍恋爱的失败归结为门第之过，总爱说：“你们是贵族，想要什么有什么。”开玩笑！中国哪里有什么贵族？因为贵族并不意味着你站在国家阶梯的第几级上，它更是文化，是教养，

是责任，是荣誉，是骑士精神的延续。如果魏玛大公奥古斯特不尊崇歌德、席勒，如果克腾侯爵利奥波德不崇拜巴赫，那他们不过是头脑冬烘的土领主，而国朝之肉食者大半头脑空洞、人格猥琐、行为下作，何来高贵的血脉绵延子嗣？我看那些官宦子弟，大半粪土。而唐克倒有些贵族气。我这样告诉他，他觉得我说反话。

唐克要动身了，几个朋友在大四条唐克老宅为他饯行。似乎天亦伤别，那天阴沉沉的。入夜，雨渐渐落了，滴在院中大槐树上，簌簌作响。我们喝了不少酒，在座的朋友有吉他高手。呜咽的琴声和着细雨淅沥，别愁离绪伴着未来憧憬。唐克那天看起来很平静，似乎不为离开北京伤感。广州有阿柳，有新朋友，也许有未来。那时的许多青年人，是“有向往，无未来”的。唐克终于拿起了琴，想到今后恐怕很难再听见这把老吉他的声音了，我有点伤心。唐克抚琴作歌，唱的《魂断蓝桥》。此曲用英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的曲调，但歌词全变：

恨今朝相逢已太迟，

今朝又别离。

流水幽吟，

落花如雨，  
无限惜别意。  
白石为凭，  
明月为证，  
我心已早相许。  
今若天涯，  
愿长相忆，  
爱心永不移。

不知出自何人手笔，颇有柳七遗风，歌之怆然。歌毕，唐克放下琴，沉默不语。这是我听他在北京唱的最后一支歌。

唐克走后，先时常有书信来，地址是广州市粉末冶金厂，那是阿柳工作的地方。渐渐信淡了，竟至全无消息。后来听人说他曾两次奋勇游向香港，但均未成功，被捕获后送农场劳动，吃尽苦头。我曾旁敲侧击问过他是否如此，他顾左右而言它。其实我佩服他的勇敢，他爱死了那种“另类生活”，不仅想而且干，以自己青春血肉之躯去搏取。我担心的倒是

他一旦真得到了，会心满意足吗？我以为不会。他的命星高悬在那里。

## 七

七八年底，所里派科研处刘树勋处长带我到几个省的社科院调查外地理论界的思想动态。知道行程后，我试着往广州粉末冶金厂阿柳处给唐克写了封信，告他我将赴广州，希望能和他见面。但直到动身，也没他的回音。到广州后，省社科院的人安排我们住广州白云宾馆，我又给唐克发一封信，告他我的住处。本已不抱能找到他的希望，没想到，第二天早晨正在餐厅吃早茶，唐克大摇大摆地来了。

久不相见，我是欣喜异常。唐克却仍是一脸的满不在乎。白云宾馆餐厅后面有一室内花园，奇花异草，怪石流泉，相当漂亮。唐克进去转了一圈，出来似有不平，说：“你小子真会挑地方，要不是找你，这地方我连进也进不来。”七八年时，

白云宾馆是广州高档宾馆之一。唐克大概嫌我这个当年一块混的小哥儿们有点堕落。刘先生事前听我讲过唐克的故事，忙从旁圆场道：“工作需要，工作需要。”那时我正读马尔库塞，这次出差手边带了一本他的原著《单向度的人》，正巧放在餐桌上。唐克拿起来翻了翻，又是一脸不屑的样子：“嗨，都读洋文书了，中文学会了吗？”我知道他也就是在外人面前“乍刺儿”，便一脸憨笑，随他挤兑。待坐下说起我们在广州的日程，才知唐克早有一个详细的安排，要带我去不少地方，还要见他广州的朋友，似乎要给我展示他在广州的生活。树勋先生大人有大量，说你和唐克玩去吧，和社科院谈话的事我一人去就行了。后来广州的公事几乎都由刘先生一人包了。谈话间广东省社科院来人接我们，见面就说，李一哲放出来了，现住省委招待所东湖宾馆。我一听就来劲，想去找他们，但树勋先生碍于公务身份不便前往，便商定由唐克陪我以个人身份去会李一哲。

文革中的李一哲也曾名动京城。他们的大字报在北京广为流传，以其思想开放、言辞犀利、辩才无碍而受人喜爱。第二天下午，和唐克约好见面，他带我去东湖宾馆。天阴沉沉的，在宾馆门口和站岗的士兵稍费了些口舌，等我拿出盖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红印的介绍信，才放我们进去。李正天、王希哲、陈一扬（李一哲就是三人名字中各取一字

拼成）三人住在一座二层的灰色楼房里，楼道很暗。他们的房间约二十平米，摆着四张双层床，靠窗一张二屉桌。说是招待所，比起号子里也好不到哪儿去。屋子很暗，我们敲门进去，三人显出吃惊的样子。待我自报家门，屋里才有了活气儿。李正天身材不高，头大，脖子短，毛发稀疏，前额宽阔，大眼镜后面一双慧眼，外表有点像列宁。说话声低，吐字很慢，谈话间会偶尔站起来走几步，旋即又坐下。是个沉静的思想家。

陈一扬自始至终在上铺没下来，大半时间躺着。人极消瘦，暗黑色的脸，整个一广东农民。他在监狱里受尽折磨，身子搞垮了，偶尔插话也是气微声低。王希哲是三人中唯一显得生气勃勃的人，不停地动，时而坐下，时而站起，讲话中气充沛，慷慨激昂，挥手顿足。他脸上棱角分明，高鼻、阔嘴，秀眉丽眼，模样相当俊秀，惟下颌尖削，透出几分尖刻与激烈，像托洛斯基。

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话题大得吓人，不离世界大势、中国前途、高层斗争。王希哲已经开始思考批判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顺带着对毛的继续革命论大加鞭笞，思想极激烈。李正天不大谈理论，只谈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人对他们的关照。当时主持广东军政的是习仲勋。唐克静坐一旁听李一哲们高论。等我们告辞离去，问他的观感，他似对三人评价不高。

以后他和李正天交往过一段，终因性格不合而分手。

第二天一早，唐克就来宾馆接我去白云山一游。天亦晴亦雨，白云山遍山滴翠，繁花满地，异香扑鼻。我们沿山路缓行，身边白云氤氲，修竹新松，错落掩映，风起处隐隐有涛声。过碧池，四围云杉笔立，池边雕栏玉砌，池中有金红色的鲤鱼数尾，游荡碧水中。唐克兴高采烈，一面指点我观赏，一面提醒着北京现时的萧瑟，显示他决定南迁的正确。我无语，见他得意，自是为他高兴。一路行来竟不遇人，惟唐克喧语回响空谷。

傍晚，唐克引我至阿棠家，阿棠是他新结识的琴友。瘦高个，文静腼腆，但一手吉他弹得出神入化。唐克得意地说，他早晚带阿棠去北京，让北京玩琴的人见识见识。我们和阿棠坐在窄小的天井中，听阿棠弹唱。所唱多用粤语，我如听天书，但曲调一路的缠绵悱恻。唐克介绍说是邓丽君的歌。我笑唐克入乡随俗，从甲壳虫到邓丽君，照单全收。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世上有歌星如邓小姐。阿棠所唱歌中有一支给我印象颇深，问唐克，告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告别阿棠，上公交车返回白云宾馆，一阵急雨袭来。唐克说广州天气就如此，一日数晴数雨。公交车上乘客寥寥。急雨扑打车窗，水雾迷蒙中见街灯明灭。唐克与我坐在车的最后一排，他一时半刻竟已将《月亮代表我的心》连词带谱写在一张纸上，又



哼唱几遍，将歌片递给我，说明天唱几遍就会了，港台歌好学。难得我从北到南一千多公里，再受教于唐克，学会一支新潮歌曲。

离穗前我执意要去看阿柳，结果仅在粉末冶金厂门口匆匆一见。她的开朗、大方、娴慧的性格让我喜欢。她拿我当自家兄弟，说现在住处太局促，不好请我去，将来总有机会，接我当贵客。我心存感念，只盼唐克收心，与阿柳花好月圆。与唐克握手道别，唐克信心满满，说，一定会回北京，我们北京见。谁想到此一别竟二十五年，再见是在巴黎。

## 八

流寓海外多年，时常想起唐克。渐渐离大陆远了，对那边的事也多疏离，惟存一点对老友的念想。后多方打听到他的电话，记在本子上却始终未和他联系。九七年新年，我试着拨通了电话，居然是唐克接的。匆匆几句问候，给他留了

我的地址。不久收到他的信，仍像以往，厚厚一叠，内有他拍的照片。除了一帧为女儿唐棣所摄人物像以外，都是他拍的广告。一个盘子，几只苹果，摆成塞尚静物画的样子。这些广告照，我估计卖不出去。他的信仍然写得有趣，信中说他这么多年唯一不变的是对艺术的热爱。我有点感动。看看他拍的那些并不成功的广告，再想想三十多年前他钻在自己的小暗室里精心冲洗的风景照。在摄影技术上，没显出多少进步，在艺术表现力上，也无法比。

我给他回了信，信中难免有点怀旧的感伤，大约提起他当年远游，一路给我写信的事，也提到了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再接他的回信，里面又有他的手迹，重抄大观楼长联。字仍那样漂亮，但笔锋中已有岁月的苍凉。

零二年，突接唐克的信，说阿柳和唐棣参加了欧洲旅游团，路过巴黎，不日即到。我和雪问清了到巴黎的日期和住处，便去酒店等她们。在酒店大厅里坐了很久，终于见到母女俩。从阿柳脸上几乎看不出岁月的痕迹，似乎七八年在广州分手时她就是这个样子，仍然瘦小、安静，只是眉宇间多了成熟和自信。唐棣则是个小美人，穿着入时，举手投足间透出妩媚。坐在酒店的酒吧里闲聊，说起唐克，小唐棣颇对老爸不以为然，小有抱怨。我说她老爸是我的启蒙者，对我一生有重大影响。她几乎不相信，瞪大眼睛，一副吃惊的样

子，撇撇嘴说：“我老爸什么也不会，对家里也不负责。”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有些不安，真想告诉她：噢，孩子，别这样说你的老爸，其实他很“负责任”。他的责任是在冰封的雪原上用青春燃起篝火，让那些想逃离心灵监狱的人能得些温暖。你无法想象你老爸所负的“责任”，那是一种“自由的责任”。我得益于此，并心怀感激。你老爸确实“什么也不会”，那时他只知一事，就是相信监狱之外有另一种生活，而这一事却造就了我们的整个世界。唐棣，宽容地对待你的老爸吧，他或许不合你的要求，但他曾创造了自己“真实的生活”。好孩子，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你们的时代刚刚开始。然何者为佳，只有神知道。

零三年，唐克要来巴黎了，来看看这座“宛如一朵灰色的玫瑰，在雨中盛开”的城市。我和雪去酒店等他。见唐克从旅游大巴上下来。我们远远看他，正热热闹闹四面招呼着，想必一路又俘获了那些大姐的心。我叫他，他回头看见我们，一脸的笑，眼睛都眯上了。晃着身子走过来，还是老样子，只是肩上没有了那把老吉他，换了一架老相机，镜头后面的折箱已磨出白痕。这种款式的相机，怕只能在巴士底狱广场周围那些卖古董相机的铺子里才能见到。我随口问他哪里找来这么个古董，他立即给我讲了个故事。说这架相机是七六年天安门事件时江青特批从德国进口的“蔡司”机，专为拍

那些“暴徒”。一共进口了两台，都归公安部专用。现在一架存档了，另一架就在他手上。目前他供职于“广州科学技术园区”，专负责摄影，所以必须用这种“顶尖”的相机。我有点不相信这事，但他言之凿凿，而且报出一大堆相机的数据，唬得我再不敢说话。他倒没完，抱怨萍萍的妹妹光光，说她就在慕尼黑，却不帮他的忙。原来这架老“蔡司”丢了根快门线，而蔡司公司总部就在慕尼黑，光光很容易就能找蔡司公司给他配上这根快门线。天啊，就算这是江青同志七六年在德国买的相机，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还能配上原型号的快门线？有点天方夜谭。

放下相机这件事，我们把唐克接回了家。拉拉杂杂闲聊，主要听唐克讲他在摄影方面取得的“成就”。他特意带来一张广州科技开发园区的全景照片，大约有两米长，照片上高楼鳞次栉比，一派纽约式的景象。他说马上要去昆明国际花卉博览会拍照，并随手送我两个精美的镜框，里面是蝴蝶标本。唐克说了半天，似乎就是告诉我，他已经“与时俱进”了。我能感到他平日在国内受到的压力，似乎“盛世”激流冲得他有点站不稳了。我心痛他，忙把话岔开。唉，老兄弟，我只想知道：在心里，你的日子过得可妥贴安稳？终于，我们谈起了旧日时光，唐克的声音开始低沉，缓缓地变得从容。随后便向我要一把吉他。我却没有为他准备。雪半开玩笑说，

只有盈盈玩的一把儿童吉他，唐克却高兴地说“拿来试试”。这把儿童吉他在他手上，像巨人手里的一片树叶，小到不成比例。但他仍努力要调出音来，挣扎了一会儿，终归不能成调，便颓然放下，眼睛中流出失望。这真是我的不是，我们见面总要唱歌的啊！

第二天晚上，我们接唐克去蒙马特。这是几十年前他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名字。在这座小山上，聚集着雷诺阿、梵高、毕加索、莫吉尔扬尼、M·雅各布……二十世纪巴黎艺术家群诞生在蒙马特，成长于蒙帕纳斯。“洗衣坊”故事就是唐克讲给我听的。我们沿着古老昏暗的小街漫步，看山下巴黎万家灯火。想象着一扇古老的门后突然走出海关职员亨利·卢梭，他笔下的潘神正吹着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忧郁的笛声飘荡在晚霞未褪、明月已升的天际。我们几乎不再说话，沉默表达着感动。走到梵高画鸢尾花的咖啡馆时，里面已经挤满了人。找不到座位，我们就在隔壁的咖啡馆坐下，要了啤酒和咖啡。里面一位姑娘正唱，一个小乐队，两把吉他，一只架子鼓。歌是摇滚风格，节奏铿锵，声音高亢。这已不是旧时毕加索们所唱的歌，那时的蒙马特小调悠扬、诙谐，像毕加索拿来作画题的《曼侬，我的美人儿》。

唐克听着，沉默着，似乎这歌声离他很远很远……再看他眼神，有点迷茫，或许这蒙马特的氛围带他回青年时光。

姑娘唱毕，我们酒也喝完了。已是深夜，该走了。唐克起身，突然问我可否把桌上的垫纸和酒杯垫带走，因为上面印着蒙马特的图片和这家咖啡馆的名字，可以留个纪念。我说可以吧，于是唐克俯下身来。仔细把垫纸折好，一折又一折，像在折起他的青春，折起他流逝的年华，然后那样细心地把折好的垫纸放进贴胸的口袋里。我们转身下山，把岁月和梦想留在身后，留在蒙马特高地上。

唐克走了，因为是旅行团集体活动，我没有去送他。纳兰词云：“谁复留君住。叹人生，几番离合，便成迟暮。”既然我们生命中的快乐与悲伤尽溶化在这送往迎来中，又何必一送？

唐克，老兄弟，你如今在哪？那把老吉他是否已常悬壁上，久不作声？摘下它吧，请抚弦再歌一曲，在喑哑的歌声中有我想说的话：“晚风轻轻送来，想念你的那一首歌。”

## 附录 读《燃灯者》

我认识的人里，有文才的不止一二，但这样的回忆文章，我想只有越胜写才好。越胜不止于对人好，对朋友交心；越胜与朋友交往，完全没有“自我心”，他做的比别人多，却没有任何东西要表现。唯此，友人的情态，友人的天光云影，得以挥洒展现。你看，与周辅成老先生在那 7 路无轨电车站依依不舍地分手，偏这个没有“自我”的越胜有这福分！

有时候会觉得，那个时代的高人俊士，没有越胜不认识不深交的。文中偶一出入的高尔泰、曹天予、周国平，还会有多少故事等着越胜写。“我爱真理，但我更爱朋友”，越胜当年如是说。其实，爱人，才能爱真理，才有真理。

周辅成先生更是奇人异人，是对越胜恩重如山的恩师兼

朋友，他带着那段异常的历史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是个险恶的时代，唯因此，友情来的特别真，特别重。那是个贫苦的时代，倒仿佛因此，人不得不有点儿精神。越胜心里，这段历史浓重得排解不开，唯在这种“历史感”的簇拥下，他笔下的人物才那样饱满。

这种历史感，并不只是感觉，它培育出正大的判断。本书所收入的文章，实不只是纪念友情，不只是对已逝时代的缅怀，它们始终在吁请我们思考自己，思考我们这个尚未结束的时代。

陈嘉映

2010年1月于香港

越胜在《辅成先生》中讲述了与周辅成先生感人至深的交往故事。辅成先生于越胜，既是师长，又是知己，是陪伴、指引和支持着越胜穿越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黑暗，使得孱弱、



卑微的生命有了光明和暖意。这样的事情决非偶然和例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类似的故事到处都有，因为，人生活需要光，而生活中总是有光，哪怕黑暗以红太阳的名义妄图压倒光明。

1966年年中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大陆陷入空前的灾难，一代年轻人精神上的愚昧、狂热、野蛮暴露无遗。这当然不是出于中国人天生的劣根性，而是斗争哲学和个人迷信产生的恶果。但人生的强韧无时无刻不在，与“文革”发动者想要塑造一代“革命新人”的愿望相反，反思、探索、反叛的火苗到处冒出来，而且，倒行逆施越疯狂，反弹力越大。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文革”的大破坏、大混乱打破了以前严密的控制，禁书到处流传，不同地位、阶层、职业和年龄的人相互接触和交流，异端邪说或新思想通过各种渠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播。

越胜是幸运的，他在思想探索的道路上遇到了良师益友，没有为自己的离经叛道付出什么代价。事实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因为思想探索遭到镇压，有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的赔付了青春年华，贻误了终身前途。格外有运气的是，越胜得到了周辅成先生这样的名师点化，得以直接沿着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正道行进，不像很多探索者那样在意识形态的浓雾中艰苦挣扎、曲折前进，耗尽了全

身力气还是未能挣脱那精神上的紧身衣，为自认为叛逆的思想弄得精疲力竭、伤痕累累，其实是孙悟空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越胜是很感性、重情义的人，他首先是喜欢一个人，然后才喜爱那个人信奉的思想。他的运气还在于，招他喜欢的人的情与理两方面是统一的而不是脱离或分裂的，所以，对于他来说追求真理和享受友谊是同一个过程，暗夜中的灯火带给他足够的温暖。

越胜书中所记的良师周辅成先生已经逝去，但他的音容笑貌通过越胜的文字将永驻我们心中，他们的光和热将永远照亮和温暖我们。

徐友渔

2009 年 12 月于北京

越胜嗜书，然甚惜墨，有文章，必为佳作。故此，我对越胜的文章总有双重的期待：希望他多写一点；俟篇成，必欲先睹为快。

过去这一年，接连读到越胜数篇新作。八月，越胜携家人回京，朋友聚会时，他说到当时已经写作过半的《辅成先生》，更为没能在辅成先生离世前完成此文而倍感遗憾。十月，稿成，越胜即以之传示友朋。越胜作文，或因朋友之请，或为朋友之故，他最想知道的，也只是朋友们的意见。既然不为发表，这些文字便有几分私人的味道。然而，作者所记述的人和事，蕴涵的，却是这个时代的大悲大喜，几代人的生命经历。这样的文字，是不应当只在朋友的小圈子里流传的。

读毕《辅成先生》，我即函复越胜，略云：

此前读你的文字，已觉得写得很精彩，此篇似又深一层，描写更细而用意愈深。相信任何人读毕此文，都会对周先生纯真而高贵的人格肃然起敬，对他身上体现出的一代中国知识人出于中西古典文化熏陶的价值情怀深怀敬意，而这些东西，现在已经逐渐淡化，甚至为人所遗忘。但这也正是此文重要处。能够代周先生剖白心迹，而将其理想和追求记录、传达于后人，令其薪火不绝者，这是第一篇也是最具分量的文字吧。周先生有

你这样的忘年知交，可以感到欣慰了。我读大作时也在想，这样的文字不可只在朋友的小圈子里面流传，那样太可惜了，而且也失去了她原有的意义。

这些文字终能公诸世人，诚为读者之福。

越胜在信里说，他有意将此集题为《燃灯者》，又解释说：

燃灯者在佛家是指片语可开悟人的觉者。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皆可为燃灯者。辅成先生，不用说就是这样的燃灯者，而且是燃巨烛之人。

不消说，越胜也是我辈友朋、读者的燃灯者。犹忆上世纪八十年代，越胜与一班朋友问学论道，砥砺思想，终至开创一番事业，引领一时知识风潮。那几年，大约也是越胜“入世”最深的一段。不过，即便是在那时，越胜仍然保持着一份逍遥。他淡泊的心性，温润的友情，对古典文化的追慕，和对趣味的好尚，在朋友中间最具魅力。他家的小客厅，总有朋友满聚，煮酒吟诗，纵论古今。还有他筹划的那些令人难忘的出游：攀古长城，踏夕阳残雪，水中泛舟，月下放歌……山水之间，也是我辈精神滋养之所。

越胜去国已悠悠二十载，世事丕变，人事亦然。这期间，我数度往巴黎。再见越胜，他率性依旧，爱家人，重友情，劳作之余，以音乐、诗歌为伴，说到读书，依然眉飞色舞，不改其乐。只是，他差不多与写作绝缘。不过，我知道，他心中的火焰从未熄灭，这些文字可以为证。我读这些文字，在莞尔与凝重、欢悦与沉郁之间，又被一次次地感动和启悟。读者诸君，也会有同样的经验吧。

梁治平

2009 年岁末记于北京西山忘言庐

辅成先生是一位将人类知识奠基于人道的楷模。这部书是由越胜兄弟对他的创伤记忆而编织成的一曲“人道颂”的勋伯格式变奏——它演奏着演奏者的巴黎夜曲，像 Gabriel Fauré（加布里埃尔·福莱）的 *Après un rêve*（《梦后》）。

然而，我读这些文字，与其说读辅成先生，不如说是读

越胜兄弟。辅成先生已于 2009 年仙逝——薪尽火传，记忆文字所燃烛者，不正是“火传”的仪式吗？

“人道”，越胜是接纳我“从个人尊严的辩护到思想自由的辩护”的第一人。但在我们之间重要的还不仅仅是文字、思想，而是印在心底里的感觉。

从一九八一年到越胜去国前，几乎隔年我都要去北京，一般都要在越胜家小住两天。一九八四年去旅顺参加全国首届电影学会成立大会，回来路过北京就为了看越胜。是时，越胜大女儿蓓蓓才几个月，他为了在晚上同我聊天，特意把摇篮搬到我的房间让蓓蓓睡在旁边。半夜，蓓蓓哭醒了，我看见你高大的身躯一手抱着几个月的蓓蓓，一手拿着奶瓶给蓓蓓喂奶。喂完了奶，你两手抱着怀中的婴儿，摇着，轻轻地唱起勃拉姆斯的摇篮曲。你们父女摇动的身影就这样在我眼前融化到摇篮曲中去了……十三年过去，一九九七年冬天我在巴黎又见当年的情景，不是蓓蓓，而是盈盈，以致我感慨，你胸中有多少柔情滋润着童贞般的心田啊——你怎么会老！

去国十七年，你第一次回到北京，我从海南赶到北京见你。到北京已是下午三点。放下行李，亚平、张雪立即带着我，说是去“救”越胜。原来越胜和哲学班的老朋友喝酒喝

过了头，还有原来工厂的一大帮师傅等着哩。救出了越胜就往师傅们聚会地赶，仍然晚到四个小时。一进门，热气腾腾，越胜像一滴水珠溶入了沸腾的锅炉。直到饭桌上，越胜在敬酒之前，对自己的晚到，硬是下了大礼，跪在桌前向师傅们谢罪！

.....

孔夫子修诗从心所欲不逾矩：“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有素为绚，无素则糜。人，何尝不是。

张志扬

2009 年 12 月 7 日于海甸岛

小说《一九八四》中那位“思想警察”对那位受审的“思想罪犯”宣称：“不！……我们对你所犯下的那些愚蠢的罪行并不感兴趣，……思想才是我们所关心的全部。我们不仅要

摧毁我们的敌人，我们还要改造他们。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我以为，这话绝非作者奥威尔凭空杜撰。曾几何时，那种意图在现实生活中几近获得成功，而且至今也还远不能说它已遭挫败。我于是一直在想，在那种蓄意制造的暗昧笼罩下成长起来的我们，何以也曾得见光亮呢？

越胜写的这位曾经给他带去光亮的人物——周辅成先生，并称他为“燃灯者”，至少部分地回答了我的这一问题。薪火相传，这我原先也是知道的，有人也曾点亮过我心中的烛。然而我还有一问：那火种是怎样得来的？读越胜文，我终于是想明白了：人类这个物种自来有“盗火者”在。“盗火”并非普罗米修斯一次就完成了的行为，人世间每一次火的传递，都是一次传递双方共同进行的“盗火”。不是吗？越胜笔下的“燃灯者”辅成先生，连同越胜本人，其实也都是“盗火者”。

在我的心目中，周辅成先生是守望普世价值的哲人，是我仰之弥高的人物。但越胜写出了先生的寂寞，这让我得以和他亲近。他的寂寞，远离了孤高自许的文人情怀，直接滋生于一种肝胆照人的热切期盼：期盼着暗昧中有别的人也能得见他所见到的光亮，期盼着那光亮能普照世人。



朱正琳

2009 年 11 月 23 日于贵阳

## Table of Contents

### 版权信息

《燃灯者》（增补版）序

《燃灯者》（增补版）自序

### 辅成先生

聊与梅花分夜永——辅成先生百年祭

读神与缺席——为志扬文集而作

若有人兮山之阿

骊歌清酒忆旧时

附录 读《燃灯者》